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留學生談美國大選

中國大陸會出現軍管嗎？

「官倒」—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化現象

《河殤》爭鳴

五四運動批判

我們為什麼沒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

JAN/1989/NO. **68**

波蘭團結工會駐英聯絡站給中國民聯的信

親愛的朋友：

最近得到了有關你們活動的消息，我們非常希望和貴組織建立聯繫和合作的關係。

我們的聯絡站是由一群流亡英國的團結工會活動分子在波蘭軍管法頒佈之後的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建立的。到一九八五年底，我們成為波蘭團結工會在海外的正式代表機構之一，命名為「N S Z Z團結工會駐英聯絡站」。一九八六年一月，它的活動範圍又擴大到了其它蘇軍佔領的東歐國家。當時我們的領導人是波蘭人馬爾克·加茨特奇，後來烏克蘭籍教師和記者塔拉斯·庫茨奧以及最近到達英國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的領導人蓋奧蓋·克拉索也加入了領導行列。

起先，我們的活動主要是收集波蘭軍管之後人們被捕、拘留、開除工職以及受到其它方式迫害的消息。後來，我們開始向這些人的家屬提供經濟和道義上的支持。六年多來，我們曾安排英國人家庭收容了大約五百名波蘭的政治犯。

我們還資助一些團體出版非官方的出版物。在英國，我們向那些願意定居或移居它國的波蘭難民提供幫助。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逐漸積累了一個地下出版物的資料庫，其中還包括有關蘇聯東歐集團的幻燈片、膠卷和各種材料。我們從波蘭偷運出來的膠卷已多次被英、法、美、加等國各類電視台採用。

我們還向那些對東歐集團感興趣的學者、記者以及政治家們提供各種來源的信息。我們資助並出版了幾種專題報告的小冊子，舉辦一些講演和講座。我們還曾組織了兩次從美國東岸到西岸的巡迴演講，在丹麥舉辦過一次講演，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舉辦過多次講演。

自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起，我們的刊物「團結之聲」已出版了一百三十多期，並已建立了良好聲譽，成為有關蘇聯東歐集團情況的主要信息來源渠道之一。這個刊物創辦時僅僅是波蘭地下刊物的選集，而現在它提供信息的廣度和深度已囊括有關人權狀況，獨立工會運動，經濟、社會及和平問題，政教關係，以及匈牙利、烏克蘭和阿富汗的文化獨立性等一系列問題。

「團結之聲」提供的有關蘇聯東歐集團的原始照片是極其生動的，有讓人親臨其境之感。它獨特的風格已經被各種層次的讀者群所肯定。本刊的訂閱者包括美國斯坦福大學、密西根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圖書館，勞聯一產聯，美國政府各部門和各大使館的圖書館，同時還有很多著名的學者、政治家、記者，其中包括阿拉斯泰爾·伯尼特閣下、尼爾·阿撒森和安德魯·拿葛斯基。

如果你們也有出版物，並願意收到「團結之聲」，我們樂意和你們交換刊物。如果你們需要什麼資料，請和我們聯繫。

致

馬爾克·加茨特奇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



是優勢還是劣勢

上一期，我們的觀察家還在對中共是否「收」得住表示懷疑，然而鄧小平發話了：「整頓經濟秩序，要發揮我們黨政治上的優勢。我們能放下去，就能收回來。」「黨的領導，首先是黨中央的領導，是我們克服困難的最大優勢」。

鄧小平從來講話都氣勢如虹，出語不凡。不過此話却頗值得商榷。

首先，用政治上的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本身就有問題。如果真是僅憑政治上的優勢就能解決經濟問題，那麼中國還要搞改革幹什麼？四十年來，中國人民何嘗一日不是在黨的領導之下，而全黨何嘗一日不在黨中央領導之下，這種政治上的優勢中共什麼時候缺過，它在毛澤東時代甚至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可是鄧小平為什麼還要「發展商品經濟」？為什麼還要發揮「市場的作用」？既然有了政治優勢就能解決政治問題，那麼回到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時代去吧，還要市場幹什麼？早知今天要收，何必當初要放。

其次，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優勢是什麼？說穿了，就是能夠統一人們意志和行動的集權

制度。他曾多次嘲笑分權制衡的民主制度效率低下，互相掣肘，議而不決。試問，中共今天的集權制度效率就很高嗎？中共自今年七月以來開了多少次會，議了又議，到底決定了什麼？勉強拋出個千瘡百孔的決議，又能夠推行下去嗎？

其實，任何決議都會有反對意見。這種反對意見如果沒有正常的途徑表達，那麼就會用其它方式表達出來。集權專制制度下命令，做決議是很痛快的，可是一推行下去，就會遇到消極怠工的掣肘，「對策」與「政策」的制衡，效率更低。如果說民主制是決議難而推行易的話，那麼集權制則是決議容易推行難。道理很簡單，今天的改革，無論是放是收，都涉及千家萬戶，各級政府的利益。如果這是一場實驗的話，那他們就是實驗品，如果你不通過某種方式讓他們也表達自己的利益和意見，却一味讓他統一行動，他們能甘心情願配合嗎？他們能不怠工，能不掣肘嗎？如果做不到這點，那麼黨的領導，尤其是黨中央集權領導的政治優勢又何在呢？

在共產黨人眼裡，似乎有權就有一切，權

力越集中，事情越好辦。如今，鄧小平不也有很大的權威嗎？不也可以一言九鼎嗎？四年前他曾講過海南島二十年趕上台灣，結果鬧出個轟動全國的海南汽車風潮；他一聲令下開放十個沿海城市，結果引來了一九八六年的大收縮；今天又是他信誓旦旦要關物價關，可三個月後就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錯，權力集中做出一個決定很容易，可是犯錯誤也很容易，其結果是總不斷地修改政策，給人造成政策不穩定的印象，使領導者的威信喪失殆盡。如果人民總是擔心政策會變，各級政府官員也總是預料政策不能持久，從而時時刻刻採取應變的姿態和措施，中央的指揮能不失靈嗎？在這種情況下，政治上的優勢又何在呢？

一些老的共產黨人總是沉醉在過去輝煌的歷史中。在執政初期，共產黨不是在三個月內擊潰了上海的好商，平抑了物價嗎？在困難時期，共產黨不是一下子遣散了兩千萬職工回鄉，果斷地調整了經濟結構嗎？每當遇到困難、指揮失靈的時候，他們就會想起那不可一世的時代，企圖把黨中央的權威恢復到以往的水平。可是想不知，共產黨那「說得到，做得到」的歷史舊夢早在毛澤東時代就做完了，如今也該清醒一下，認真地檢討自己的劣勢何在。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的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號創刊

一九八九年一月號六十八期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號出版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CHINA SPRING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觀察家

3 是優勢還是劣勢？

路邊

讀·作·編

6 關於公開盟員身份的一點建議

魏可等

特稿

8 中國留學生談大選

本刊編輯整理

專題

15 河殤兮黨殤

17 「河殤」的「符號象徵主義」與憂患意識
19 也談黃河與共產黨

山原

80 不怪黃河，不怪共產黨，只怪自己！

丁楚

思想論壇

28 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
30 啓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

胡平
黑馬

40 布希政府對華政策分析
41 南斯拉夫當前的政經危機及啓示

姜原
致遠

大陸專欄

45 中國大陸會出現軍管嗎？

胡平

49 私有經濟一瞥：堅冰下的潛流

楊天樹

52 官商——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

李玉

56 敲山震虎，捉貓嚇虎——中共打虎新傳

李遠

60 廢除內部發證，保障公開審判
——致最高法院任建新院長建議書

林峰

65 如此「代表」

王平

26 聽順口溜，說大陸事
42 轟動全國的金元券詐騙案

黎音
馮磊

爭鳴

61 共產黨的江山哭不倒——與丁楚先生商榷
63 致「中國之春」的第二封公開信

李憲
遲來

編輯手記

經過一番激烈的競選，布希終於勝利地進軍白宮，擔任美國總統了。

這一次大選，給中國大陸留學生，無疑是上了最深刻和最生動的一課，使他們更加明白了什麼是民主的價值以及在民主的運作中人所應有的權利，本刊為此專門組織了一次「中國留學生談美國大選」的座談會，與會者通過他們對大選的深切感受，把民主和專制兩種截然不同的政體的優劣作了強烈的對比。現特將該次座談會紀要加以整理、發表。

自「河殤」電視片的解說詞在我刊連續刊登以後，大陸留學生寄來了大量稿件，對「河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期特推出專題，包括「河殤今，黨殤」、「不怪黃河，不怪共產黨，只怪自己」等四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對「河殤」展開了爭鳴。我們認為，「河殤」的作者出於條件的限制，他們並沒有把心裡想的話完全真實地說出來，而是用了一個「符號」來做「象徵」，詮釋這個「符號」是我們「中國之春」義不容辭的責任。

「河殤」說：「中國的許多事情，似乎都必須從『五、四』重新開始。」的確，「五、四」是偉大的，但同時也應看到，「五、四」並沒有把中國推向民主的道路。本期刊登的黑馬的「啓蒙的悲劇」，對「五、四」的局限性作了大膽而精闢的批判，足以振聾發聵，引人深思。對該文的觀點，我們歡迎深入探討。

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目前已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胡平的「中共會實行單管嗎？」以及「私有經濟堅冰下的潛流」、「官商——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中共打虎新傳」等，對大陸社會的政情作了評論和分析，都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章。

留學生欄

66 致中國駐美大使的一封信

(並附致「人民日報」和「中國之春」的信)

吳芳芳

澳洲「民主中國」

70 「一一·一七」事件的由來

大安

71 如此「資助」——一個J—1留學生的經歷

文藝園地

73 河殤(下)

蘇曉康 王魯湘

21 雷根總統笑話一則

朝開牆

42 詩一首

彌拉

參考資料

22 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大會通過

82 東南西北

40 新書介紹

本刊編輯

封二
封三

中國之春第十八期

波蘭團結工會駐英聯絡站給中國民聯的一封信

中國民聯給波蘭團結工會駐英聯絡站的回信

胡平主席給台灣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的賀信

中國之春

讀 · 作 · 編



丁楚與遲來的通信

「中春」編輯部：

來信及稿費皆收到，甚感。

我聽朋友說我的「公開信」他們已在雜誌上見到，並且見到其它駁我的文章。我因在假期回國探訪，故近來剛得知此。對登我的文章我感到意外，沒想到你們能容下我的觀點，有這樣的胸懷。對駁我的文章我倒是覺得在意料之中。對二者我皆很感興趣。而我至今尚未見到，亟望貴刊能給我早日將有我文章和駁我文章的期刊各郵一份來。感激不盡。

即頌

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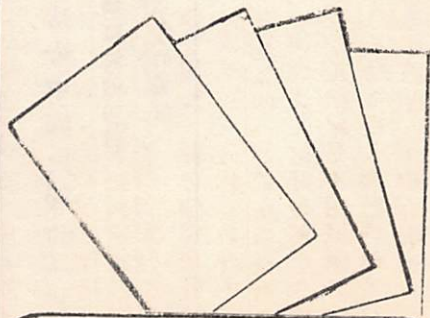
遲來草

十月廿九日

遲來先生：

遵囑寄上您所要的雜誌。當我收到您的信時，我非常感動，無論您的觀點如何，但您能認真真地寫下三千餘字向我們提建議，這說明您是關心民主事業的。正如我在「哭黨」一文中所提出的觀點：我們更重視人們「怎樣做」而不在意他們「做什麼」。換句話說「重形式，輕內容」。在這個世界上，人們基本上分為兩派：講理派和不講理派。共產黨信什麼理論我們並不反對，我們反對的是它不講理。您是講道理的，只要講道理，就可以對話，可以溝通。就講道理而言，我們可以說是同派的，至於觀點的分歧，這並不重要，世界上有幾個人觀點完全一致呢？可是大家都有必要認同同一個規則：講理。

我寫的「為權利而辯護」並非僅反駁您，而是對很多寫信批評我們的人的一個總的答覆。如果您對我的觀點有些什麼意見，可以來信



讀者 · 作者 · 編者

探討，如果您不反對，我們也可以發表。我非常希望能夠和持有您這種觀點的人溝通，我甚至非常希望我們能夠成為朋友，能夠結識您這樣一位認真思考，講道理的朋友，我感到很榮幸。

我們大約收到了七十餘篇稿反駁您的觀點，有一篇稿支持您的觀點，我們只選登了「後到」先生一文與您商榷。當然，我心裡很明白，反駁您的人和支持您的人如此懸殊並不能說明持有與您類似觀點的人的微不足道。向「中春」投稿的人大多具有明顯的傾向性，而不同意我們觀點的人却大多只在背後罵幾句，而不願公開、認真地與我們商榷或辯論。這就是我為什麼對您的信而感動的原因。

我們願意講道理，我們尊重講道理的人。所以我很尊重您。

祝好！

丁楚 十一月二日

關於公開盟員身份的一點建議

前幾年，爲了防止中共當局迫害民聯成員及其國內家屬，盟員以秘密身份活動是必要的。今天，國內外的形勢已發生了有利於民聯成員公開活動的變化。仇殺多年的台灣海峽兩岸，已開始改變態度，開放探親，已有往來；中國的民主人士——方勵之先生，面對中共的封建專制，不畏打擊迫害，堅持爲實現民主直言；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大陸不進行政治改革、實行民主，中國的經濟改革絕無希望，因而，民主的要求與日俱增。這一切意味着，新的民主運動高潮的到來已經爲時不遠了。而作爲海外中國留學生的民主組織的中國民聯，必須站在民主運動的前列，積極做好迎接民運新高潮到來的政治、組織、思想、理論等各方面的準備工作。

據我所知，民聯中只有總部及部分支部的盟員公開身份，進行民主運作。而有相當數量有條件公開身份的盟員，仍有這種或那種顧慮而不公開身份。這種境況已不適應於目前民主運作的要求，不利於推動民主運動、擴大民運隊伍，建立民聯和廣大留學生之間的聯絡。

作爲民聯盟員，肩負着宣傳民主、聯絡民主同仁，實現中國民主的重任。我們的事業是正義而艱巨的。爲了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幸福，我們應該拋棄一些不必要的顧慮，公開站出來爲實現民主運作。因此，我希望總部能鼓勵和提倡盟員公開身份，公開活動，進而建立一個世界範圍的民運人士的公開的、廣泛的聯絡交流。這將有益於加強民主運作，提高盟員素質。

以上僅是我個人的建議，願收拋磚引玉之

效。希總部和各位盟友斟酌。

盟員魏可

提前發出的賀年卡

胡平先生：

你好！一九八九年即將到來，衷心地預祝你在新的一年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能爲中國民聯的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通過你向中國民聯致以崇高的敬意！

這樣早給你賀年絕非我有神經病。因爲就要回國了，回國之後就沒有那樣自由給你通信了。這也是許多關心祖國前途的人們支持你、尊敬你，但卻不會與你聯繫的原因之一。我堅信中國會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們會同意中國民聯的主張，中國當前的社會比什麼時候都舊，直接原因就是共產黨的獨裁施政所造成。許多明白的人都是敢怒不敢言，讀了「中國之春」之後就覺得中國的前途很光明，中國民聯是出現在中國東方天空的一顆明星。

在「中國之春」的許多文章中提到：今後實行多黨執政時，也包括共產黨。共產黨是搞共產主義的，而其它政黨不搞共產主義，不知如何能真正合作？事實上，歷史已經證明，並將進一步證明，馬恩列斯毛才真正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反動派，世界上按照他們的觀點行事的國家沒有一個不窮得可憐，共產主義這條路已被證明走不通，其它真正有作爲的政黨不可能與共產黨共事。我想對中國共產黨的事進行徹底的揭露，促使他們以改革的名義放棄使他們自己成爲鰥寡孤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

實行多黨施政的很重要一招。

「中國之春」的水平很高，句句話都連人心，很吸引人，要是國內很多人能讀到「中國之春」，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很快就會垮台。

最後讓我感謝你和你的同事爲祖國的前途而操心。

中國大陸在荷蘭留學生蒲公英

一九八八年十月

「廣告」有感

近來，在「世界日報」刊登了一則廣告，云：「跨國公司聯絡經理凡父輩官職位部廳局者優先工作時間彈性薪優厚可代辦身份」，並留有聯繫電話。

看後不禁啞然，從一則小廣告，便可知這些跨國公司並非正經生意人，而是企圖通過官場的捷徑，以達到賺錢的目的。大概這家「跨國公司」目前還沒有和「官」搭上綫，而招聘做官的子女，無非是利用血緣關係以求搭綫的目的，看來，有一個做官的老子，即便是到了美國，也可以得到蔭庇。同時我又想，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官」「商」本來是要分家的，如果靠官經商，便可知這個社會一定腐敗之極。而中國大陸就是靠官經商的，聽說鄧小平最近對方勵之的「高幹在國外有存款」一說大發雷霆，而此廣告恰好是個小小的佐證。大陸的高幹子弟來美國是不用發愁的，只要憑老子的招牌，一樣有商人會巴結他，給他優厚的薪水和幫他辦身份，中國社會的腐敗之風竟也吹到了美國，哀哉！

劉利人

留學生談美國大選



丁楚（討論會主持者）：

今天討論的題目是「中國旅美學人談美國大選」。我想大家是不是談談你們親身經歷美國大選的感受，印象，從而對比一下美國與中國的選舉制度，政治制度。

柯力思

我在很多地方都見過選舉，我想把它們作一下對比。

對於美國的這次大選，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我們感覺不出它是選舉。選舉日很平靜，老百姓不當回事，投票也不高。歐洲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況。例如我在法國時，大選日看不出什麼特別，投票所很安靜。投票是秘密的，票箱外圍着布帘。這一切表面上很平靜，但這並不意味着競爭不激烈。激烈的競爭表現在現代化的宣傳媒介上。一九六〇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第一次在電視上辯論，從此開闢了用大眾傳播媒

體競選的時代。電視辯論採取公平原則。如法國，電視台給每一個競選人予公平的演說時間，因為它是國營，競選人也可能沒有金錢去購買電視時間；還有的人購買街邊的廣告牌進行宣傳。在美國則不一樣，電視台是私營的，需要競選人花錢買電視時間。

我在中國大陸也參加過選舉，氣氛和美國差不多，大家顯得很冷漠。只有一次很例外，就是北京校園的競選。特別是北大校園，胡平 and 丁楚當時都是當事人。主要形式是辯論會和大字報。大眾傳播媒體都被官方壟斷，封鎖消息，因而社會上都不知情。這是八〇年的選舉。而八四年那次則純粹走過場，我投的是空白票。

這是兩個極端的對比。美國人表現的冷漠是因為司空見慣，該說的平時也可說，選舉日沒什麼特別。投票率百分之七、八十就不錯了，有的專家反而認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投票率不可信。而中國大陸的投票率雖高，但大眾實際上並不關心選舉。

我再講另一種選舉，介於兩極之間。我的親身體驗就是台灣的例子。台灣的選舉非常熱

開，場面頗像魯迅筆下的社戲。競選人搭台演講，群眾攜家帶小來看熱鬧，這種集會有公辦也有私辦。公辦是地方政府舉辦，給每個候選人公平的演說時間，公營聽眾比較少。而民營是個人出錢辦，無黨無派人士常用後種辦法。私辦的聽眾比較多，因為只有選舉日可以罵國民黨，聽眾聽着痛快，所以有人稱選舉日是「民主假期」。選舉人各出奇招，有人將棺材抬上台，向選民訴求：「一定要選我，否則國民黨就要殺我的頭。」（笑聲）總之氣氛很熱烈，投票率介於兩者之間，鄰裡幹部會動員人們去投票，但不強迫。

我想從這三個例子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制度由封閉到開放，由專制到民主的發展階段和過程。

程鐵軍：

我經過上一次美國大選。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我本不太關心美國的選舉，因為這和我們的利益關係不大。不過我們學校的地址恰是兩次大選中競選人活動頻繁的地方。

一九八四年雷根到我們那去了。那裡有IBM的生產中心，他去拉白領中產階級的票，他不選我們大學，因為學校裡自由派知識分子多，那裡是民主黨的天下。學校開了汽車去會場，去的人多是反對雷根的。他們在被單上寫反雷根的標語，站在會場門口抗議。我和他們一起去的，那是在一個中學的大操場上。

很令我感動的是，反雷根的這些自由派分子，馬克思主義左派和激進派分子人很少，他們最多一百人，站在會場外喊口號。而支持雷根的有幾萬人，從他們面前走過入場，大家相安無事。雷根講話時，又有人從人群豎起反雷

根的大標語，周圍群眾也沒把他怎麼樣，要在中國，你若敢和大多數人作對，早挨揍了。

今天傑西·傑克遜也來了，到我們學校，這次支持他的人多，佔百分之七、八十，也有一小夥猶太人反對他，主要反對他對以色列的態度。黑人學生，第三世界的外國學生，少數民族都支持傑西。可是在傑西來之後，一個猶太人和黑人打起來，原來大家各喊口號，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但一發生打架，大家都一致譴責打架者，不論他們是哪一派的。

這兩件事給我的感想是，在美國，儘管有不同政見，儘管處於少數，但都有機會講話，講話難免有情緒，但沒有人以勢壓人。這體現了美國的包容性。另一個特點是非暴力，無論誰是誰非，只要使用暴力，立即會遭全體人反對。規則比不同政見重要。

回顧我們國家，別說現在當政者不允許執政選舉，就算哪天同意，也可能會出現另一個問題，輸的一方認不認，服不服，他支持的人落選，他會不會採用其它手段。

當然，我對美國大選的看法也並非全是正面的，譬如我就認為這裡金錢的力量過於大，對政治產生干擾。如電視時間要花錢買，辦活動大量要錢。支持民主黨的大多是窮人，很多窮人老人沒車子，沒有辦法去投票站。一些支持民主黨的窮人有一種無力感，也就不去投票了。

梁雲：

美國法律似乎是對捐款人的捐款額有限制，所以不能說金錢干擾了政治。

王炳章：

我覺得在鈔票和選票的問題上多講兩句是應該的。我們在大陸長時間接受共產黨的宣傳，說美國的選票是錢買的，選舉是大亨們操縱的。說每年選舉要花多少錢，多少錢，光電視時間就花一千萬元。

大陸人受了毒害，跑到美國來一看，嘩，花一千多萬競選，我一年才多少錢？其實他們根本不瞭解是怎麼回事。其實，美國對於捐款的來源、額度、賄票等都有嚴格的法律限制。另一方面，我倒覺得，每年花那麼多錢，讓人們瞭解候選人的政治觀點是很必要的。而且也說明新聞媒體的獨立性。這些都是私營機構，不管你是總統候選人，還是現任總統，要宣傳你的觀點也要花錢，不能泛用政治影響和使用政治手段。

花一千萬，每四年把人民對政治的關切動員起來也值得，一千萬佔美國國民總產值百分之多少？街上的浪費也比它多。

共產黨若對此進行攻擊的話，那請問他們用國營的宣傳媒體，每年花在宣傳上的錢有多少？中國的電台、電視台、報紙，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官辦的，每年花多少錢來灌輸他們那套錯誤的理論？我見過一個統計，中國政府花在宣傳上的開支佔整個政府開支的百分之二十，和美國怎麼相比？有什麼資格攻擊美國？

胡平：

關於金錢和政治的關係問題，其實很簡單。假如你出生在美國，又熱衷於政治，那麼你到了三、四十歲還沒有號召力，振臂一呼沒人出錢支持，那說明你沒什麼能耐嘛！不能拿我們比，我們當然沒人睬。美國這個社會機會是很多的，只要是美國人，學習好也可進名牌大

學，可見名牌並不都是爲有錢人設的，就連我們中國人也可以進嘛。這說明，只要你有能力，機會還是比較多的。

毛遂曾向平原君自薦出使楚國，平原君說：「我養食客三千，是錐子也該冒尖出來了，爲什麼偏要請你？」毛遂答：「是人才如錐處囊中，必脫穎而出。我沒冒頭，是你沒把我放在袋子裡，不信請置囊中。」這說明是人才終是有機會出頭的。

傑西·傑克遜是個很明的例子，他出身牧師，又是黑人，還是個孤兒，但他一直跟着馬丁·路德金。這麼多年，自然你的名字就有一定的號召力，周圍就有一幫人。

在國內，民主牆不就折騰一兩年嘛？很多人就出了名。所以這事應當反過來看。別人捐錢沖着什麼？不就沖着你的主張合他的意，而且有可能當選嘛！這和做廣告一樣，在兩個商品質量差不多時，當然誰出錢多牌子就越響。可是若你的商品本來就不行，那你廣告再多也賣不出去。廣告也是投資，若我是投資者，明知你的貨不好，還要投錢，那不是幹虧本生意嗎？

所以在美國，你不能說有錢就能當選，主要還是看你的主張。況且還有很多限制。

這一點東方人反而容易出毛病。如日本、台灣、過去的中國，賄選的現象就很嚴重。日本人認爲金錢就和選舉有關係，這是理所當然的。西方人反而搞得清清楚楚。尼克松就有一筆捐款交待不清，差點沒資格當選。

不過從輿論角度說，老百姓對錢的作用有所警惕還是有好處的。奎爾這次參選，他富家子弟出身反而對他不利。人們也在防着金錢起過份的作用。東方人把出賣選票當作理所當然，而在美國至少爲道義上所不容。

國內總宣傳美國大選勞民傷財。但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可以把一場大選看作一場政治普及教育。一般老百姓平時看報只看廣告，體育消息，不看政論文章。教授們寫的政治、經濟著作，一般百姓決不會看。可在大選時，候選人和評論家就要指手劃腳一番。選民爲了決定選誰，況且又有戲劇性，看着帶勁，總要看個究竟，到底雙方觀點如何？用大陸話說這有點像政治學習。大部分老百姓的政治經濟知識和對民主的判斷能力基本來自選舉。競選就是靠戲劇性來抓住人們的吸引力。

就算花錢也和共產黨不一樣，共產黨花的是老百姓的錢。而這裡的「勞民傷財」都是個人自願的。傷誰的財、誰競選、誰助選誰傷財，不關我的事。

我有一個朋友的兄弟是紐約某地共和黨副主席，他賣了房子辭了職去助選。我問他：「你賣了房子辭了職，萬一你支持者失敗了，你不是白忙了嗎？」他說這就像賭博，輸了也沒辦法，一切從頭開始吧！

另外，這美國大選給我的另一個深刻的感覺是選舉日那樣平靜。這麼大一個國家的權力交接就這樣平靜地完成了。這叫中國人想也不敢想。過去中國一部二十四史打去爲了什麼？不就是爲了一個權力交接嘛！我們四九年以後搞運動，殺這個批那個，到頭來不就爲這麼一件事嗎？我們國家最大的罪名就是篡黨奪權，上綱上到頂就是這條。如果中國人權力交接不靠砍人頭，只靠點人頭，那麼一部二十四史，共產黨三十幾年建國史就沒什麼可寫的了。

看了美國的選舉，再看中國人可真是：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們子孫後代也許會奇怪，中國人這麼多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都幹

什麼了？爲了這麼件事，犯得着那麼折騰嗎？西德漢學家馬漢茂說：「中國人不習慣用文明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赫魯曉夫對中國評價更刻薄，說中國除了暴力之外，不知道服從別的東西。到頭來只認打。中國的當權者你要和他競選他決不答應，但你要把他打倒了他就服了。這叫什麼品性？（笑聲）

自中國開放以來，西方社會讓中國看到了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不但是可取的，而且還是可行的。要說可取還沒有多少異議，但如果你沒有經歷過那件事，你就會懷疑它是否可行。古代如果有人提議：爭皇帝不要打嘛，競選嘛！大家可能都會覺得你說得有道理，但都會認爲你做不到，書生之見。

西方人向我們證明了這是做得到的，你沒做到是你不去做。布希當選後呼籲那些不投他票的人能夠接納他，要在中國，你不投我票不是反革命是什麼？（笑聲）另一方面，杜卡基斯失敗了他也認輸。勝者和敗者能採取這種態度很不簡單。在中國，勝利者要收拾異己，絕不會讓你們來「接納」我；失敗者也不服，會用其它方法把你搞掉。所以作爲一個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講規則。

肖震亨

我是北卡來的，我們那裡大多是民主黨人。在選議員時，儘管共和黨的經費比民主黨多得多，但還是民主黨當選多；但選總統時，民主黨人中很多人却選共和黨人當總統，我問他們爲什麼，他們說：「我們是代表自己投票，並不代表黨。」

選舉那天，我到競選站去看了一下，那裡的人擠得不得了，排隊要排兩三個小時，像澡

堂一樣，又擠又熱。我從沒看見美國人排那麼長隊；這裡買東西是從來不用排隊的。這些人都是自願的，沒有單位領導，居民小組長動員他們去，他們說這是他們的責任。雖然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我看也不簡單。若在中國，若沒有人動員，有沒人願排那麼長隊還很難說。

另外使我深有感觸的是競選人可以互相攻擊，這就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如果你過去在政治、經濟上有什麼瑕點，大家都知道。在中國，領導人的事我們什麼也不知道，那些票投給他有什麼意義？

吳牟人：

剛才有人對美國選舉制度進行了批評，其實美國人批評的更厲害，譬如紐約十三頻道電視台大選時，訪問了××（不清）他對美國選舉的一個最主要的批評，是認為美國選舉表面上搞得熱鬧，但一般的老百姓事實上沒有真正地參加到選舉裡去，選舉主要是由一些選舉人或電視報紙來控制，他們並不想讓你知道真正的問題在哪裡，譬如用一些死刑呀、愛國主義呀、什麼的來轉移你的視線，無非是叫你投我的票，至於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不可能要那些沒有專門研究的人提供解決辦法，所以他認為美國的統治方法和老百姓之間有一個脫節，這個脫節非常嚴重，改進的方法就是讓一般的人都能來具體地討論這些問題。我的看法是美國這麼大，問題這麼複雜，如果要人人都討論，是一個根本不可能的事。對我們大陸人來說，我覺得，選舉是最重要的，這個選舉，它決定了政府的合法性問題。這是選舉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對大陸我們應該提出這個問題，大陸這個政權是不是合法的？這個問題弄清了，

那我們就會對其它問題都改變看法，譬如說，大陸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我們可能會有許多討論，但如果提出大陸政權的合法性問題的話，那我覺得，其它問題都不重要，我們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就是你按照什麼標準去搞改革？你有什麼合法性？你有什麼權利？我並不是說大陸這個政權是非法的，但是我認為對共產黨政權可以提出一些基本的條件，如果你滿足這個條件，或者你開出一個時間表來，檢驗你是不是合法的——也就是通過選舉。如果你取得了合法性，下一步具體怎麼做，我們可以再討論。如果說最基本的問題——合法性——還沒有解決，其它的事情我們怎麼能參與呢？不解決合法性的問題，我們只能採取一種不合作的態度。最近我聽了白樺的一次演講，我覺得他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沒有搞清楚，他說，方勵之說中國的問題現在不是「解放」的問題，而是「解散」，我覺得正確理解方勵之的話，「解散」的含義就是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在沒有建立以前，你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你要有個解散的過程，有個建立「合法性」的過程。現在有些人出於策略的考慮，都在假定共產黨合法性的前提下，作一些「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事，現在我越來越覺得這個取向值得考慮。

梁雲

我贊成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因為大陸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根本沒有解決。我談幾個問題：（一）現在有些改革派，也有一點民主思想，但他們說，「民主好是好，可中國這麼窮，怎麼搞民主？」我覺得，美國二百年前也很窮，但是民主照樣搞，民主不是要達到什麼條件才能

搞的；（二）就是政治道德。在美國選舉中，雙方都相互攻擊，但再攻擊，比起台灣式的那種大打出手就差遠了。一經選舉之後，雙方又言和於好。在這裡，就給我們提出了借鑒，怎樣避免東方方式的那種喜歡訴諸暴力的方式。（三）剛才王炳章講了，他贊成中國兩黨制。我想兩黨制和多黨制主要區別在於這個政府怎麼產生，美國政府產生就是總統一個席位，一個席位兩個政黨競爭比較合適，多黨制分散選舉就不太容易。但歐洲就不同，它有總統又有內閣，競選內閣時，雖然得多數，還不能組內閣，除非超過半數才能組內閣，否則你就要聯合其他勢力，使你這個政府超過半數才行。在決定中國政體的時候，兩黨制除非是像美國這樣非常鬆散的兩黨制，如果像中國現在這樣的政黨，黨員意識非常強的、勢不兩立的，像台灣國民黨和民進黨，我覺得兩黨制不如多黨制。分散一些，鼓勵黨和黨之間的合作。

吳牟人：

兩黨或多黨制要根據各個國家的傳統和政治現實，憲法是不可能作這個規定的。這個不是個人意願所能決定的。

錢輝怡

我想換一個角度談一談。兩個總統候選人雖然也相互攻擊，但都在理性的範圍之內，當時就給我的震動很大，我認為他們的政治風度那麼好，值得我們學習。但南韓、台灣、菲律賓就不同，他們也搞民主，但為什麼要搞街頭暴力？

胡平：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把人類的毛病和制度的毛病分開，有些不是制度不好，而是人就是這個德性。選總統就可以看出來，有的老百姓就喜歡選能說會道的，「動聽」比「真實」還要重要，這不怪候選人，而是怪選民，你說的好聽他就要投你的票。在選舉中，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存在，既然人類有這麼多的毛病，你就不能怪這種制度有毛病。這對我們看西方的制度是有好處的。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只是在政策取向上有一些區別，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這種差別並不是很要緊的，我們中國現在爭取的就是中國那些最基本、最起碼的那些東西。

房志遠

吳牟人剛才提到的合法性，確實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政府權力轉移的合法性無非有三種方式確立：一是血統繼承。這一點上是無可爭議的，但不幸的是這個世界上充滿着爭議，有爭議的權力過渡基本上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靠武力取勝。像胡平剛才說的，打出來的方式，老百姓習慣了這種方式，就認為確實誰強就該誰當政；第二種方式就是選舉，由選票所代表的民心決定。對美國大選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可以預料到這一天要換總統。所有的美國人也都可以預料到四年以後要換總統，可是在中國我就預料不到明年領導位子上的人是誰。現在大家都知道鄧小平活不長了，可是他什麼時候死，什麼時候政權會轉移，誰也料不定。

美國人比中國人幸福的地方在於他們可以

預料到四年以內他們的社會不會發生變化，也可以預料到這個社會什麼時候有可能發生變化。可是中國人就很難想象四年後這個社會會是什麼樣子。現在香港被告之五十年不變，可是他們心裡在想，誰知道鄧小平死後這個社會會是什麼樣子。

要談錢的問題，我相信，若在中國選舉，錢的不公平性更大。現在國庫是共產黨的，如果民聯和共產黨競選，它從國庫拿錢，要多少有多少，而你只能在民間籌錢，公平嗎？要是共產黨光靠黨費，它連那些書記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不過即使不公平，我也贊成民聯要回去和共產黨競選，至少要作為一個目標。當然，它那麼大，四千多萬黨員，你那麼小，才千兒八百人，再加上不公平，它有國庫你沒有，你當然選不贏。但是讓執政黨贏幾盤是有好處的，南朝鮮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執政黨先勝了。若反對黨勝了，社會會發生動亂。反對黨並非天生就有執政能力，也不熟悉怎麼當家，甚至讓它們當權它們也未必能容忍原執政黨。讓他們輸幾盤，可以使他漸漸地滲入政府，鍛煉執政能力，可以平穩地過渡。讓執政黨贏幾次，它就有了自信，想：不一定非要用武力嘛，選舉也並不可怕，我不也可以贏嗎？既然能贏，那就選吧！一次、二次、三次，多讓你贏幾盤。重要的問題不在誰當選，而在於把這種確立政權合法性的形式鞏固下來，這樣民主就有望了。

八年前，我們北大選舉的時候，我們這些競選人，包括胡平在內，曾開過一個會，主張誰當選並不重要，重要的問題是確立一個民主選舉的典範。「中國之春」經常宣傳說「重形式而不重內容」。誰當選，誰執政這都不重要，問題是怎樣當選，怎樣執政，這才是最關鍵

的。

馮勝平：

我是學政治學的，研究過美國的立憲史。當時五十五個國父在費城吵了一〇八天。吵要有幾個總統，有人說一個，有人說兩個，也有人說要三個。後來大家達成一個協議，認為行政的美德在於效率，正如一個車不能有兩個司機，只能有一個總統。第二是吵立法機構怎樣設制。後來大家達成共識，立法的美德是賢明，因此要集思廣議，不能一個，要一群人。司法的美德是公正，為了公正，司法者要獨立，不能受其它因素的制約。所以美國憲法規定大法官的終身制，一旦美國總統選擇了某大法官，那就再也沒能力換掉他了。

有人認為民主就是分權制衡，我覺得還不僅僅如此。民主可以分為硬件和軟件，分權制衡是民主的硬件，軟件指那些爭權的人，制衡的人本身要有基本的民主素質，有些違規的事是不能幹的。例如列寧，表面上他很相信民主，可是俄國二月革命後第一次選舉，布爾什維克只拿了百分之二十四的票，占少數，於是他用紅軍強力解散議會。如果他真相信民主的話，他就要守這個規則。如果只有硬件沒有軟件，又會出現幾個魔鬼打架的局面，中國人民將會有更大的災難。

很多例子可以證明軟件的重要性。例如，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如南美國家，那裡雖沒有像美國國父一樣的至聖賢人，也不可能大家聚在一起討論一部完美的憲法，可是你抄總會吧？美國已經有一部很好的憲法了，可以拿過來用嘛。事實上很多南美國家的憲法就是抄美國的，而且寫得比美國的還好，可是事實上却是

另一回事。例如玻利維亞，到目前為止，它已有六十四部憲法，每一部都可以和美國的憲法媲美。可是六十四這個數字本身就可以證明這個國家的民主程度，這麼頻繁的改變和修憲，說明法制根本沒有確立。中國已有四部憲法，我相信很快就會有第五部。如果沒有人尊重這些法律，這些條文說得再漂亮有什麼用？所以美國民主制度建立的最基本的條件是人民的民主素質。美國的移民從一開始民主的心態都很強。最先的移民大多是英國人，而英國從一五一五年「大憲章」誕生起就不再是一個傳統的專制國家了。英國人尊重法律，學會了制衡，當他們來到新大陸，並有了革命的機會後，他們就會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而南美的移民從西班牙、葡萄牙來，沒有民主的素養，所以一來就把原來那套舊的東西給原封不動搬來了。

大家說中國人素質差，逆來順受，可是中國人在歷史上推翻過二十六個王朝，每推翻一個，就建一個新的，如今已有第二十八個。中國永遠在找一個好皇帝，除此之外就再也想不出一個其它更好的主意了。這就是中國實現民主爲什麼難的真正原因。如果我們不去建立這個民主的軟件的話，歷史給你一次機會的話，又會重復一次過去的循環。

吳牟人：

如果僅限於美國，你說的理論我可以接受。可是從普遍意義上說，若一定要先有軟件的話，那麼第一個民主制度是怎麼產生的？

梁雲：

美國的民主建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

十三個州基本上獨立，有自治能力。我想中國現在正在放權，各省市的權力在增加，這對於建立民主是有好處的。李鵬要收權，對建立民主反而不利。

凌晨光

對於布希、杜卡基斯，我看了些材料，這兩人都還是相當不錯的。杜卡基斯從念書起就



很勤奮，工作認真，而且律己很嚴，對人要求也嚴，幾乎不近人情，各方面操守非常好。布希當然算高幹子弟了，父親是參議員。他上中學時上的就是貴族學校，那裡絕對不像我們高幹子弟的學校，要求很嚴。他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把人訓練成爲人才。布希也當過兵，飛行時，他的飛機有四次被擊落，也算出生入死，至少有四次冒生命危險，這點獻身精神還是有的。這些履歷還是很漂亮的。這不像我們中國，靠父母出身、靠領導提拔，愛是誰就是誰。這點也可以看出民主政治的優越之處，你要想當政治家，從小就要很注意操守，要求自己非常嚴格。

黎民：

美國大選給我的感受是，用選舉制來代替世襲制、終身制、委任制是最優越的。中國最需要的是把選舉制的架子（價值？）建立起來，至於多黨制還是兩黨制，這只能由歷史條件來決定。

美國人對競選公職的人的政治道德看的很重，如哈特因排開而退出選舉，這種對領導人的「德」的高要求是很好的現象。中國傳統上是泛政治文化和泛道德主義，但它裡面也有合理的東西，有基本的道德價值，這一價值在十年動亂中已失落了。我們要重新建立基本的道德價值，特別是政治道德價值。我們無論是繼承傳統還是吸引外來的東西，都要有所創造，創造性吸收、創造性繼承。只有基本價值的重建，才能爲今後民主制的實現奠定一個牢固的根基。

蘇貝：

這是我第一次實地感受美國總統大選。「百聞不如一見」，有許多感觸。十一月八日那天，我坐在電視機旁等待選舉結果。那時候，美國人也在等。他們等待的是有他們自己參與決定的結果，等待的是他們大多數人的意向。回想我們的祖國，周恩來逝世之後，那時，我們也在等待，看誰將繼任總理，但那個結果我們既不能參與決定，甚至連表達意向的權利都沒有，在這之後（在這之前也一樣）無論是毛澤東之後，華國鋒之後，李先念之前和之後，趙紫陽（總理）之後，情況一直如此。許多時候，我們甚至連候選人是誰都不知道，所以說，同樣是「等待」，但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對於美國的選舉制度，你可以有各種批評。但從根本上來說，未來執政者是由選民的大多數人的意向選擇出來的（不是由少數特權人物，特權階層，特權集團或武裝力量來決定），因為這個決定的後果是要他們來承擔的，他們是在對自己承擔責任。另一方面，這一決定也只是四年（不會是一代人，即數十年），就算決定得不好或不好，大不了就是四年，四年後還可以重新選擇。上面這兩點，我覺得有根本的意義。從人類文明史上的社會群體組織形態演變來看，應該承認美國的這種最高權利轉移模式是先進的，中國相應的現行制度是落後的。由於這種落後，我們民族不得不吞下許多苦果。例如：當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應該反對文化大革命繼續的時候（這裡不談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問題，這也有爭議，我個人認為那時的大多數人並沒有那樣清楚地意識到應該反對它的被「發動」），我們也

無法制止這場災難。今天的現狀仍然是這樣，大多數人已經看到現行政治、經濟制度必須改造，但是中國政情的發展並不為這個意志直接左右。我們也許再一次面對的不是大多數人自己選擇的結果！

只要人民承受後果，而剝奪他們選擇的權利，這是與人類文明發展背道而馳的，也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是歷史的主人學說的背棄。

布希當選後，楊尚昆的賀電中說，這是「美國人民的選擇」，他說得多麼對啊！

不久前，彭沖曾對外國訪華人士說，因為中國的交通不發達，所以不能「直接選舉」。但是請問：第一，二百年前的美國不是比中國現在的交通更不發達嗎？第二，是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因為某種原因而不願選擇這種「直接選舉」方式呢？還是少數人用某種托辭阻止人民去實施自己的權利呢？

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都有同樣的選擇權利。這種選擇的權利也就是人民作主的權利，或者說「民主」（與之對立的是「君主」「霸王」），他們已經在行施這個權利，而我們現在却還沒有得到。

從美國的總統大選，可以看到，民主決不是可有可無的，也不是空洞的口號，它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休戚相關。

王炳章：

再給我點時間我想談談兩黨制和多黨制。美國實際上有很多黨，但實際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兩黨，而歐洲有很多國家是多黨制，如意大利沒有任何一個黨可以超過議會半數，都是幾個

黨聯合執政，內閣總換。有人就會問，中國是兩黨制好還是多黨制好。當然，組黨應當是自由的，誰願組都可以，組多少黨也都可以。可是從運作角度而言，社會只要有兩個黨就足以代表大多數人傾向了。無非一個比較激進，另一個比較保守。但為什麼會出現多黨呢？我想有幾個原因，一是有種族上的原因，如果傑西·傑克遜以代表黑人號召的話，可以分裂出另外一個黨。另一個原因是意識形態太強，不易妥協也會出現其它黨；還有就是個人因素，儘管我們的主張都差不多，但我不服你，覺得你沒有能力領導，我比你好，我就另成立一個黨，分裂出來。可能最後一個因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我為什麼說有兩個黨已經夠了呢？因為兩個黨可以建立起比較穩定的政府。對於中國前途，很多人都會問是兩黨制好還是多黨制好。我想今後民主制也要講效率，黨太多了在議會裡爭吵不休，動不動倒閣也沒有效率。但你又不能禁止別人組黨，所以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在立法時就規定，一方面尊重一些小黨的存在權利，同時也建立一些限制，使它們不能輕易占領議會的席位。

怎樣排除個人因素，使社會力量集中在兩個主要派別旗幟之下，使政府的運轉更有效率，這是我們搞民主的人都要研究的問題。



河殤兮黨殤

山原

寫在大廈傾覆之前

「他們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體而是分散的個人……他們的才華可能被利用，他們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們的脊梁可能會彎曲，他們的肉體可能會消滅。」這是「河殤」中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描繪的一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文人相輕。文人無行。文人無用。哪個單位裡的知識分子不在勾心鬪角、相互制約。知識分子要賣身投靠起來，最厚顏無耻，卑鄙陰險。知識分子還最無用，思想裡面充滿矛盾，做起事來瞻前顧後。「可也就是這些人中的分子，在中國乾涸的黃土地上撒着科學與民主的種子。」

河殤像一個巨大的犁，在中國人的心上豁出了一道深溝。有些人會因為那久已麻木的心靈又重新受到震動而感到逐漸清醒，開始思維的痛苦。有些人則恐怕這啞啞的土地上驟然響起的警鐘會震碎統治者昏沉、淫樂的迷夢。於是他們拍着桌子，揚起嗓門高罵：「這種反對中華文化、反對黨、反動透頂的東西還不趕快給我禁住！」

的確，將自己的落後和愚昧公開地喧嚷出來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中國共產黨一貫只允許人民唱歌、跳舞、寫文章來讚美它的偉大和

光榮。它告訴中國人民跟解放前比，跟清朝末年比，跟軍閥割據時期比，跟二次大戰日本占領中國時期比。在七八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人民見到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物質文明，於是人們開始懷疑共產黨所宣傳的偉大和強盛，開始試着思考為什麼中國這麼貧窮、落後、封閉。這方面的思考和討論一直被共產黨抑制着，這個題目成爲思想文化界的一個啞謎。共產黨不再像以前那樣說資本主義如何行將就木了，但也不允許別人討論為什麼共產黨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還是有人硬着頭皮從黨的立場上來解釋中國為什麼這麼窮這道難題。他們認爲，中國不能跟美國、日本等國比，因爲底子不如人家厚，但跟印度比起來，還是挺得意的。因爲建立起這樣一個比較的理論，陳俊生先生被提升爲中央委員。事實上，就在中國共產黨教導着中國人民怎樣比較財富與國力時，中國正在被世界在生產力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拋開得越來越遠。從國民平均收入上講，中國只能跟一些最窮的非洲、亞洲國家比，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中排倒數第二十位。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可自吹自擂的呢？承認現實才能圖變。而現在共產黨一方面不允許人民討論貧窮落

後的根源，另一方面，一些共產黨的官員却借着開放的機會利用職權大飽私囊。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些美國和歐洲的大企業跟中國做生意得通過香港或日本的中間人才成。爲什麼？因爲這些人懂得如何賄賂共產黨官員。

按共產黨的理論，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的官員則是人民的老黃牛。那麼在中國大陸所謂的「主人」只是些敢怒不敢言的人，得將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拿出來奉養那些作威作福的「老黃牛」的。根據「河殤」裡提到的問卷調查，百分之七十三的中國人認爲不參與政治爲好，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認爲自己在政治問題上是非常謹慎的。這些中國的老百姓從共產黨的歷次政治運動、人身迫害中學會了忍耐與沉默，學會了將自己變得麻木不仁。生命在麻木與沉默之中只能冒煙、萎縮，而不會蹦出火花，產生能量。正是由於中國人在共產黨治下苟且存身、不求進取的態度，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才如此低下。

改革開放，喚醒了一部分人的生產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也給共產黨幹部帶來了很多貪污腐化的機會。在一個各權力機構間沒有有效

的制衡、人民對於統治者沒有任何監督能力的國家中，權力集團的腐敗就會像瘟疫一樣漫延。人民在改革開放中發揮出來的生產力很快就被黨、政官員貪污腐化的副作用給抵消了。生產力在剛得到一些發展後，又立刻開始倒退，原因是各種「官倒爺」對生產起着極大的打擊作用。而且人民看到官員們的腐敗後，再一次變得心灰意懶。因此我們可以說現在改革所遇到的經濟問題，實質上是政治問題。「河殤」主要從文化角度討論中國目前所遇到的問題，但由於文化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緊密關係，所以「河殤」還是點到了某些政治問題，如金觀濤先生的中國封建王朝更替的理論。不直接討論政治問題，這可能是河殤的撰稿人對共產黨表示的「禮貌」和「尊敬」吧。但在共產黨看來，這點兒「敬意」是遠遠不夠的。

「專制體制的特點是它的神秘性、獨裁性、和隨意性。」拿「河殤」所提到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人們便會認識到，共產黨正是專制政權的典型。共產黨最善於搞政治運動，而政治運動最能體現一個政權的獨裁性與隨意性。這是因為在政治運動中，一切常規都打亂了，一切都靠獨裁者在那裡發號施令。政治運動也最能說明共產黨政治的神秘性，因為平常不大為人民所見的黨內鬭爭都爆發了出來，昨天可能是國家主席或黨、軍界的最高級領導，運動一來就成了敵人，甚至被得勢一方迫害致死。

專制制度的反面是民主制度。「河殤」對它的描述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學性」。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說要建立溝通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渠道，要使人民能夠監督共產黨的幹部。他的意思就是要減少共產黨政權的專制成份，使該政權逐漸地增多一些民主性。他

在報告中沒有提出什麼具體方案來落實這個設想。「河殤」正是在具體地貫徹執行趙紫陽的政治報告，在中國做一點民主思想的宣傳。

金觀濤在「河殤」中講，中國歷史上每一個封建王朝在初建時，各個政府機構的效率都較高，人員也較精簡，官員也較廉潔。而一個王朝快滅亡時，政府機構衰老、臃腫，官員腐敗，社會財富極為不均。今天的中國社會已暴露出許多王朝衰亡時的徵兆。與過去王朝不同的是，中國今天再也經不起一場戰亂的清洗。中國唯一的希望就是共產黨允許民主在中國傳播，允許言論的自由與反對黨的存在。共產黨如能這樣做，則它自己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中國。過去幾十年，共產黨在中國從擁有民心到失去民心，從較廉潔到嚴重腐敗。從它鎮壓人民、挫傷自己的各個政治運動，人們應已得出了一个嚴酷的結論，即中國不能靠共產黨一黨來獨裁，共產黨正在自身走向衰敗的過程中將中國拉向貧窮落後、充滿災難的深淵。

一個吸毒成癮的人靠自己戒不掉的，他只能在後悔中看着毒品將自己的生命逐漸吞噬。只有通過與醫生的合作，將自己置於醫生的監督之下，癮君子才能戒掉毒品，恢復健康。中國共產黨今天已成了一個吸毒成癮的人了。那毒品便是極權與專制，它的副作用是使共產黨腐化、衰敗，給中國人民精神與物質方面的痛苦與災難。那位能夠救共產黨的命，救中國的命的醫生就是中國人民及即將在他們中間產生的反對勢力。比較起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共產黨已有了本質性的進步，它表現在共產黨已願意努力克服自己的吸毒癮。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就說明了共產黨的這個願望。問題是對一個癮君子來說，只有戒毒的願望是遠遠不夠的，在理智與癮慾的對立中，後者總能占上風成爲

行爲的主宰。這就是爲什麼這幾年來比較好的文學、思想作品一出現即遭到共產黨的槍斃的原因。

時至今日，大家都已公認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存在着許多中國封建農業社會留下來的殘餘。這些封建殘餘與民主和四個現代化格格不入的。共產黨不許人們指點、評論它身上的這些封建殘餘就是對這些弊病的姑息保護。如果共產黨又要捂着它身上的這些封建爛瘡疤，又想實現四個現代化，其結果必然是把中國變成一個道德衰落、腐敗叢生、經濟落後、民不聊生的國家。

「河殤」的意義在於它的嚴肅性與危機感。它滿懷善意地向共產黨敲響了警鐘。共產黨不聽警告，對「河殤」發了禁令。這真是共產黨的不幸、中國的不幸。對於不聽警鐘的人，等待着他的恐怕只有喪鐘了。

「河殤」兮「黨殤」。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閻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河殤”的符號象徵主義

韋星

與憂患意識

大陸的電視連續劇「河殤」，在近年中國的「文化反思」熱中可謂別開生面。它利用電視這最廣泛的傳播媒介，由圖象音響造成強烈的直覺效果。其解說詞犀利尖銳、慷慨激昂，攫住了億萬炎黃子孫憂國憂民之心。國家副主席王震看了之後痛心疾首，怒斥「河殤」詛咒我們的黃河、長城，中傷偉大的中國人民。消息傳到海外，加州柏克利校園的同學們為之嘩然，決定為「河殤」作鼓動宣傳。「中國之春」分期轉載該劇解說詞，並有主編胡平撰文「怪黃河，還是怪共產黨」評論。

胡平的文章觀點十分鮮明：「河殤」的「巨大歷史感」和「危機意識」，並沒抓住要害，打中症結——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對於一部集文藝性、新聞性、政論性為一身的作品的評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胡平從中國政治社會問題的現實的綜合立場來看「河殤」，他的結論合乎邏輯。不過他一開始提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即「河殤」，以及近年來文化界的「文化反思」中的「符號象徵主義」（引自丁學良的觀點），或「指桑罵槐」、「含沙射影」、「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現象。胡平對這個問題並沒細追下去。筆者以為它恰恰觸及了

「河殤」與「河殤」現象的一個主要方面：「河殤」一劇的主要形式，乃是文字與圖像的「符號」與「象徵」；其主題對象，亦是「黃河」、「長城」、「龍」與「五星紅旗」幾個「符號」與「象徵」。故從「河殤」的形式——它的「符號系統」及其「指意功能」——的角度略加分析，可能有助理解其內涵。

「河殤」的「符號系統」

及「指意功能」

胡平、丁學良「符號象徵主義」說，似將近年中國大陸的文化反思看成一個特例，指桑罵槐，借題發揮，或竟掉進自設的符號隱喻（「槐」）的陷阱。其實泛言之，一切文字、圖像的文化現象，都是運用一定符號與象徵的活動，不過各自的「符號系統」有別，「指意功能」不同而已。拿胡平的論文來說，其「符號系統」乃是「語言」或「漢語言」主系統下之「政論文」亞系統，其形式的主要運作規則則是條理清晰、定義明確、直接了當，忌諱隱喻打謎，指桑罵槐。

「河殤」的形式顯然與胡平的論文不屬同一「符號系統」，為之作一明確界定就不是件

易事。它介乎文藝、新聞、政論、說教……之間，非鹿非馬，與所謂的「報告文學」可算一對學生兄弟，近年來很受國人歡迎（如劉賓雁的作品）。與其冠以頗帶洋味的「符號象徵主義」，不如視之為中國古典文論中的一個絕妙範疇——「文」。「文」不僅能組成「文明」或「文化」。「文藝」「文學」種種詞類，就文體或符號系統而論，可能是最為含混、內涵、外延可隨意擴展、壓縮的一個範疇。「文」的另一妙處，在於涵蓋了中國五千餘年傳統的精神。以孔子之「文」，國人延綿千載的「文人傳統」、「文心」、「文以載道」，到「文化大革命」，以至「河殤」自身囊括在內的近年的「文化反思」，都沒離開中國的這一「超穩定符號系統」。

這一符號系統的基本形式運作規則，就是隱喻，通俗說來即「指桑罵槐」。孔子列國周游，大興教育。教育是「桑」，政治是「槐」，醉翁之意不在教也，在乎復周禮。一個大隱喻。太平天國祭起「拜上帝會」的基督教洋旗，毛澤東掛出馬列主義羊頭，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形式上分析起來，也算得上是隱喻。其實，隱喻規則絕非中國獨佔。尼采上

個世紀就曾斷言，西方文化自柏拉圖以降的「真理觀」，一切哲學、法學、歷史、美學的思辯，都逃脫不了語言文字符號系統的隱喻規則（請注意尼采把所有的文字活動囊括在內）這一無處不在的「語言的牢房」。「真理」乃一太大的隱喻，一個神話，一個美麗的謊言。文藝作品的特點，是把語言文字大符號系統的隱喻規則，「最集中、最強烈、最概括地」表現出來（完全不是毛澤東所謂的幾個「最」的現實的再現）。

「河殤」無疑是這麼一部以隱喻為主要形式的作品，它的「指意功能」當然是隱喻式的。另一方面，它號稱是一部「反思」的作品。「反思」者，對自身的反省、思辯、批判也。由此，「河殤」的反思應該是一種對其自身形式——隱喻規則——的批判和反省，即對其自身所依存的符號和象徵系統的反思。它的「指意功能」就不僅僅是「指桑罵槐」而已。看來「桑」已被激怒了，指痛了，大部分觀眾也領悟了其「指」與「罵」、「桑」與「槐」的關係，這點可從王震老旅長，加州柏克利同學的「讀者反應」見出。然而，胡平有一個觀點——針見血：罵者往往自己到後來搞不清（或有意混淆）究竟誰是槐誰是桑，或以槐為桑，指鹿為馬了。這是一種隱喻的怪圈。要想跳出這個怪圈，就應該對隱喻的形式與規則來一番自我批判。

「河殤」對符號的反思

「河殤」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反思、批判就是一種隱喻。但它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又是一個對隱喻的批判。它批判了幾個中華文化中最具典型的符號或隱喻：黃河、龍、長城。讓我

們來看看這些符號的基本形式與規則：「河殤」的畫面裡出現了搖頭擺尾的神龍。學者把龍的形象肢解，將其演進的歷史加以解析。學者告訴我們：「龍是一種生命的符號，象徵古人對生命的循環、死而復生的願望。」龍的形象和它的象徵意義完成了符號系統中初級的指意功能：

- (1) 龍的形象——↓生命的象徵
(符號) (意義)
- (2) 符號——↓意義 (隱喻或神話)

第二階段的「符號——意義」，乃是龍的隱喻或神話的意義。龍成了中華民族的象徵或符號，具體的、歷史的、文化的第一階段的指意過程被抽象化了，自然化了，歷史退到了幕後，龍的形象達到了永恒。人們賦於這空洞的形象符號新的、變動不居的解釋和意義。皇帝認為他是龍的化身，百姓認為他們是龍的傳人，而「河殤」，認為龍是「一個典型的大河民族的夢」，中國人「愛它也恨它，讚美它也詛咒它，這是一種多麼複雜的感情」。

長城的形象也是一樣。一個當年用以抗禦外族入侵的工事堡壘變成了抽象的民族力量的符號與象徵。在第二階段的隱喻過程中，隨歷史的演變人們賦於其不同的意義。「河殤」的鏡頭不是凝固在長城上，重複「中華民族偉大、自豪」的永恒的自然神話，而是拉向了歷史的縱深，更推向了世界的截面：亞歷山大王出征馬蹄的呼嘯與秦始皇沉重城磚石般的想像構成了極鮮明跳躍的對比。

畫面上也有鮮艷奪目的五星紅旗下狂熱跳躍的人群，畫外音則是解說詞沉重自嘲的和不諧音：「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輪不起的民族。」……「一個民族的心靈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

就在於：文明衰落了！」

「河殤」的反思，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其意義超過了對幾個符號的歷史剖析和詮釋。「河殤」打破的不僅僅是幾個神聖、自然、永恒的符號的靈光，為它們做了歷史與文化的還原，而是顯示了一種新的視野——一個不斷地揭露、批判包括它自身在內的符號、隱喻的生產過程的新的程序。

「河殤」本身也是一個隱喻，一個尋夢的企圖。它對中國，何嘗不是「又愛他又恨它，讚美它也詛咒它」，充滿了激憤、深沉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悲劇感。

中國人真是感情最豐富，最有悲劇感與使命感的人。

這也許是中國的「文化」——「文」這個「超穩定符號系統」延綿子孫的原因？

「憂患意識」——

隱喻與符號象徵主義的淵源

「河殤」充滿了歷史感的憂患意識。另一方面，它對中國文化中的幾個基本符號，作了不留情的批判。「河殤」沒有正面指出中共一黨專政對中國文明衰落的直接責任，我們也許不必苛求，它畢竟是隱喻多於說理，更得帶着新聞檢查的沉重枷鎖舞蹈。其舞姿本身，即充滿着悲劇的隱喻。

「河殤」的意義，在我看來是它的獨具一格的形式。它是一種符號對符號的自我意識和反思，對「符號系統」本身——它主宰着國人潛意識的思維與情感——開始了批判。

它最大的缺憾，也許正包含在它最大的成就之中。它對「龍」，對「長城」，對「黃河」的符號的反思開始了超越性的新視野，但它對自己的基本立足點——憂患意識，却缺少深

刻的反省和自我意識。因此，它在批判歷史的隱喻的同時又造了一個新的隱喻，把「槐」——歷史的符號與隱喻——當成了「桑」——中國人的「文」的符號隱喻系統。它的憂患意識太強烈了，它的危機意識也因此太強。它不能看到憂患意識本身乃是中國符號系統的產物，而把憂患意識當成了一個永恒的、自然的、超越的力量。

請聽聽「河殤」說到長城時的慷慨陳詞：「長城是……一座巨大的悲劇紀念碑……它代表着封閉、保守、無能的防禦和怯弱的不出擊。由於它的龐大和悠久，它還把自詡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們民族的心靈上。呵，長城，我們為什麼還要謳歌你呢？」如果王震老將軍是詩人，他一定會以同樣的激情，同樣的憂患意識，大聲疾呼：

「長城，我們民族的驕傲，我們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光榮的象徵，我要盡情地謳歌你，讚美你，我要讓那些詛咒你的不肖子孫下地獄！」……至於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中的「符號象徵主義」與憂患意識的隱喻內在聯繫之後，該如何想呢？

也談黃河與共產黨

兼與胡平先生商榷

彭惠

拜讀電視劇「河殤」解說詞和胡平先生大作「怪黃河，還是怪共產黨？」以後，觸發我不少聯想。在「文化反思」熱方興未艾之際，似有提出「爭鳴」的必要。

關於「河殤」有沒有「潛台詞」的問題，我寧可信其無，不想信其有。原因在於，一來那東西難以捕捉，極易被讀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再創造；二來就「河殤」作者所要達到的社會效果看，其字面上的意思已經足夠了。

當然，大家都明白，國內不同於海外，尚不存在「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的外部條件。對於那些假話已經不願意再說，而真話還不能完全講透（講了不登），或不敢完全講透（害怕倒霉）的知識分子來說，說話「繞個彎兒」，「借文化打政治」，乃是十分自然的事，除

非「封筆不寫」。所以，即使有人「指桑罵槐」，也不必去求全責備。身在海外，又能對此心領神會的諸君，不妨多做些詮釋的工作，以便使作者和讀者雙方都保持足夠的清醒，不要「誤入角色」就是了。

有了以上這個前提，再來看「河殤」本身，我認為它的確不失為一部佳作。除了對中華文明衰落的歷史根源追溯得久遠和透徹而外，也大體上指出了擺脫困境所應遵循的正確方向（商品經濟與民主政治），儘管它沒有言及具體的政治經濟模式。雖然它沒有直接批評共產黨，但它不厭其煩地歷數了導致三皇五帝衰敗傾覆的種種原因。而讀者也不難看出，這些原因，正加速着今日共產黨王朝的沒落，這也正是共產黨和黃河一脈相承的地方。

胡平先生以「誤食毒藥」和「父母遺傳」的關係來反駁共產黨與黃河文明的內在關係，其比喻和分析有失簡單偏頗。我們不妨反問：「為什麼共產黨會誤食毒藥而別的黨就不會，而毒性的發作在中華民族身上的表現又遠烈於其它民族？難道這跟遺傳沒有一點關係嗎？」另外，把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這段歷史稱為閉關鎖國和農業文明固然值得商榷，但像胡平先生那樣斷言它是「放眼世界」和「不保守」也有失公允。不錯，毛澤東念念不忘「世界革命」，多年要同蘇聯爭奪「革命中心」，也曾夢想過充當「第三世界」的領袖，但無論其動機還是效果，既不是為了世界，更談不上革命。歸根到底，不過在追求「中華帝國」的老夢，骨子裡充滿領袖慾和權力慾，是「內陸

大一統」觀念的伸延，與歷代君王所追求的「藩邦臣服」和「萬國來朝」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至於大煉鋼鐵和三綫建設等「壯舉」，其音符固然是現代科學和工業技術，但曲譜仍然是修長城和挖運河的翻版，手法、效果和結局也大同小異。這又是黃河和共產黨之間的另一個內在聯繫。如果看不到毛澤東和三皇五帝之間，共產黨和黃河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繫，不但會誤解「河殤」的原意，而且有可能低估復興中華文明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因此，我覺得，不論從歷史反思角度，還是從民主啓蒙角度，「河殤」的作用都功不可沒。從這一點亦可說明，爲什麼全國觀衆對之大加稱頌，而保守黨官却十分恐慌和懊喪，必欲封殺而後快。

然而，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切不可極而言之。對黃河的反思和責難也同樣，如果超過它實際應該承擔的份額，難免引出荒謬的結論，小則會發生認識上的誤導，大則會延誤迫在眉睫的民主改革復興大業。

一部「河殤」劇，洋洋數萬言。掩卷沉思，感到它對歷史的苛責過多，而對現實的聯繫則太少。在這一點上，我同意胡平先生的擔心，即「在過分莊重的歷史感裡，有人會失去現實感」。不僅如此，我更擔心，當精神包袱背得比實際存在的物質包袱更加沉重以後，也許全民族會因此喪失進取心和建設性，最終加速毀滅性的崩潰過程。

「河殤」的缺點之一，是它沒有指出，黃河文明中究竟有哪些仍有某些價值，可以古爲今用，而共產黨恰恰不用，從而加劇了民族災難的東西。胡平先生指出的教育問題即爲一例。儒家文化一向推崇教育和儒生，只有毛澤東和他的黨才反其道而行之，視讀書人如糞土，

誤國誤民到今天的地步。

再如「忠言直諫」、「忠於史實」之類，雖爲「昏君」所忌，亦爲「明君」所好，因此成爲王朝吏治中的信條和傳統。惟有在共產黨治下，才將它連根拔掉，極端到竟然連一個敢說真話的「忠臣」（彭德懷）也容不下，連一部實事求是的現代史也編不出來。這裡，我無意歌頌對個人的忠，僅僅認同對事實的忠。

以上兩點可以說明，共產黨不僅受害於傳統，也受害於反傳統。也許有人就此反駁道：固守某些傳統和破壞另一些傳統並不矛盾，都源於黃河文化的劣根性，即大一統極權專制。那麼我要反問：究竟傳統和反傳統在什麼意義上才是一致的，什麼意義上又是矛盾的和對立的？恐怕這個問題僅從傳統本身難以找到答案，大概需要廣開視野，從共產黨其它「基因」，譬如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上去尋找。像經濟上的欺視商品貨幣、政治上的一黨制、新聞上的箝制、文化藝術上的壟斷等等，只有從列寧斯大林那裡，也許部分地從馬克思那裡，才能理出脈絡，解釋清楚。老在傳統文化的圈子裡打轉，有可能誤導人們捨本逐末，偏離問題的關鍵和要害。

近來，一個有潛在危險的信號正在引起人們注意。有些對傳統文化的反思開始出現走火入魔的趨勢。某些文章有意無意地引導讀者把對共產黨的怨恨轉向對全民族的怨恨，散佈文化、歷史和民族的全面虛無主義思潮，完全迴避共產黨的腐敗無能和障礙歷史前進這個主要矛盾。

虛無主義所能引致的最後結論不外乎兩個，其中比較積極的一個也不過是：中華民族沒有復興的能力與希望。共產黨以前的劣跡是民族命定的劫數，今後它搞成什麼樣子也只能聽

天由命，用不着斗升小民胡亂操心。其中更爲消極的一個則是：中華民族已經完蛋，唯一出路是亡國、亡族、滅種。這股民族虛無主義思潮極端危險。它不像「河殤」那樣，意在痛定思痛，通過全面清理老祖宗的家底，尋找中華文明衰落的最終原因，進而鼓舞人們卸掉歷史包袱，明瞭時代方向，急起直追，大步奔向「蔚藍色」的海洋（世界民族之林），而是散佈無所作為的情緒，消磨已經所剩無幾的民族凝聚力。它的危害在於模糊人們的視線，打擊人們的政治熱情，腐蝕人們的鬥爭意志，從而爲舊文化舊思想的沒落和退潮，新文化新思想的誕生和成長設置阻力和障礙，因此，這股思潮應該引起民主改革運動的警覺和重視。

以上所談並非聳人聽聞。只要細讀充斥國內報刊的那些語出驚人，貌似精闢的「反思」宏文，即不難發現民族虛無主義佳作。另外，方勵之先生提到過的「解散」心態，國內討論過的「開除球籍」心態，以及「非老外不嫁」、「非白人不嫁」、「耻於再做中國人」，等等社會現象，或多或少都與民族虛無主義有關。

前不久有位大陸留學生向我透露他正在構思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說，某種文明的興起和衰落往往和該人種的興起和衰落同步。中華文明的衰落說明蒙古人種中的這個分支已經沒落了，將來代之而起的應該是一個被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或日本人種混過血的雜種漢民族，然後才有可能再造和提升新的中華文化。嗚呼，好一篇社會達爾文主義宏論！依照此論，爭自由要民主一概無用，只要讓歐美日列強瓜分中國並強制通婚雜交就是了。可惜現在明目張膽的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已經不再時髦，否則漢奸賣國賊一定比九一八事變時數量更多，質量

也更高。

「人民日報」（海外版）也不甘寂寞，近來連篇累牘，大談所謂「人口素質」和「民族素質」，就是閉口不談「官僚素質」、「政府素質」和「共產黨素質」。有人民大學穆光宗先生一篇大作（載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第二版），用了一大堆新名詞，什麼「有機整合」、「馬太效應」、「臨界值」、「集體有意識」等等，很使人眼花繚亂，然而結論却難敢苟用。他說：「低劣的人口素質已不折不扣地構成中國現代化的瓶頸」。人口素質是否真的那麼「低劣」暫且存而不論，難道人口素質真的比貪官污吏的橫行、經濟制度的落伍以及思想理論的荒謬更加嚴重地阻礙着中國的現代化嗎？我看未必。且不說誰也無法確定經濟起飛所必需的人口素質「臨界值」究竟是多少，我們只要對比一下「真理標準」討論及三中全會之前和之後兩個不同時期，我看不出人口素質和文化傳統有什麼兩樣，僅僅中共決策層的指導方針一轉彎兒，就帶動了全國城鄉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的改革困境和社會停滯，其源蓋出於形勢要求共產黨再變，但它就是不肯。其「臨界點」是不敢確立私有產權的法律地位，以及放棄對權力、言論和思想的絕對壟斷（即四個堅持）。這個「瓶頸」不突破，經濟起飛永遠免談，人口素質的提高更不着邊際。

長此一往，老百姓的非常行為將會更多，社會「承受力」更為降低，但那絲毫也不說明人口的素質在下降，只能證明他們對政府和前途更加絕望，因而變得越發不耐起來。

問題再回歸到「怪黃河，還是怪共產黨」。我看兩者都可以怪，但道理要說得清，分寸要擺得平。既看到二者的聯繫，又看到二者的區別甚至對立，決不可把責任張冠李戴，尤其

不可以黃河、傳統文化或者民族素質去掩蓋和開脫共產黨的責任。那不但會害中華民族，也會害共產黨自己。因為有了擋箭牌，共產黨就有了藉口拒絕或延緩更帶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也會拒絕或延緩對自身頑症動大手術。毋庸諱言，如今的共產黨，已是病入膏肓，氣息奄奄，再不動大手術，恐怕難免眾叛親離、冰消瓦解的最後結局。

「聖人出，黃河清」。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這樣夢想。共產黨當過聖人，他們曾經立志改造黃河，並為此使全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他們沒有成功，反而被黃河所改造，很快步上往日英雄豪傑們的後塵，正在成為歷史上來去匆匆的過客。

共產黨還有希望改過自新，走上中興之路嗎？回答是：有，也沒有。這全看它自己。如果它自己還不會腐敗到垮台，任何人也休想推倒它；反之，如果它已經墮落到非垮不可，也沒有誰能保住它。倒與不倒的「臨界點」，就是能否實現經濟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這個「臨界點」已經明顯得歷歷在目了。我說它能夠中興，如果它認識到這一點。我說它不能中興，如果它認識不到這一點。

不過我們應該確信，無論共產黨的結局如何，中華民族和黃河文化的內聚力依然存在。「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請不要再相信謊言，繼續把「黨」、「國」聯在一起了。亡黨未必亡國。亡黨不會亡國。

既然諸侯紛爭、王朝覆滅、外族入侵、軍閥混戰等數不清的內憂外患都未能摧毀這個民族和它的文化。有什麼理由斷定另一次可能的災難（其規模和程度都未可知）就一定能毀滅它呢？

如果暴風雨真的注定不可避免，我們也只

有像海燕般迎上去。逃避也許可以救自己，但救不了我們的民族和國家。人人都知道，只有靠奮鬥，才有出路。更何況，對多數中國人來說，形勢是背水一戰，根本沒有退路的。

我們繼續夢想着「聖人出，黃河清」。但我們不再迷信英雄豪傑和任何「救星」，只迷信我們自己的覺悟和鬥志。聖人是誰？是爭得了本應屬於他們的天賦人權的那些老百姓自己，「吃一塹長一智」。這一回我們決不再把權利交給那些號稱代表我們的「先進分子」。對不起，我們要行使「直接民主」，要建立「有競爭、有制衡、有自由、有法制」的科學民主制度。有了這個信念和準則，我們就有了明確方向。

黃河，你養育過我們，也害苦了我們。我們雖然甩不掉你，但我們可以從根本上改造你。我們一定要改造你。愚公移山，挖而不止。一代不行，再來一代。

笑話一則

朝開牆

一日，蘇聯法官判處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到西北利亞勞改營服苦役。這位持不同政見者大聲說：「這刑判得不夠重。」法官驚愕：「你此話何意？」此人答道：「美國既然糟透了，你為什麼不將我發配美國？」

世界人權宣言

在四十周年紀念日，它已有了八十八個簽字國，
但其中沒有中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並公布「世界人權宣言」，全文載列於後。經此歷史上之盛舉後，大會促請所有會員國將宣言全文加以宣揚，並以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為主要對象，促使廣為流傳、展示、閱讀及闡述，不因各國或各領土之政治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

秘書長

哈維爾·佩雷斯·德奎利亞爾

人皆生而具有平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和基本自由。

聯合國決心支持、促進和保護每個人的人權。這項決心源於「聯合國憲章」，因為它重申了世界各國人民對基本人權、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信心。

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中簡單、明確地指出了每個人皆平等享有的權利。

這些權利是屬於你的。

它們是你的權利。

請你熟習一下這些權利。協助促進這些權利，為自己、為人類捍衛這些權利。

序言

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鑒於有必要促進各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鑒於各聯合國國家的人民已在聯合國憲章中重申他們對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平等權利的信念，並決心促成較大自由中的社會進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鑒於各會員國業已誓願同聯合國合作以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鑒於對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普遍瞭解對於這個誓願的充分實現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因此現在，大會，發佈這一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以期每一個人和社會機構經常銘念本宣言

，努力通過教誨和教育促進對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並通過國家的和國際的漸進措施，使這些權利和自由在各會員國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轄下領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認和遵行。

第一條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第二條

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

並且不得因一人所屬的國家或領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國際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

，無論該領土是獨立領土、托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者處於其他任何主權受限制的情況之下。

第三條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條

任何人不得使爲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

第五條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第六條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權被承認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條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行爲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爲之害。

第八條

任何人當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他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有權由合格的國家法庭對這種侵害行爲作有效的補救。

第九條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條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條

(一)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爲無罪。

(二) 任何人的任何行爲或不行爲，在其發生

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爲犯有刑事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的法律規定。

第十二條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

第十三條

(一) 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徙和居住。
(二) 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

第十四條

(一) 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

(二) 在真正由於非政治性的罪行或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的行爲而被起訴的情況下，不得援用此種權利。

第十五條

(一) 人人有權享有國籍。
(二) 任何人的國籍不得任意剝奪，亦不得否認其改變國籍的權利。

第十六條

(一) 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他們在婚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

(二) 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婚。

(三)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第十七條

(一) 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權。

(二) 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

第十八條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條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條

(一) 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二) 任何人不得迫使隸屬於某一團體。

第二十一條

(一) 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舉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

(二) 人人有平等機會參加本國公務的權利。

(三)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一意志應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選舉予以表現，而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並以不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投票程序進行。

第二十二條

每個人，作爲社會的一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受他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各種權利的實現，這種實現是通過國家努力和國際合作並依照各國的組織和資源情況。

第二十三條

(一) 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

(二)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權利，不受任何歧視。

(三) 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

的報酬，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必要時並輔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

(四) 人人有為維護其利益而組織和參加社會的權利。

第二十四條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閒暇的權利，包括工作時間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給薪休假的權利。

第二十五條

(一) 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二) 母親和兒童有權享受特別照顧和協助。一切兒童，無論婚生或非婚生，都應享受同樣的社會保護。

第二十六條

(一)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性質。技術和職業教育應普遍設立。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

(二) 教育的目的在於充分發展人的個性並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應促進各國、各民族或各宗教集團間的瞭解、容忍和友誼，並應促進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

(三) 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種類，有優先選擇的權利。

第二十七條

(一) 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

(二) 人人對於由於他所創造的任何科學、文學或美術作品而產生的精神的和物質的利益，有享受保護的權利。

第二十八條

人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的和國際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本宣言所載的權利和自由能獲得充分實現。

第二十九條

(一) 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

(二) 人人在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

(三) 這些權利和自由的行駛，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

第三十條

本宣言的任何條文，不得解釋為默許任何國家、集團或個人有權進行任何旨在破壞本宣言所載的任何權利和自由的活動或行為。

聽順口溜，說大陸事

黎音

摯友某君自大陸來，分手數載，相見甚歡，通宵暢敘別情，促膝長談。當問及目前大陸情況時，某君表情陰郁，半晌沉默啞言。追問何故不語，答曰：「老友重逢，所慮時短，講點愉快的事吧，何苦尋那些掃興的話頭？」我奇怪地問：「國內的形勢怎麼如此不樂觀？甚至你連談都不願談。」某君答曰：「好消息請你看人民日報海外版，若談存在的問題，真是堆積如山，好似螞蟻啃西瓜，不知應從何處開

口，況且你聽了也會心寒，還是不說罷。」他越迴避，我越好奇，於是在我不斷地催促下，某君只得讓步：「那好吧，我就從目前國內流傳的幾個順口溜談起，大概你可以從中看出一些端倪。」

其一：

鄧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若論搞政治運動，共產黨確實是遍地兇貓猛如虎，但搞經濟可就慘了，

包括鄧小平在內，都是徒有貓名不會捉老鼠，甚至連老鼠都不認識。所以經濟改革搞了十年，落到眼下這般地步，矛盾百出，困難重重，使相當一部分民衆的實際生活水平都下降了，民間流傳着「回到了解放前」的說法。可是，許多「黑貓」、「白貓」却利用改革之機大撈油水，大發改革、開放的「國難財」。為此百姓十分氣憤，有順口溜道：

黑貓白貓一大堆，可嘆能力太低微。

眼看老鼠抓不住，邪門歪道各自肥。

其二：

當今國內的經濟改革如破船觸礁，無法在激流中繼續航行，只得暫且停船補漏。中共決定集中精力「治理經濟環境」。但大陸經濟環境的「污染」有其特殊的根源，並非那麼容易治理。倘若真正去追查問題的話，多半都是屋簷下的冰溜子——根在上面。別的不講，單說中央那些有實權高幹的子弟，有幾個不是借助老子的力量中飽私囊或享受各種特權的？有什麼辦法能沖破他們的關係網，而將「治理」的矛頭真正觸到這些特殊公民的身上？據說陳雲會對中央高幹發出「管管孩子」的呼籲；又傳說他在一次中央的會議上講過：「除我和鄧（穎超）大姐之外，誰敢說他在外國銀行沒有存款？」陳雲是否講過上述的話，現在尚無確切的印證，不過民間有如許傳言，足見民衆認為中共的高幹們實在沒有幾位可以稱得上是清白的。

有順口溜道：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招牌值萬貫。

老子撐腰兒出面；老子有令兒去幹；

戲法靈不靈，全在父子變。

其三：

改革整整進行了十年，當初人民曾樂觀地向往，通過改革可以迎來一個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然而，現在希望落空了。「文革」十載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改革十年帶來的是一片混亂。有什麼能比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更能影響千家萬戶的生活？因此，民衆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有順口溜道：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東西亂漲價。

改革整十年，天天盼翻番，盼來又盼去，

回到解放前。

工薪長一寸，物價漲一尺，抬頭看一看，

困難無休止。

其四：

中共立下「雄心壯志」要開發海南島，設想使海南省在經濟上變成第二個台灣。於是吹打打好不熱鬧，一時間掀起一股海南淘金熱。其狂熱程度不下於當年發現美洲新大陸。且看那些有特權關係者，爭相蜂湧，捷足先登，大有跑馬佔荒之勢；膽大的冒險家們也接踵而至，幻想一夜巨富；就連小偷、妓女、騙子、逃犯也視海南為安樂窩，競而往之做着淘金夢。當時會流傳着這樣的順口溜：

要發財，上海南，海南別有一洞天。

想撈鈔票隨你便，要搞妹子格外甜。

可是海南島真能趕上台灣嗎？實踐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共做事就是那麼風一陣、雨一陣、熱一陣、冷一陣的。既沒有民主政治作保障，也沒有完整的法規作依據，只是照搬一點資本主義經營的皮毛，竟異想天開一口氣吹出個「台灣」來，也未免將國計民生當成了兒戲。



所以在一陣喧囂過後，迅速降溫，外商怯步，國人觀望，紛紛撤兵收馬，中共的宏偉藍圖，怕是一場黃粱夢。接着又有順口溜道：

想海南，到海南，只望海南趕台灣。

怕是一場黃粱夢，空喜一陣夢難圓。

其五：

朋友說，如今大陸形勢不寧，人心渙散，多數人對現實沒信心，對前途無希望，由此而滋生出許多畸型社會現象，總的來說可以用倒（倒買倒賣）、假（說假話、辦假事）、吹（吹牛撒謊）、苦（生活貧苦）、罵（不滿罵街）幾個字來概括。有順口溜道：

十億人民五億倒，其餘五億難溫飽；

十億人民六億假，其餘四億在裝傻；

十億人民七億吹，其餘三億也在追；

十億人民八億苦，其餘兩億是後補；

十億人民九億罵，剩下一億裝啞巴，

啞巴嘴裡吃黃蓮，有苦不訴口難言。

……

其六：

現在大陸青年的立身之道有四條：（一）讀書攻學位（謂之「黑路」）；（二）入黨做官（謂之「紅路」）；（三）做生意發財（謂之「黃路」）；（四）出國定居（謂之「綠路」）。黑、紅、黃、綠四條路，唯有「綠路」（出國）最受羨慕。所以都拼命鑽「門子」想出國，只要能出國，其他幾條路都可以不走，足見人心之向背矣。有順口溜道：

黑紅黃綠四條路，其中唯有綠道妙。

出國簽證能到手，黨票鈔票全不要。

朋友某君平靜地講述完了他所能憶起的幾則順口溜，雖然沒有驚人的妙語，沒有重大的內幕消息，但却給我留下了無盡的回味與思考。

爲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

胡平



一九五三年索爾仁尼琴從勞改營釋放時的留影

爲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既然我們經歷過比蘇聯人還要深重的苦難，既然我們擁有幾千年的偉大的文學傳統。

不錯，打倒「四人幫」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壇上也出現過一些激動人心的作品。毫無疑問，「新時期」（一九七六—）十二年的文學成就遠遠超過了共和國的前二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但是，無庸諱言，我們的作家還沒有創造出足以震撼世界的巨著。有些作品，在其問世之初，固然也引起過一定規模的轟動，然而短短幾年之後我們再回頭去審視，它們便大都失去了昔日的魅力——它們

索爾仁尼琴？

一般都缺乏經久的價值，沒有「歷史」意義而只有「歷史的」意義。我們不必責怪我們的作家對不起我們的時代或我們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作家對不起自己。趙翼詩云：「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經受了無窮磨難的中國作家們爲什麼不創造出真正偉大的作品？中國，爲什麼還沒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

二

說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我們之所以沒有產生像索爾仁尼琴一樣的作家，在相當程度上竟是因為我們的作家自己大都並不想成爲索爾仁尼琴。

當今世界，沒有比中國作家更對諾貝爾文學獎朝思暮想的了。他們希望像索爾仁尼琴那樣成爲諾貝爾獎主，可是，他們之中也許是大多數人却害怕陷入索爾仁尼琴的困境。

怕什麼呢？是怕被扣上「反蘇」（反華）、「反共」的大帽子嗎？和索爾仁尼琴相反，中國的作家、特別是那些願意觸及重大敏感的社會政治問題的作家，通常都很注意表現出靠近共產黨、或者說是靠近共產黨改革派的姿態。他們最喜歡扮演的是共產黨內的自由派的角色：

讓共產黨（主要是黨的某些高級領導人）看來是共產黨；讓自由派（包括海外的、西方的自由派）看來是自由派。至少是，他們很怕和共產黨開僵。這倒不一定意味着他們對共產黨有所偏愛，而是因爲他們深深知道，作爲一個中國（大陸）的作家，一旦和共產黨開僵了，他就差不多等於是被剝奪了寫作（嚴格地說是發表自己寫作）的權利。

三

作家的生存前提是自由，尤其是言論出版自由。可惜的是，古往今來，真正實行完整的出版自由的國家並不多。控制出版是形形色色的專制統治者不約而同所採用的一大法寶。然而，只有到了共產黨手裡，這種控制才算是到達了幾乎是「天衣無縫」的地步。

迄今爲止，中國大陸依然實行着書報檢查制和思想意見罪。需要強調的是，大陸所實行的書報檢查制有其突出的特點。在大陸，不僅設立了不止一個的履行書報檢查的機關，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完全壟斷了一切出版事業，它使得每一個出版社、每一個編輯部自己都成爲書報檢查的工具。這種檢查不但具有事後追懲的權力，而且更具有事先預防的權力。在這種

嚴密的控制下，從原則上講，一切不被黨所許可的作品，都失去了變成鉛字的機會。這就比傳統的專制對出版的控制厲害多了。在傳統的專制社會裡，統治者的控制手段一般是禁書毀版，但當代極權統治者却能在製版成書之前便予以完整的禁止。如果把傳統專制社會的控制出版的方法比喻為殺人（或屠嬰），那麼，當代極權社會的方法則是在除了殺人或屠嬰之外，更加上了避孕——這就真正地做到了防患於未然。

四

當代極權社會對言論出版的嚴密控制，無疑是對文化的釜底抽薪的打擊。捷克斯洛伐克流傳着這樣一則政治笑話：一個捷克人上書捷克政府，要求政府增設海軍部。別人回答說：捷克連海都沒有，要海軍部幹什麼？這個捷克人反問道：那為什麼蘇聯要有文化部呢？

極權社會既然對出版實行如此嚴密的控制，照理說，它一定會引起全體作家的一致反對。但事實上却不盡然。人性自有其不光彩的一面。索爾仁尼琴一語破的：「魚群從來不會為反對捕魚業而集體鬪爭，它們只是想怎麼從網眼裡鑽出去。」

出版自由當然是美妙愉快的，遺憾的是，爭取出版自由就不一定是那麼美妙愉快的了。自古以來，爭取自由的最大困境在於：當着專制尚未衝破之前，誰越是爭取自由，誰越是會喪失自由。反過來，你若是不那麼熱衷於爭取自由，你若十分小心謹慎地注意不去寫那些顯然會使當權者不悅的東西，你就越是有更多的機會發表你的作品，從而越可能造成廣泛的知名度並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當然，如果你寧肯自我設限，你就很難拿出第一流的作品。一條魚要想從網眼裡鑽出去，它就一定不能

讓自己長得太大。大陸一位如今頗有名氣的理論家說過：「我決不寫不能發表的東西」。還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公開聲明：「我不願意作索爾仁尼琴」。一位年輕的朋友說：「不要去想去砸碎腳鍊，現在就是要看誰能帶着腳鍊跳舞跳得最好。」海外一批不明究裡的人，總是把我們公開所說所寫當作是我們真心所思所想。豈不謬哉？

五

凡事有利則有弊，有弊則有利。在自由社會，隨便什麼作品都可以發表，所以幾乎沒有什麼作品受到特別的珍愛。在專制社會，幾乎不可能產生什麼傑作，因此，略有價值者都格外引人注意。說來近乎悖理的是，偏偏是在專制社會中，某些作家的自我感覺才會特別良好。

對於一個作家而言，少數專家的評論固然重要；古人說「文章千古事」，自己的作品能否長期地流傳於後世也決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問題。但是，起碼是對絕大多數作家來說，當下的讀者的反應如何，才是他們最關切的問題。生活在專制社會中的作家們，一方面固然因為不能暢所欲言而苦悶，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可以從數目龐大的讀者群的熱烈反響那裡得到精神上的補償和安慰。要知道，同樣一部作品，發表在國內的官方刊物上和發表在民辦刊物上或運送到國外發表，其效果是很不相同的。

第一，只有在國內的官方刊物上發表，你才能獲得大批的讀者（民辦刊物，如果存在的話，其發行量通常很小，傳播範圍相當有限），尤其是大批的能作為知音的讀者（畢竟，國外的讀者由於缺乏類似的經歷而不容易充分理解你的作品）。

第二，一部作品能在國內的官方刊物上發表，那多少表明它在某種意義上被官方所認可，因此，一般讀者就比較敢於在公開表示他們的支持。反過來，它若是只發表在民辦刊物或國外的刊物上，一般讀者就會認為支持它可能要冒更大的風險從而三緘其口。

第三，一部批判現實的作品，越是發表在官方自己的刊物上，越是能證明本身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早在索爾仁尼琴之前，已經有不少人撰文揭露勞改營的黑暗，但不少自命為公正實則是幼稚的讀者，會認為那是「冷戰」、是「反共宣傳」或是「反動分子的以偏概全」而不肯相信。只有到了索爾仁尼琴的「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經由當時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親自批准而公開發表在蘇聯最重要的文學雜誌「新世界」之後，關於斯大林時代勞改營的黑暗才被世人所公認。

第四，如果一部較好的作品鑽了個空子得以在官方刊物上發表，當局要想消除它的影響，不得不通過公開批判的方式，其結果無異於從反面替這部作品作宣傳。無庸諱言的是，我們確有不少作品是借助於官方的批判而身價倍增的。官方的公開批判固然會給作者造成很大的壓力，但是由於這種作法會不可避免地招致國內外公眾的強烈關注，那反過來倒給作者增加了幾分安全度。畢竟，「毛澤東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當局在壓制言論方面比以往謹慎多了。近十年來，因為官方刊物上發表作品而鐐鑼入獄者幾乎是沒有的。相比之下，在民間刊物或海外發表作品，風險就要大得多。當局整治你多半會採取不事聲張的辦法，當局再不肯像過去有時做的那樣，把被整者的作品幫你公開發表，以「幫助廣大群眾提高識別香花毒草的能力」了。不，當局學精了。它

力圖避免有稍多一些的人能見到你的作品。當局對你的批判是不點名的、含糊其詞的。國內的廣大讀者不知其所指，國外的輿論也照例反應得很遲鈍。這就有效地防止了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抗議。這樣一來，當局對你個人所能採取的壓制手段也就更靈活、更有力。因而你的處境就更危險。

六

中國許多有才氣的作家，他們並不算敢效仿索爾仁尼琴。他們更樂意效仿的是另一位叫做欽基茲·艾特馬托夫的蘇聯作家。艾特馬托夫是蘇聯吉爾吉斯人，共產黨員。由於他和蘇共某些上層領導有特殊的關係，以及在政治上始終注意「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譬如說，在公開場合下加入對持不同政見者的例行公事的譴責），他被蘇共領導所認可。利用這種政治上的保護，他在自己作品中有選擇地觸及到了一些一般人所迴避的社會問題，贏得了自由派的鼎鼎名聲。許多中國作家所以羨慕艾特馬托夫，不僅在於他在政治上的安全和生活上的優裕，主要在於他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的左右逢源的巨大成功——艾特馬托夫受到了左中右各派人物的讚揚。當然，他偶爾也會做出一些脫離官方的事情並因此而付出一些小小的代價（他曾經被禁止出國旅行一年），但總的說來，官方願意容納他，而他則小心地避免自己和上層鬧僵。這好比在一個天花板十分低矮的體育館裡比賽跳高：你既要努力跳得很高，同時又要提防着別撞上天花板碰破腦袋（輕輕碰一下自然無妨）。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固然也可能取得某些好成績，不過要想創世界記錄恐怕就

不太可能了。

最近，白樺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講演中坦率地承認，他在提筆寫作時總是背着一個沉重的

包袱，他總是要不斷地去猜想自己要寫的作品「能不能發表」，也就是能不能通過國內官方刊物政治審查這一關。事實上，我們的作家，即便是拼盡了全付氣力，是不是一定能突破世界記錄，那恐怕還是個疑問；而既然他們首先自己就要保留下兩三分氣力，他們還有什麼希望贏得勝利的桂冠呢？也許，我們不必把諾貝爾文學獎看得太重。畢竟，歷年來獲得此獎的作品，真正堪稱傳世之作的也並不多。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要說出我們所想要說出的一切？抑或還是僅僅爲了近功急利的成就而甘願自我設限。

白樺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坦然向世人承認，他以往的作品，實際上都還是自我設限的產物。這就不像另外某些作家，至今仍然「自我感覺良好」，對爭取真正的自由缺乏興趣。滿清一代，中國的訓誥考證十分發達，那固然是統治者厲行文字獄的惡果，但何嘗不是知識分子道德勇氣墮落的表现。共產黨治下近四十年，文化禁錮更是超絕前人，「文化革命」中文網之密，網成了布，連小魚小蝦都無可逃遁。然而在「文革」之後，又有多少人敢於起來爲粉碎文網而進行正面的英勇鬪爭？僅僅是網眼略寬了一些，許多人就喜不自勝。對「新時期」七年來文學成就的一味稱頌，難道不正是這種苟安心態的充分反映？不錯，連索爾仁尼琴本人，也是因爲在蘇聯的官方刊物上發表了「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而聞名世界的，但是，真正使索爾仁尼琴在世界文學史上留下不朽聲名的，還是他那部在暗中醞釀寫作多年的、完全擺脫任何自我設限的「古拉格群島」。

七

偉大事業多半是在暗中完成的。耐不住寂寞歷來是作家的頭號死敵。這對於今日之中國

作家而言尤其如此。你耐不住寂寞嗎？你急於成功、急於造成轟動、急於贏得盡可能多的讀

索洛維茨街城——古拉格群島



者的喝彩嗎？你就必然會拚命爭取在官方文壇上謀求一席之地並唯恐失去它。爲此，你就必須削足適履（除非你的足本來就不大）。像白樺、劉賓雁這種勇敢的正直的作家，長期以來都盡量約束自己不要突破官方給定的界限，這樣，他們怎麼能寫出他們的最高水平？

曹丕說得好：「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爲它能夠「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揚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但是，人無遠憂，必有近慮。如果你只顧追求當下的成功，「營目前之務」，你就會搞不出有十足份量的東西，「而遺千載之功」。這才是「志士之大痛」啊！

我們知道，古人尙且有抱持着「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信念從事寫作的。爲什麼今人就如此地缺乏長久的眼光呢？更何況，「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到底還沒有插遍全世界；普天之下，還有的是不屬於「王土」的地方。「古拉格群島」就不是在蘇聯官方刊物上發表的。更何況，當今世道，變起來快得很。四年前美國出版的索爾仁尼琴傳，最後一句話還寫的是：「也許，索爾仁尼琴不可能再回到俄國，但他的著作終究有一天會回去的。」到了今天，索爾仁尼琴連人帶書馬上就要光榮地返歸故土了。而艾特馬托夫們又在哪裡？當太陽曠薄而出時，星星的光輝就顯得很黯淡了。享有和艾特馬托夫不相上下的自由派聲望的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最近發表文章痛切地譴責自己這一類人，因爲他們以牢騷、以容忍代替了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的行動。「我們喪失了道德良心」，「我們充當了犯罪的同謀」，「我們羞辱了我們自己」。是的，面對着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這樣真正的勇士，他們的確是有愧的。

我當然不是反對利用現成的官方刊物，正像我決不籠而統之地反對急功近利。忍受寂寞的滋味畢竟是很不好受的，但我們決不能因耐不住寂寞而閹割自己。遲暮之年的巴金，終於掙脫了三十多年的心牢，寫下了「真話集」等五部隨想。可惜的是，他已經做得太晚了。平心而論，巴金近來發表的這幾部隨想都並沒有多高的文學價值，其見識也無過人之處，因爲他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再去創造出第一流的作品了。我懷疑，時下中國一班享有盛名的作家，有幾個還有足夠的「後勁」能寫出真正的傳世之作。當一個人把他大半生積累的豐富感受，迫不及待地以一種官方規定的低廉價格一批又一批地賣掉之後，即使他有心要再創作一部真正偉大的著作，只怕肚子裡存貨已經不夠用了。我知道，現在有一些作家，有的名氣並不大，有的甚至根本默默無聞，正在悄悄地從事真正自由的寫作。「衆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欄珊處。」未來的中國的索爾仁尼琴，也許就出在他們之中。

八

中國的文學必須要有真正的突破。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中國的作家不必去追求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們必須去追求真正的自由的創作。我們經歷過難以置信的巨大的苦難。我們之中最優秀的一批人，有許多甚至沒能活到今天。我們究竟有什麼理由還在那裡容忍罪惡、容忍專制，津津樂道於「盤算着怎樣從網眼裡鑽出去」，並爲一點有限的成就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人生很短。如果我們還不肯放開喉嚨，大聲說出我們心中的一切，如果我們還不肯努力奪回我們固有的自由權利，我們將永世蒙羞。面對歷史，面對我們的後世子孫，我們將無地自容。

你想合法留在美國嗎？請找 律師 Roland Gell

專辦

H-1 簽證
政治庇護
婚姻案件
遞解出境

工作許可
學生簽證
刑事犯罪
意外訴訟

超速罰款
違章駕駛
執照吊銷
房屋買賣

請電話預約：

(212)619 5520

(212)619 2859

免費保密 諮詢



地址：299 Broadway Suite, 420, New York, N.Y. 10007 (Near City Hall)

啓蒙的悲劇

——“五·四”運動批判

明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可能會形成全國性的「五·四」熱。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五·四」，也許能看得更清楚些。現在，本文主要想談的是「五·四」的局限，或者說是「五·四」啓蒙運動失敗的原因。林毓生寫過一本「中國現代意識的危機」，是談「五·四」的局限性的。林氏認為「五·四」運動失敗的原因有二，一是「思想意識救國論」；二是「全盤西化論」。對於第一點我同意，但對「全盤西化」我持保留。我認為，「五·四」的失敗不在於「全盤西化」不適合中國當時的國情，而在於「五·四」運動在表面上是全盤西化，但在骨子裡却是傳統文化，是中國現實中傳統的勢力太強，以至於當時最激烈地反傳統的知識份子骨子裡仍然是傳統的。而造成傳統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對自身的文化、政體、經濟，也就是對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的腐朽缺乏內在的自覺。與西方相比，中國近代的啓蒙運動不是中國人內在的自覺要求，而是被外來壓迫逼出來的；是被迫的。而西方的由文藝復興開始的啓蒙運動，則是一種沒有外在逼迫的內在自覺，是西方人自覺地意識到基督教文化和專制主義的腐朽而主動地要求改革。

因此，中國的啓蒙無論在「洋務派」、「維新派」那裡，還是在「五·四」運動那裡，都不是爲了改變中國人自身的奴隸命運，而是爲了應付外敵，是爲了保住華夏帝國的中心地位，所以一切改革的措施的出發點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民族的振興，是權宜之計。中國人的封閉性使之很少主動地走向世界，而是被迫面向世界。有人常常說中國人曾經開放過，唐代是明證。但是唐代的開放與「鴉片戰爭」後的開放非常不同。唐代所面對的世界僅僅是東

方文化圈，而且大多數是受中國文化輔射的文化圈。這種開放沒能爲中國文化提供一個先進的異質參照系，以促成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覺醒，從而進行改革。相反，那些異域文化遠比唐代落後，與他們相比，唐代文化佔據着絕對的主宰地位，異域文化根本無法與漢文化對抗，只能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和同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對落後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種進步，殖民化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了現代化的進程。殖民化打開了一個個封閉的地域，開拓了一個個商品市場和文化市場，使整個世界，特別是東西方不再相互隔絕，而是相互開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來只屬於西方人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競爭帶給了世界，形成了國際性的自由競爭。沒有殖民化就沒有世界化、國際化。的確，殖民化是不平等，人類爲此付出過巨大的代價。但是沒有這種不平等，那些落後愚昧的，處在封閉的專制主義統治下的民族就不會有內部的民主、科學的要求；不爲殖民化付出代價，就要爲專制主義付出更大的代價。再強調一遍，沒有鴉片戰爭，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文化，就不會產生落伍的恥辱感，而沒有落伍的恥辱感也就沒有改革的要求，就會永遠陶醉在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的夢中。

正因爲中國人的啓蒙不是內在的自覺，而是外在的強迫，所以，中國的啓蒙一開始就是畸型的；在維持傳統的前提下要求改革或反傳統，結果只能是虛假的改革和反傳統。這種畸型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沒有人的解放的啓蒙

啓蒙的目的是保住傳統、振興民族，而不

是改革傳統、解放人，特別是解放在專制主義下的每個中國人。先前的民族主義目的使中國的啓蒙沿着「中體西用」、「師夷之長以制夷」的方向發展，改來改去，不是爲了每個中國人過一種人的生活（平等、自由的生活），而是爲了保持住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因而，中國的啓蒙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與西方的啓蒙完全相反的路綫。西方的啓蒙是內在的自覺，以個體的人的解放爲目的，從「個性主義」、「自然人權」、「平等自由」開始，進入到私有制、民主政體、言論自由、法制原則、競爭原則。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有一個最響亮、最醒目的口號：人是目的，解放個人最關鍵的步驟就是確立私有財產的神聖地位。

而在中國，永遠是民族高於人，群體高於個體，即便是啓蒙時期亦如此。中國的啓蒙以振興民族爲目的，從民主政體走向自然人權。私有觀念在中國人的眼中永遠大逆不道。一系列啓蒙的著名人物都對「私」字深惡痛絕，而對「公」字頂禮膜拜，孫中山不是也高揚「天下爲公」嗎？中國人沒有意識到，人從專制主義中解放出來的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變封建主義的公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爲資本主義私有制，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是個人權利得以全面實現的基礎。

盡管到「五·四」時期，個性主義思潮盛行一時，但是在沒有明確私有財產對個性解放的重要意義的情況下，任何個性主義、民主、自由的口號都無法確保個人權利的實現。也就是說，西方啓蒙以個性主義爲目的，其具體措施首先是確立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無論在英國，還是在法國，商品經濟都是從皇家公有財產的私有化開始的。而中國啓蒙以民族主義爲目的，其具體措施先是堅甲利兵，繼而是

君主立憲和共和，就是不強調私有財產。因而，中國啓蒙運動中的個性主義一方面因失去了經濟基礎而變成虛幻的裝飾，另一方面成爲民族振興的一個工具或手段，而不是目的。與此相關的就是對「公有觀念」的維護和對「私有觀念」的仇恨。而民族主義、「天下爲公」正是中國封建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像陳獨秀、李大釗等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也很少談到「私有觀念」的問題，反而，「十月革命」一勝利，他們便放棄了民主而轉向了「天下爲公」的蘇聯，甚至把民主與資本主義制度對立起來。

今天中國的啓蒙，必須吸取「五·四」的教訓，強調個性主義高於民族主義，私有觀念高於公有觀念。遺憾的是，即便在今天，我們的理論界仍然在重彈民族性的老調，重演封建社會是私有制的老劇。當用民族代替了個人，用公有制代替了所謂的封建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時，中國的改革只能原地踏步。我們理論界的盲目、糊塗、幼稚和劣根性未除，其重要表現就是用私有制來爲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劃等號。而在事實上，封建主義不是私有制，中國的封建社會就更不是私有制，而是地地道道的國家所有制，人與土地都歸國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皇臣。就是翻開馬克思的著作，他對西方中世紀經濟體制的描述也不是私有制，而是經濟共同體。而且，中國封建社會的公有制還帶有奴隸社會的性質，它在當代中國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大躍進時期的供給制。吃飯不收錢的時代只在奴隸制中存在，因爲奴隸本身連人都是公有的，何況他的物質消費。真正的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其標誌就是用法律的形式來確立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在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總統無權給與和沒收個人的任何財產，即便此人犯罪了

，財產仍然是屬於個人的，國家無權干涉。而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皇帝有權賜給和沒收任何人的財產，一人犯罪，禍及九族，更不必說財產了。

即便從邏輯的角度講，說封建主義是私有制也講不通。從整體結構的對比中，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在經濟、政治、法律、觀念等等所有的點上都是完全對立的，爲什麼偏偏在私有制上是共同的？難道整體結構完全不同的兩種社會制度，會在經濟所有制上完全相同嗎？中國人始終認爲封建主義是私有制，完全是傳統遺傳下來的。在當代，講這種理論的人，要麼是說假話，要麼是愚昧無知。因此，中國的改革必須是整體性的，離開了整體的變革，任何局部的修補補都無濟於事。

還有一點必須強調，現代化（商品經濟、民主政體、法大於權、言論自由、自由競爭、個性主義）是個國際性的歷史進程，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因而，中國改革的目標十分明確，是自明真理，根本不用論證、討論。應該制定一系列可行性的改革措施，使我們不斷地接近現代化這一明確的目標。而在當代中國，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化，也就是在現代化中注入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其結果只能使本來清晰明確的改革目標變得模糊不清。能說清的是現代化，說不清的是民族特色的現代化。因爲民族性本身就說不清。

當代中國文化界的「尋根熱」是建立在一個虛構的前提下的：中國傳統文化斷裂說（五·四與文革二次斷裂）。而在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從未斷裂，「五·四」運動的失敗就是傳統文化的勝利，「文革」則是封建主義的全面復活。因此，中國人無根可尋，或者說根本不用去「尋根」，根從先秦一直延續到當代中

國從未斷裂過。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是傳統文化這條千年不死的劣根的一部份，是這條根所生長出來的果實。進行改革，追求現代化就是要斬斷這條劣根。我不明白，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至今的改革，中國人爲斬斷劣根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終究沒能斬斷，爲什麼當代中國人還要小心翼翼地保持這條劣根呢？

正因為現代化是全人類的目標，而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所以選擇現代化在根本的意義下不是任何民族的選擇，而首先是人的選擇。正因為現代化使人活得更人，而中國的民族性則使人活得不人，是奴隸，所以中國人才嚮往現代化。是人與不是人（人與奴隸）之間沒法調和、互補。想過人的生活，獲得人的權利，就必須拋棄民族性（非人性）而選擇現代化。特別是在中國，必須明確在追求人的權利、生活和愛祖國之間，應該首先選擇前者。決不能變不講理或愚昧無知在要求一個人去愛把他變成非人的祖國。難道一個把所有人都變成奴隸、變成零的國家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嗎？新中國不應該是傳統中國的繼續，而應該是完全不同於傳統的現代中國。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界，民族性是一條界限、一個緊箍咒，甚至成了權威、棍子和唯我獨尊的尺度，換言之，中國人在學術上擺脫了政治衡量一切的教條主義之後，又陷入了民族性衡量一切的新教條之中。而且，民族性所特有的道義色彩又使人們從道德的角度對它敬若神明。「母親錯打兒子」却要求兒子寬宏大量，這簡直是強盜邏輯。祖國不是人的母親，而是人的居住地，祖國無權以母親自居。退一步說，即便是母親錯打兒子，兒子也不能原諒，原諒就是遷就錯誤，慈蕩母親繼續錯打。中國古代的帝王們在愛國主義的掩

蓋下錯打了無數人，幹盡滅絕人性之事，難道就能因爲愛國主義這個動聽的名稱而原諒嗎？中國人難道天生就該愛那位屢教不改的錯打兒子的母親嗎？事實上，不是母親乞求兒子原諒，而是母親大權在握逼你不能反抗，不想原諒也必須原諒。更何況根本不是母親的人借母親之名在錯打兒子的人遍地皆是呢？

「五·四」運動的失敗，與其說是「全盤西化」造成的，不如說是傳統文化戰勝了外來文化造成的。「全盤西化」就是走向世界，是國際化、是追求人的生活。「五·四」之前的啓蒙，壓根就不是啓蒙，因爲其目標是維護傳統、使傳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五·四」的啓蒙，也是極不徹底的，當時的先進份子們所追求的啓蒙目標和所使用的啓蒙工具在表面上看是現代化的「科學與民主」，而在實質上却有着大量的傳統因素（振興民族與天下爲公）。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貫地堅持現代化的先進份子並不多，幾乎所有的啓蒙者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都背離了現代化，或回歸傳統，或面向蘇聯。而極少數堅持啓蒙、堅持現代化的人，在對現實感到無能爲力的情況下，便走了傳統士大夫的退隱式的道路。即便如胡適這樣的堅定地面向現實的啓蒙者，所用的考證方法仍然是傳統的，而在這種傳統方法的背後是傳統的思維方式和人格（尤其表現在胡適對家庭生活的處理上）。

「五·四」運動彷彿僅僅是一瞬，而更漫長的時間則是傳統的延續。從今天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從主客觀的條件上去解釋「五·四」運動失敗的原因，甚至可以不苟求於前人，但我們決不能遷就，必須以批判的態度面對「五·四」。因爲遷就前人實質上就是遷就今人，正像遷就庸人者本身就是庸人一樣。真正的啓

蒙應該是：目標——人（個人）的解放，而不是振興民族；手段——現代化（西化），也就是市場經濟（私有化）、民主政體、言論自由、法律至上、科學精神、平等競爭、多元開放。就世界整體而言，殖民化使原來只屬於西歐的自由競爭國際化了，每個國家的人，作爲世界公民都有權平等地參加這個國際化的平等競爭。但是，必須記住，給每個國家、每個人以平等的進入自由競爭的權利，並不意味着競爭的結果是平等的，相反，平等的競爭權利只能產生不平等的競爭結果，有人失敗，有人落伍；有人勝利，有人前進。但就人類整體而言，這種國際化的自由競爭無疑將加速世界性的現代化進程。這有點像奧運會，所有國家的運動員都有權站在起跑綫前爭奪冠軍（權利平等、機會平等），但是冠軍只屬於跑的最快的人，而且總要有被淘汰的人。我以爲，體育比賽不僅是爲了提高人類的身體素質和加強人們之間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從古希臘開始的這種比賽，是人類的平等之自由競爭的典範，其中蘊含着人類所追求的平等精神、自由精神、競爭精神、冒險精神，是天賦人權和自由競爭這兩大原則的最完美的體現。最優秀的運動員永遠是強有力的個人，正像最優秀的天才永遠是個人一樣。

再強調一遍，在振興民族（民族主義）和人的解放（個性主義）的目的抉擇上，立志於現代化的當代國人應該首先選擇人的解放。人是目的，國家是手段。這就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之啓蒙留給當代中國人的重要教訓之一。

尋找救世主的實用化啓蒙

「五·四」啓蒙的失敗在於中國社會沒能以人的解放爲目的來完成整體結構的現代化（西化），中國人在接受現代文化時所採取的態度是民族主義的（如前所述），這種民族主義使中國傳統文化所固有的功利主義和救世意識滲透在對現代文化的接受和對自身文化的反思之中，因而造成了這樣一種奇怪的文化現象：在接受現代文化的開放中，國人非但没有被現代化，反而進入中國的某些現代因素全部被中國化了——被中國傳統文化同化了。甚至於到今天還出現這樣的現象：在一個没有自由意識和自由權利的國家中反對自由化。



先說救世主義。衆所周知，中國古代既無民主也無法治，每個中國人的權利根本得不到經濟上、政治上、法律上、輿論上的保障，整個社會都控制在皇帝的專制權力之下。因而，中國人想得到一種比較安全的生活時（坐穩了奴隸地位），只能乞求於掌權者的恩賜、保護，尋找清官和明主。換言之，救世主義只能產生於一人大權在握而衆人毫無權利的絕對專制社會之中，反過來，絕對專制社會又依靠救世主義的支撐。這樣，臣民需要好皇帝式救世主，而皇權需要救世主義。森嚴的社會等級形成了一層層固定的主奴關係。在社會政治上，臣子需要明主，子民需要清官；在家庭關係上，女人需要好丈夫（高官厚祿，知書達禮），兒子需要好父親（有權勢），兒媳婦需要好公婆。而相對於皇權而言，所有人都是臣民，是奴隸，在這點上倒是人人平等，但不是作爲主權者而平等，而是作爲奴隸而平等，這種平等是以每個人等於零爲代價的，是非人的平等（有許多國內學者和外國學者所指出過的中國古代之平等，即是這種非人的平等）。甚至可以說，由於主奴關係是社會的核心關係，所以包括皇帝本身在內的一切人，在非人這點上都是平等的，在具有救世主義意識上也是平等的。救世主義是一種奴隸人格，這種人格在面對任何東西之時都是尋找救世主。無權無力時甘當奴隸，有權有勢時便做主子。這種救世主人格也就必然浸透到對西方文化的接受中。「師夷之長以制夷」實際上可以理解爲先當洋奴，再當洋人的主人。中國人見到洋人一臉媚相，而獨自一人則趾高氣揚的現象，就是救世主人格的最好表現。非常奇怪，中國人常常處在一種看似分裂的狀態中：既向洋人搖尾乞憐又看不起洋人，既在西方文化面前感到恥辱又

具有無法擺脫的民族虛榮心。這種奇怪的雙重性完全根植於救世主義意識，搖尾乞憐時是尋找洋主人，趾高氣揚時是想當洋人的主人。換言之，每個乞求過救世主的人都想當救世主。所以，中國人往往用西方的先進文化來人爲的提高自己的文化的地位，在借助於西方文化進行自我批判的同時又把自己的文化當作世界的救星。馮友蘭、梁漱溟、李澤厚等人都曾用西方的近現代哲學來論證中國古代哲學的偉大之處，並用中國的哲學爲世界指出方向，設計未來。西方現代有的，中國古代都曾經有過，這意思就是說，現代洋人當了中國人的救世主，豈不知中國古人是現代洋人的救世主。於是乎，儒學不僅在意識上拯救過中國人，而且能拯救世界。嚴厲點說，中國人在近現西方文化面前所感的恥辱，骨子裡是「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的信念破滅的悲哀，是發現自己坐不穩世界君主地位悲哀，正像魯迅說中國人的最大悲哀是坐不穩奴隸地位的悲哀一樣。振興民族的口號中潛含着中國總有一天要稱霸世界的救世主野心。不願當洋奴的心態之產生不是因爲想爭得做人的地位，而是因爲想爭得做君主的世界地位。「甲午海戰」中國的慘敗，使全中國人痛感中國作爲「世界中心」地位的徹底動搖，因爲在中國人看來，日本這個「彈丸之地」怎麼能打敗泱泱的中華帝國，真是奇恥大辱。要改革、要維新，以重建中華帝國的「中心地位」。這種救世主義意識表現在文化領域，便是用尋找思想救世主爲手段來重建中國思想在世界上的獨尊。只要某種外來思想在中國扎了根，那麼中國人一定就要稱之爲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絕對真理，放之於四海而皆準，靠着它中國人的意識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世界的未來就將在這種意識的指導下到來。

西方文化是一個多元的整體，是由各種不同的文化因素構成的，有些文化因素之間是對立的。在古代的希臘，是酒神與日神的二元並存；在中世紀，是世俗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二元並存；從文藝復興開始，希臘精神與希伯來精神相互對立。而且也從文藝復興開始，歐洲諸國都加入了西方文化的整體之中。意大利人的完全不同於中世紀的政治精神、商業精神、科學精神，法國的理性主義以及啓蒙時代的浪漫熱情，英國的經驗主義、貴族風度以及工業化，德國的新教倫理（路德的宗教改革）、思辯精神以及追求心靈超越性的探險精神……正是在這多種不同的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競爭之中，形成了一種具有巨大創新機能的西方文化整體。到了現代，西方文化的這種多元性又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幾乎在所有的領域中都有不同流派之間的相互競爭。也許，在某段時間內某種思潮成爲顯學或主流，但是從近代開始，從來沒有一種理論或思想能夠成爲整個西方的唯我獨尊的救世主。康德不是、尼采不是、維特根斯坦不是、馬克思不是、弗洛伊德不是、薩特不是……；每種思想、每個具有獨創性的思想家都在這種沒有主教或救世主的平等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奉獻一份精華，沒有唯一正確，沒有絕對真理。

然而，根深蒂固的救世主人格使國人的思維方式變得十分僵化，總想尋找到某種唯一正確的東西，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在政治上尋找救世主的民族也就必然在思想上尋找絕對權威。一元論的、決定論的選擇方式使國人根本不能把西方文化作爲一個多元的整體來理解，而總是在這個多元的整體中選擇一種思想來作爲唯一的權威。中國人不能沒有絕對權威，一個權威被打倒後所帶來的不是多元的、開

放的自由選擇，而是重建一元的、封閉的新偶像。用這種尋找絕對權威（救世主）的思維方式來進行選擇，無論其目光轉向哪裡，都不可能找到有活力的思想，即便找到了，也會死去。「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並未擺脫這種救世主人格和由此產生的僵化思維方式。因此，當傳統文化的偶像在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的心中破滅之後，尋找新偶像的目光便投向了西方。只要中國人認定了某種思想可以拯救自己時，就必然把它塑造成神。因而，中國人的接受外來文化造成傳播者和接受者的雙重悲劇。對於接受者來說，一個舊權威倒塌之後本來應該使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但是外來的新權威把鎖鍊重新套在接受者身上（事實上不是別人給套的，而是接受者的作繭自縛）。對於傳播者來說，本來處在多元整體中的有活力的文化，被造神者絕對化、教條化了，使其喪失了生命力。換言之，在一個多元化的、民主的社會整體中，即便是錯誤的理論也具有一定的正面價值，人們可以從錯誤中學習；而在一個一元化的、專制的社會整體中，即便是最好的理論也因被絕對化而喪失其正面價值。中國人幾乎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中用偶像化來扼殺世界上有價值的思想。中國人同化現代文化的手段極爲有效：第一步是把某種西方的思想從其多元整體中選擇出來（也就是分離出來）納入中國文化的整體之中；第二步是把分離出來的思想絕對化、偶像化。也就是把多元整體中的一個因素變成一元整體中的絕對權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命運便是如此。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僅僅是衆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種，處在與其他主義平等競爭的地位上。但是，馬克思主義一旦被中國人所接受，便成了獨尊的思想權威，其地位是最高的、唯一的指導思想。當代中國人對

馬克思主義的尊崇、敬畏、服從、注釋，就像漢代經學、宋明理學對孔子的態度一樣。即便是發展，也只能在不改變其絕對權威的地位的條件下的發展；即便是修正，也只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馬克思之外無真理。這樣，馬克思就不僅僅是思想偶像了，而且是權力的象徵。如果中國人當時沒有選擇馬克思而選擇了尼采，那麼尼采也將被偶像化，失去其破碎一切偶像的價值。與此相反，西方現代人開始對中國之儒學、老莊發生興趣，把孔子、莊子請入西方文化中去，但西方人僅僅是把中國的思想作爲衆多思想中的一種，而不是作爲唯一的思想權威或思想偶像。也就是說，從獨尊儒術到獨尊馬克思主義，具體偶像的更替並沒有改變中國人尋找救世主的人格。或者說，正因爲救世主人格未變，所以才會用一個新偶像來代替舊偶像。可以說，「五·四」時期的文化選擇，表面上是面向西方，實質上還是國人們選擇了自己的傳統；表面上是開放了，而骨子裡仍然封閉着。我以爲，關鍵的問題不在於借思想意識以救國，而在於借救世主以救國。更可怕的是，國人幾乎是本能的需要救世主。而需要救世主在根本上就是需要專制主義。每個中國人不是自己作爲一個人來面對現代文化，而是作爲皇帝的一個臣民來面對現代文化。因而，「喪權辱國」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而做了幾千年的奴隸却很少有人真正地悲哀。

與尋找救世主的心態密切相關的是，中國人在文化選擇上的急功近利的實用人格（但是，這不同於西方近代的功利主義倫理學和現代的實用主義哲學）。真有點「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味道。總是急於把某種外來理論拿過來付諸應用，不適用便馬上拋棄，再找別的，反正西方的理論多得很，總有能夠「立竿見影

的。因此，「五·四」時期與當代中國在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都帶有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色彩。短短幾年內把西方所有的理論全都「玩」過了，而對任何一種理論都缺乏認真的、深入的學術研究。有人爲了救國，有人爲了趕時髦，儘管二者有動機上的崇高與卑下之分，但在用一種功利主義的目光看待西方文化上則是一致的。

在中國人的眼中，理論永遠沒有自足的獨立性、目的性、超越性，而僅僅是工具。中國人缺少西方式的超越精神，沒有「爲信仰而信仰」、「爲藝術而藝術」的追求。而是把人的所有精神的、理論的活動都當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自然科學在中國的理論地位一直不如社會科學，其原因就在於中國人認爲它對「治國平天下」的實用價值不如社會科學。而且，中國人的功利化、實用化傾向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政治永遠居於社會的首位，其他的一切都是爲政治服務的（而西方的功利主義放在首位的是人的情欲需要和人的幸福）。哲學、宗教、藝術、科學統統圍繞着政治權力的軸心旋轉。因而，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接受也僅僅是爲政治服務的，是技術、是工具，根本無法理解西方的科學、哲學、宗教、藝術以及政治、經濟體制的深層所蘊含的精神——人是目的。在「洋務運動」中，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是爲了「堅甲利兵」，以維護中華帝國不被異族吞沒。至於怎樣通過這種引進來改變中國人的素質（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以達到解放人的目的從來不是中國人考慮的問題。這樣，西方的自然科學中所蘊含哲學精神（以人對自然的征服、確立人在宇宙中的主體地位爲目的）和思維方式（物理方法與教學方法，實證與邏輯，使人的經驗邏輯化、形式化

、理論化）便被中國人忽略了。「維新運動」極力主張引進西方的「君主立憲制」，但是包括「維新四君子」在內的大多數維新者，並不了解西方民主制的根源在於「人權」和「自由」，其目的是用社會制度來保障每個人的獨立的、自由的、平等的權利的實現。而民主制一進入中國，就變成了改良、鞏固王權的手段、工具，「通達上下之情」、「溝通君臣感情」成了民主政治的主要作用。到「五·四」時期，儘管對民主與科學的理解在性質上大大地超過了「維新運動」的水平，但是先前的民族主義目的仍然使中國人把民主和科學作爲一種實用性手段來理解。「科學救國論」和「民主救國論」就是最典型的表現。真如魯迅所說：「每一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爲濟私助焰之具」。

沒有土壤的啓蒙

上述導致啓蒙失敗的原因大都是從啓蒙者本身的內在弱點着眼的，如果把這些弱點與當時中國的現實聯繫起來，就會懂得：在一個封建主義如此漫長、如此根深蒂固，而又如此缺乏起碼的人的意識（民主、自由）的民族中進行啓蒙，肯定是十分艱難的，決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僅愚昧的大衆需要啓蒙，即便是那些啓蒙者本身也需要進一步地啓蒙和脫胎換骨。作爲中國現實的一部份，啓蒙者們本身所因襲的傳統重負就決定了這些人根本不會把啓蒙進行到底。退一步講，即便中國的啓蒙者個個都是真正的覺醒者，中國當時的經濟、政治、思想等現實條件也決定了啓蒙的長期性。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啓蒙的受挫是必然的，但這只能說

明中國多麼需要啓蒙，而決不能證明以科學與民主爲旗幟的啓蒙不適用於中國的國情，也就是絕不能證明中國不需要民主主義啓蒙，而需要另尋它途。事實恰恰證明，中國最需要的就是以反封建、建立民主制爲主旨的啓蒙。

遺憾的是，大多數啓蒙者從啓蒙的受挫中所總結出的是：中國不適用於搞民主、自由。於是統統轉向。一方面，中國人並不真正理解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中國人對啓蒙的長期性、艱巨性缺乏充分的心理準備，他們很難承受啓蒙的屢屢受挫所帶來的失望情緒。所以，「維新運動」的失敗使那些維新的闖將們一個個變成了保皇黨（康有爲最典型）；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也使一大批民主革命者得出了中國不適於民主制的結論。這些結論最集中地表現在「十月革命」之後的中國現代啓蒙者們的普遍轉向。孫中山放棄「舊三民主義」而提倡「新三民主義」，措詞激烈地批判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把西方民主視爲壓迫平民的工具，稱議員爲「豬仔議員」，並全力主張蘇聯式的民主。真是異曲同工，「五·四」運動中的一大批極爲深刻且有勇氣的反封建鬥士（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紛紛放棄了反封建的主要任務，轉而攻擊資本主義。魯迅從「左聯」時期開始的寫作，幾乎篇篇不離反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早期的那種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深刻、冷酷的剖析和批判日漸衰弱，代之以大量無聊的、相互攻擊的雜文，被攻擊者的罪名大都與資產階級有關。在早期，中國的大衆是魯迅的主要批判對象，而晚期，大衆變成了魯迅的救世主。向公衆、向青年、向一切不理解魯迅而又吹捧魯迅的人獻媚，是魯迅晚期作品的主要特色之一。他以「吶喊」、「彷徨」、「野草」、「墳」、「熱風」等作品超越於中國傳

統，居高臨下地進行無情的批判，而他的後期作品又使他回到傳統之中，爲了逃避孤獨，魯迅不能不向中國社會獻媚，向那些政治勢力投靠，向最愚昧的大眾鞠躬。正是這些先進份子們的轉向，才是最值得我們今天警惕的。這說明，在中國，即便是那些覺醒了的人也沒有完全擺脫掉幾千年傳統所塑造出的人格和思維方式。我以爲，在現代的中國反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純屬政治笑話，中國從來就沒有產生過一個叫做資產階級的社會力量，更說不上什麼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毫無民主的國家裡反對西方式的民主，只能導致封建主義的全面復活。資本主義作爲封建主義的對立面是擊垮封建主義的最有效的力量。而在中國，當封建主義還遍佈華夏大地且根深蒂固之時，却反對封建的資本主義，這豈不是爲虎作倀，倒轉歷史

進程嗎？只要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未能完成，那麼中國土地上的任何革命都將最後走向封建主義。

不能否認，「五·四」啓蒙者們放棄西方式的民主而轉向蘇聯，與當時的國際環境有極大的關係。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是極爲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加劇了這種殘酷性。軍事獨裁使西方人的民主之夢破滅。當時的許多西方的高層次的知識份子也都轉向了蘇聯。可以說，本世紀初的前三十年中，是世界性的共產主義熱、蘇聯熱。在這種國際環境中，中國那些本來就對西方文化了解得十分淺薄，而且與傳統文化又有深層血緣關係的啓蒙者，不可能具有準確的判斷力，不可能不被席捲世界的「紅色蘇聯熱」所裹挾。急於尋找出路的中國人，在民主化的啓蒙受到內部的重重阻力而難以進行下去的情況下，轉向一種新的思潮是必然



的。

這種世界性的蘇聯熱直到斯大林爲鞏固絕對的個人獨裁而進行的殘無人道的「大清洗」之時，才開始暴露出它的專制性質和致命弱點。本來，三十年代就應該是蘇聯模式的危機年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延緩了蘇聯式體制危機的全面爆發，也延緩了人類對蘇聯體制的批判性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體制在東歐、亞洲取得了勝利。同時，這勝利也意味着獨裁統治和個人崇拜達至頂峰，衰落已不可避免。五十年代，「匈牙利事件」徹底揭去了蘇聯的紅色偽裝，專制主義的橫行已經國際化了。在蘇聯控制下，東歐各國的普遍落伍不能不爲有識之士敲起警鐘。斯大林死後，對蘇聯式體制的批判不僅來自西歐，也來自東歐集團的內部。赫魯曉夫以極爲激烈的態度清算斯大林的獨裁和個人崇拜所犯下的罪過。南斯拉夫出現了「新階級」這種融入個人經歷的痛切反省，繼「匈牙利事件」後，又有「布拉格之春」、波蘭的「團結工會」。儘管在赫魯曉夫下台後，蘇聯對東歐國家的專制統治，沒能使東歐在整體上發生轉變，但是，東歐國家內部的民主要求、改革呼聲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公開化，已經成爲一把難以完全熄滅的烈火。它證明了蘇聯體制所帶來的危機已經很難再次復活，要麼改革，要麼死亡。經濟危機（計劃經濟、公有制），政治危機（一黨專制，個人獨裁），信仰危機（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使最保守的人也開始懷疑蘇聯式體制的優越性。先是從其他東歐國家開始改革，現在，東方模式的最堅固的基礎——蘇聯本身——也因搖搖欲墜而開始了以「公開化」爲口號的改革。這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獨裁的延續

在中國，東歐集團和西歐在五、六十年代對蘇聯模式的批判幾乎毫無反應（批判蘇修只是爲了爭奪共產主義世界的霸權，與現在的改革毫無關係），反而開始了一系列把專制和個人崇拜推向高峰的運動。直到「文革」這場人類的專制主義奪權才使中國人又一次醒來，面對自身的落伍、僵化和衰弱，改革的要求才開始產生。我認爲，今天的改革從國際環境看，的確優於「五·四」時期。外在環境不會像「五·四」時期那樣，使中國人產生錯覺。因而，改革的關鍵取決於我們內部。從國際和國內，也就是從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的角度，我們可以爲「五·四」運動的失敗尋找具有說明力的理由，但是，我們決不能遷就「五·四」運動的不徹底性。

從大眾的角度看，「五·四」運動的啓蒙只是少數知識份子的事，幾乎沒有在大眾中造成什麼影響。也就是說，封建專制賴以長期延續的最深厚的土壤——廣大農民——並沒有因少數知識份子的啓蒙而覺醒，甚至連聽到啓蒙之聲都沒有。而中國的現實革命又必須依賴廣大農民的支持，這樣，與西方的現代化進程相比，中國革命恰恰走在一條與現代化相反的道路上。如果把西方從文藝復興至現代的整個過程稱之爲現代化的話，那麼可以大致劃分爲工業革命時期和後工業革命時期。西方的工業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城市的資產者、市民階層、資本主義化的貴族階層，而農民和封建貴族則是被革命的對象。工業革命從社會上層消滅了貴族的專制，從下層消滅了農民，也就是從經濟方式、思想方式、政治方式（生存方式）上消滅了農業文明，消滅了農民。西方的後工業革命是工業革命的合理延續，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科學技術等工業革命的成果日趨

完善的結果。後工業革命的主要標誌之一就是逐漸地消滅了被馬克思稱之爲赤貧的無產階級。的確，現代化的進程是殘酷的，特別是在工業革命時期，使大量農民背井離鄉變成城市中兩手空空的赤貧，但是，現代化是有生命力的，它依靠自身的合理性逐步地挽回了它在開始時所造成的貧困。它所擁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不太長的時間內便創造出消滅大多數人赤貧的奇蹟。在現代西方，占人口大多數的不是雙手空空的無產者，而是殷實的中產階層和技術階層。這僅僅是從經濟的角度看。如果從人的解放的角度看，工業革命時期的無產者正是廣大農民擺脫封建的等級關係而走向人身自由的第一步。一個人可以沒有財產，但他擁有憲法所規定的作爲一個人的權利。而在封建社會，不要說一個農民，就是一個大臣也沒有人的權利。因而，現代化在根本的意義上不是經濟的奇蹟，而是人的解放的奇蹟，是人從無權利、無自由的生存狀態中解放出來的奇蹟——成爲有權利有自由的人。

而中國革命，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不具有現代化的意義。在經濟上是官僚資本、集權經濟；在政治上是一黨專制、個人獨攬大權的專制主義，思想領域便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中國革命非但沒有消滅農民，反而以農民爲革命的主力軍，正像歷代農民起義式的革命一樣。在現代，魯迅後期曾竭力提倡無產階級文學，但是他絲毫不懂，中國當時並不存在作爲一個階級的無產者。如果把無產者等同於勞苦大眾，那麼無產者就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農階級。不是改造農民，而是保護、依靠農民，這樣的革命怎麼能稱之爲現代化呢？只要農民的生存方式存在一天，中國的現代化便不會完成。換言之，現代化並不僅僅意味着推翻皇帝，更

重要的是意味着根除農民。因爲後者是前者賴以存在的基礎，基礎不徹底更新，不管建立在基礎之上的政體表面上稱之爲什麼，都無法進入現代化。中國革命成功，僅僅是農民革命的成功。但這種成功又是最大的失敗，因爲它只意味着中國社會的原地踏步，中國人生活的依然如舊，主子與奴才的關係並未改變，中國人幾千年來世代相襲的非人生活並未改變。正如魯迅所說：「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中國大眾的非人地位並不僅僅是皇帝造成的，而是皇帝和大眾一起製造的非人。因而，擺脫非人處境就不光是打倒皇帝，而且要批判大眾，使大眾覺醒——不僅醒悟到自己是奴隸，而且醒悟到使自己變成奴隸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由此可見，現代化意味着既不能寬恕皇權，也不能寬恕大眾。落實到每個中國人，就是不能寬恕自身。祥林嫂與其說是可憐，不如說是可恨，真正「哀其不幸者」，更應「怒其不爭」。

總之，中國的現實，很容易使啓蒙半途而廢，因爲中國是一個太缺少民主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民主的民族。中國的現實使國人最容易接受專制而又太少缺少專制了。滯留在農業文明中的生存方式的根深蒂固，使現代化的啓蒙屢屢被中斷。因此，立志於成爲一個人的國人，必須有付出巨大代價的心理準備，別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能過上人的生活，一旦受挫，又將重演「五·四」的悲劇。

換言之，當代國人在改革上的深入，很重要的一環就是以批判的態度面對從「鴉片戰爭」開始的改革，特別是要以批判的態度重新評價「五·四」運動。否則的話，今天最激進的改革者，明天也會像魯迅一樣誤入歧途。

布希政府對華政策分析

姜原



大選已經結束，喬治·布希將成爲下屆美國總統。今後四年美中關係如何發展，美國對大陸、香港及台灣政策有何變化，要預期日後風雲，就必須對布希及共和黨政府以往的言行及政策進行分析。

布希是實用主義者

一般人們愛把美國政治勢力分爲自由派的民主黨與保守派的共和黨。其實化分自由派與保守派不如講民主黨傾向於理想主義，共和黨傾向於實用主義更爲妥當。民主黨總統提名初選候選人之一傑西·傑克森可以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代表。前共和黨總統尼克松及雷根總統則可以說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兩黨的外交政策也基本上是以這兩種主義劃分的。在麥卡西時劃以反共著稱的尼克松，做總統時却與正處於最黑暗階段的中共做交易。雷根在八〇年競選時曾揚言與中共斷交與台灣復交，上台後却不斷討好中共，不惜犧牲台灣的利益。這些都是出於共和黨總統的實用主義。民主黨總統卡特的外交政策則是以人權爲原則。卡特政府一九七九年在與大陸談判建交時最主要的條件之一就是中共必須開放移民自由。今天大陸學生能留學美國，有些大陸移民能在今年的大選

中投票，都可以說是卡特的人權外交當年給打開大門的。

布希生於康州的一個政客世家，他爺爺、父親都曾是國會議員。大學畢業後，布希遷居到德州做石油生意，一九六四年開始從政。一九七〇年在競選參議員時被洛伊德·本森（LOYD BENTSEN，今年杜卡基斯競選伙伴）擊敗以後，布希認定參加尼克松政府會是晉升的階梯。尼克松爲人狡詐，一九七二年他一面讓出使聯合國的布希在聯合國力保台灣的席位，另一面派基辛格密訪北京達成秘密交易。布希不知其背後交易，雖在台上極爲賣力，却全面潰敗。別人以爲布希會因尼克松在背後下絆而憤怒，布希却毫無怨言。當尼克松向他要一份在聯合國派員中效忠尼氏的名單時，他再一次表現了他的忠心。結果尼氏第二次當選後，除布希以外幾乎所有的聯合國美國派員均遭撤職或降職。

布希是「老朋友」

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布希在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的十六個月中，除了參加了幾次周恩來主持的宴會而見諸報端以外，幾乎是默默無聞的。但他却給正在二起二落中的鄧小

平「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印象。

如果人們以為鄧小平前幾個月不顧一切地干涉美國內政，公開表示希望布希當選總統，是因為布希曾在中國任職彼此認識，那就錯了。鄧小平實際上是希望雷根的實用主義對華政策繼續並有所發展。在過去幾年中，民主黨佔多數的美國國會多次在西藏及大陸留學生人權問題上通過法案表明立場，惹得鄧大人大大罵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雷根政府却一直在西藏人權問題上含糊糊糊不願得罪中共，另一方面在大陸留學生問題上討好中共出賣了「留學生」，助紂為虐。對此中共極為感激，一再稱讚雷根政府的合作表現。當然布希政府一定會「表現」得更好。布希不但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舒爾茲任國務卿之前，幾次都是布氏親訪北京向中共保證不再售武器予台灣，停止任何與台灣的官方關係；而且布希聲言他的政府一定會更溫柔、和善，自然他對中共會比雷根還要和善。不過很多美國人視他的溫柔、和善的個性為軟弱，認為他是個軟骨頭。布希是不是軟骨頭，很難講清楚，但他是個怕得罪人的好人却是不假的。他在過去八年做副總統時沒有得罪過中共，今後也不會的。

布希的經濟政策

對中國大陸和亞洲四小龍都有利

從關稅優惠到不斷開放高科技產品市場，雷根政府在經濟上對中共是一路開綠燈的。布希的經濟貿易政策也不會有多大改變。前雷根政府的財政部長貝克，在大選中任布希競選委員會主任。布希的第一個閣員提名就是任貝克為國務卿，可見貝克在布希內閣扮演角色之重要。

雷根的貿易政策對東亞國家及地區是極有利的。今年參眾兩院通過的針對台灣、香港、大陸及南韓的紡織品進口限制規定，以及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貿易法案，都被雷根否決了。下屆政府同樣不會容忍來自國會的經濟保護主義呼聲。本來反對經濟保護主義，是幾十年前為傾售美國貨而提出的口號，並編出各種理由去說服別國政府。現在美國陷在自己設的圈子裡，以為不需政府關稅保護，美國工業也會戰勝日本人的挑戰。

從最近布希高級顧問的談話可以看出，布希政府將會對日本政府施加更大壓力，以期打開日本農產品市場。與開放日本工業品市場不同，開放農產品市場首先得益的將是中國大陸、台灣等亞洲國家。美國人看到東京市場上的大米、牛肉價格比美國市場上的價格貴幾倍，就以為美國農產品一定能佔領日本島。其實，當年只有麥可阿瑟才有權力主持日本投降的時代已經過去，日本農產品市場一旦被打開，中國大陸的谷物，台灣的豬肉，澳洲和巴西的牛肉會搶先登陸，美國只有加州柑橘才能搶到一席之地。去年日本的一大筆玉米進口交易就落到中國手中，把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玉米生產國氣得牙根咬。

為了減少數目仍然可觀的貿易赤字，下屆政府除了繼續通過外交壓力打開日本及其它亞洲市場外，主要還是要靠玩具克拿手的貨幣把戲。大選一過美元就開始下跌了。但日元與馬克升值的頂峰將過，不久將漸趨穩定，下一步就該輪到四小龍貨幣升值了，但這並不一定全是壞事。今年初台幣對美元升值，港幣對美元却一直不動，苦了台灣，利了香港。尤其是如果台幣、韓幣對美元繼續升值，大陸紡織品面臨的競爭將大大減小，因而處於極有利的地位。

說不定會有機會成為美國紡織品市場主要供應者。當然台幣升值對台灣並不全是壞事，只是這幾年台灣才在形勢壓迫下認識到產品轉型，開發高科技產品之重要。依島上現有的資金、教育水準一流的人才以及幾十年儲在美國的高科技人才，只要政府引導得當，二十年內台灣的工業就可以與日本齊頭併進。

其實要長期維持弱勢美元也並不那麼容易。政府財政赤字高居不下，大選後要壓出現通貨膨脹要壓利率上揚，政府對貨幣的控制也只能是有限的。大選分曉當日，道瓊指數驟降，人心已經看壞了。

中共售中東武器

是美中關係的敏感點

美國人覬覦中國大陸巨大市場已久，為打開這個市場，下屆政府將進一步放寬對華出口高科技產品及武器產品的限制。尤其是在武器市場上美國不必面臨日本、西德的競爭。

這幾年中共在世界軍火市場上非常活躍。在兩伊戰爭中，兩伊均為買主，中共發了一筆財。最近中共的飛彈居然賣到與中共無外交關係的沙烏地阿拉伯手中。沙烏地阿拉伯尚是美國盟友之一，不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美國只是代盟友以色列表示了一下關注。但美國決不會坐視中共售飛彈予利比亞、敘利亞等其它中東國家。去年美國飛機攻擊利比亞首都總統府得逞，乃因利比亞無先進飛彈。中共籌劃售利比亞、敘利亞飛彈已久，但與中共無外交關係的沙烏地阿拉伯却成交在先，原因就在於擔心美國報復。中共極想得到美國的高精尖技術，尤其是中共要想盡快解決飛彈準確性問題，就必須靠美國技術。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在美國多

次抗議下都沒有停止暗中售伊朗飛彈，直到美國宣佈暫停擴大對華技術出口時，才立即收斂。兩伊戰爭雖已結束，但美國與伊朗、利比亞和敘利亞敵意不減。今後幾年中，中共售中東國家武器問題將是美中關係最敏感的問題，美中磨擦很可能出在這裡，台灣問題反而不那麼重要了。

外交
美國政府不會為海峽兩岸統一搞穿梭

中共對美國政府的要求很特別，既不要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又要它做海峽兩岸統一的和事佬。看來美國政府只有按鄧小平的指示辦事才對。其實美國人並不理解中國人為什麼那麼喜歡搞大統一，兩岸各幹各的，相安無事，只要不會觸發戰爭，不是很好嗎？況且當前美國國務院裡沒有任何人像基辛格那樣喜歡搞穿梭外交。不過在美的華人中喜歡搞的却不少。雖然像熊玠等人目前尚無多大斬獲，但不出一年，二年必有人因此一舉成名，享基辛格第二之名。

從總體上看，貿易政策將是下屆政府對華及對港台政策的主要成份。國會也許會繼續在紡織品進口限制問題上讓中共和港台人士不高興，但這些限制很可能最後被布希否決。在政治問題上下屆政府不願也不會與中共多糾纏，尤其是兩伊戰事已畢，像售伊朗武器這樣嚴重損害美國利益的事已經過去，中共也會在售中東武器問題上變得小心謹慎。至於大陸人權問題、留學生人權問題，布希政府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是雙眼全閉，儘管美國國會時常對這些問題表達意見，但鞭長莫及，起不了多大作用，國務院和新聞總署會照行其事。

新書介紹



哲思手札

著者 胡平

胡平所著「一面之詞——哲學隨感錄」，共四百餘條，深刻雋永，妙趣橫生。去年上海「雜家」雜誌曾發表過其中一百條，後國內「讀者文摘」雜誌予以轉摘。此書原定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反自由化」之事而胎死腹中。「中國之春」今年第四、五、六、七期連載二百條，頗得讀者好評。現此書已由台灣圓神出版社出版，改名為「哲思手札」，列為中國大陸現代文學叢刊之四，售價台幣一百元。不久，該書將運至美國，交世界書局發行。香港書店亦有出售。

風雲變幻的鄧小平時代

著者 陸鏗

本書收有作者自七九年道八七年所著政論七十餘篇，內容共分「背景及總政策」、「歷史問題的處理」、「改革的困境與出路」、「新聞與言論自由」、「香港問題的解決」、「國共統一問題」、「中美關係」、「鄧小平時代的反復」和「鄧小平其人及其家人」等九部分。行文酣暢，立論精闢。由香港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售價港幣七十元。作者陸鏗系老一代著名記者，現為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

大陸知識分子論政治·社會·經濟

李少民主編

本書收有楊小凱、胡平、王紹光、唐文芳、李少民、于大海、錢穎一、徐邦泰、叢大長、周雪光、宦國蒼、趙全勝、茅于軾和陳平等十四位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的論文共十五篇，分為政治、經濟、社會哲學和海峽兩岸之互動四部分。內容十分豐富。由台灣桂冠圖書公司出版，售價台幣二百元。編者李少民現攻讀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南斯拉夫當前的

致達

政經危機及其啓示

最近，南斯拉夫隨着國內經濟狀況的日益惡化，其政治狀況也已進入了危機狀態。

今年夏季以來，南斯拉夫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憤怒群眾連續不斷地舉行了罷工和示威，並於七月十七日和十月五日兩度占領國家議會大廈，抗議生活水平下降和政府腐敗，要求增加工資、罷免政府官員和實現民主政治。

目前，南斯拉夫的經濟狀況確實已達到了潰的邊緣了。雖然有一小部分人在經濟改革中發了大財，馬路上的豪華汽車和在鄉間的假日別墅與日俱增，但是全國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二百以上，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在過去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國家的外債達二一〇億美元，光還利息便占了整個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爲了延期償還外債，今年六月南斯拉夫政府被迫與國際基金組織達成了協議，在全國施行所謂的「節儉計劃」，全面限制工人工資的增長。但在這一計劃實施後，年通脹率反而從五月份的百分之二一四九躍進至九月份的百分之二一七。這便觸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浪潮。

在今年六月「節儉計劃」一開始施行時，示威群眾的要求主要是經濟方面的，例如他們的口號是「我們要面包」。當政府官員向他們講話時，他們便高喊：「你們背叛了鐵托！」

「你們是賊！」「把偷我們的錢還出來！」「把新蓋的別墅還出來！」但群眾的要求現在已向更多的政治方面轉化。例如，十月上旬鐵托格勒的大學生進行了絕食，抗議警察在鎮壓示威群眾時的暴行，要求罷免當地的官員、要求「直接和秘密」的選舉和政治民主。

南斯拉夫最近的這一系列事態的發展，對中國的改革有什麼啓示呢？中國不是一直把南斯拉夫看成是中國改革的先行者和領路人嗎？

第一，我覺得任何一種不以民主政治爲後盾的經濟改革，都有極大的可能蛻變爲一種使一小撮特權階級發財致富的工具，而廣大人民則淪爲欺騙和掠奪的對象。南斯拉夫的情況便是個例子。示威的工人說得很明白：「這麼多鄉村別墅和這麼多『奔馳』汽車，你以爲我們工人全看不見？我們的領導人既得到了房子又得到了貸款，而我們得到了什麼？我們的貸款全泡湯了，現在頭上一片瓦也沒有。」在這場所謂的「改革」中，真正致富的只有一小撮人，其中包括掌握了特權的官員，而廣大群眾在飽受驚嚇和動盪之後生活反而下降了。這種貧富兩極分化，實際上也是專制制度的產物。

第二，南斯拉夫所謂的「工人自治制度」在經濟上已被證明是個純粹的失敗。所謂的「工人自治制度」是由工廠的工人自行選出個「工人自治委員會」來治廠，並徹底實行「利改

稅」和徹底的「包幹」和「承包」，國家只收稅，剩下的收入（包括利潤）則全由工人自己作主分。這種制度實際上是工人和老板不分，也就偏離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在這種制度下，工廠（特別是營利高的工廠）爲了使每個工廠內的工人能得到最高的收入，將竭力避免招收額外的工人。這樣便造成了整個社會極高的失業率（百分之二十）和政府極大的社會福利負擔。回顧中國現階段的改革，也有所謂「利改稅」和「包幹」的內容，並還有人在叫嚷要「徹底」實行「利改稅」和「徹底」實行「包幹」的。好吧，那我們就可以想象中國的改革也將產生至少一部分和南斯拉夫相類似的結果。

第三，不徹底的價格改革是造成官員腐化的極大的原因。南斯拉夫至今仍有許多產品的價格由政府規定，這樣便使掌握有這些產品的個人有極大的受賄機會。這種情況在中國今日的經濟中可能更爲嚴重。

第四，高通脹和高外債是兩個極其嚴重的危險信號。中國現在也已開始受到這兩件事的困擾。雖然由於提高了銀行三年以上存款的利率，前不久席捲大陸的「擠銀行」的金融風暴已經暫時平息，但是通脹的趨勢遠遠未消除。通脹問題的關鍵是：政府的開支（如文教、衛生、國防等）是隨通脹率上升的，而由於近年來的「承包」、「包幹」和「利改稅」等的措施，政府的收入是相對固定了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赤字勢必擴大，便只能多印鈔票。這便形成了通脹和赤字之間的惡性循環。這一惡性循環的問題在今明兩年中並無能解決的跡象，所以筆者敢預言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在今明兩年中勢將繼續擴大。這一循環只有當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率趕上和超過通脹率後才能制

止。關於外債，中國在過去的十年中，共花了近二百億美元去購買西方的高技術，這比日本在過去四十年中進口高技術的錢的總數還多。效益在哪兒？其中有十多億買的是高級計算機，據「人民日報」報導，這些計算機的實際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另外還進口了許多裝配

線，因缺少進口的配件而擱置不用。現在中國的外債總數已達三百多億美元，維持這些外債的費用已達整個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同時整個外債量還有急速擴大的趨勢。所以外債也是中國經濟開始面臨的一個嚴重情況。
綜上所述，從南斯拉夫最近事態的發展中

轟動全國的金元券詐騙案

台北七佈現時不修元現 馮磊

六月的廣州，是搶購風潮的中心。成爲驚弓之鳥的廣州市民急於扔掉手中不斷貶值的人幣，瘋狂地追逐着一切可以保值的東西：糧食、家用電器、金銀首飾……七月，誰也沒有想到，在人們追逐的保值品中又增加了一樣四十年前他們棄之不及、視若糞土的東西——國民黨時期發行的金元券。

一條消息在社會中不徑而走：國民黨發行金元券時，有二百四十七噸黃金在美國花旗銀行作爲儲備。現在抵押期已到，美國銀行願以美元來收購當時的金元券。廣州附近一個地下庫裡，藏有一百億元票面價值的金元券，國務院批准由「中國國際華僑信託投資公司」組織辦理兌換業務。如有單位需要外匯，只要買到金元券就可以兌換到美元。

這條傳聞不但使廣州人着了魔，而且還吸引了大批外省人，人們從北京、上海、東北、西北、西南等地紛紛湧入廣州，到處打聽金元券的行情。各路倒爺聚集在這裡，準備大撈一把。

中國國際華僑信託投資公司駐廣州辦事處

車水馬龍。前來諮詢的人絡繹不絕，當半信半疑的人們看到一個個蓋着國務院、財政部、國家經委、國家安全部和中國銀行大印的文件後，個個心悅誠服。紛紛簽訂合同，支付定金。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這家公司的定金就收了五十多萬元。

廣州市政府機構也給他們打通了，爲他們提供吃住，指派下屬機構人員陪同看貨，訂協議書，並開出各種證明。

三個月後，這個彌天大誑的肥皂泡終於被吹破了。中國國際華僑信託投資公司駐廣州辦事處的徐桂林、陳康權、羅福、董義、張相九和耿金玉被逮捕。經查明他們原來不是刑滿釋放的刑事犯，便是被通緝的逃犯。

這個詐騙案件轟動全國，牽涉到中央部委級幹部兩人，中央廳級、省市級幹部十三人，還有市級以下的幹部一百多人。有一位離休幹部在犯罪交易現場被當場逮捕。

英國人說：謊言腿短。可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與常識背離甚遠的謠傳竟然傳了三個月之久，令成千上萬人激動不已，可謂奇迹。

，我們能夠獲知中國經濟中的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危險信號。

筆者認爲，想要避免重蹈南斯拉夫式覆轍的最好辦法是實現民主政治、制止腐敗和實現真正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而民主政治和市場型經濟的實現也就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目標。

魂

·彌拉·

退縮，退縮，退縮
靈魂悄悄地脫離着軀壳
文明史上的豐碑與頌歌
頹萎的長城，悲愴的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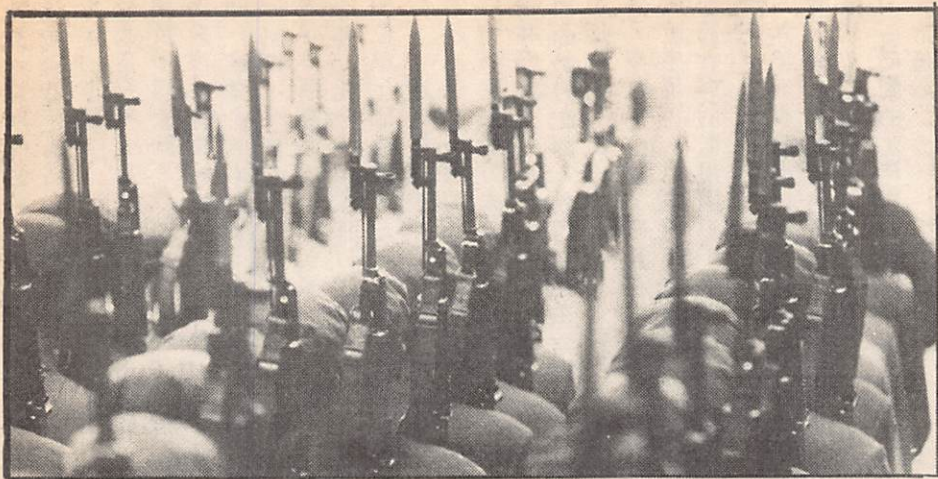
沉默，沉默，沉默
夢幻出歷代惡魔
發生過多少變革
最終仍是更重的枷鎖

失落，失落，失落
童鄉裡朝氣蓬勃
蘇醒在孤寂的沙漠
精神上巨大的滑坡

隔閡，隔閡，隔閡
投來一束束冷漠
奴性與貧困的交合
學富五車，分裂人格。

中國大陸會出現軍管嗎

胡平



現在，北京一班關心國是的人私下討論的最熱門的話題是：中國（大陸）會不會出現軍管？

這當然不是空穴來風。據悉，在準備激進的物價改革方案時，中共高層曾認真地提出過軍事管制問題。有人已擬定了「緊急狀態法」，打算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由於意見不一而暫被擱置。事實上，軍管之議非自今日始。一九八〇年年底，我們在北京大學的競選活動剛剛結束，國內其它地方也發生過一些自發的民主活動。中央下決心壓制，某位大人物就說過「大不了軍管嘛」。當中共放出這種風聲時，波蘭的軍管還沒發生呢。

這就是中國大陸。十億之眾的一個社會，至今連一份獨立的民間刊物都沒有，但中共猶嫌壓制不夠、放得太寬，還想給飽受壓制的人民再加上一把鎖，而此類話還出自所謂改革派之口，那些對中共改革派仍滿懷希望的人，能不對他們刮目相看嗎？

二

但軍管一事，實非兒戲。特別是全國性的軍管，究竟會引出什麼樣的後果，那的確是應

該冷靜考慮的。

第一，在中國搞軍管，師出無名。

中共領導人在談及軍管問題時，常常援引波蘭的先例。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實施緊急狀態法，暫時壓下了轟轟烈烈的團結工會運動。對此次軍管當作何評價，我們和中共領導人之間顯然是有分歧的。這一點姑且不論。問題是，即便從波蘭官方的角度出發，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波蘭的情況與今天中國的情況仍有巨大的差異。

一九八二年二月，著名的意大利女記者奧里娜·法拉齊曾經和當時的波蘭副總理拉科夫斯基（此公新近再一次被任命為波蘭副總理）展開過一次激烈的辯論。在這次辯論中，拉科夫斯基竭力為軍管一事進行辯護。他舉出的理由主要有三點：

（一）拉科夫斯基聲稱，團結工會不僅以言詞、而且以行動，表示放棄用對話的方式，用政治解決的方式來解決他們與政府的矛盾。他們已經着手組織工人民兵並號召舉行總罷工。

（二）出於地緣政治學的觀點，拉科夫斯基堅持認為，波蘭不可能擺脫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世界軍事—政治秩序，不可能擺脫蘇聯陣營，而俄國人顯然不允許波蘭國內的形勢再變化下去。

（三）在軍管前一個多月，雅魯澤爾斯基曾與

波蘭大主教格林普和團結工會負責人瓦文薩會談，討論把團結工會容納到政府裡面來，但遭到工會方面的拒絕。

暫且假定拉科夫斯基上述三點理由為真，那麼對比於中國大陸，我們又是一種什麼情況呢？我們還沒有像團結工會這樣的擁有一千多萬成員的（波蘭全國人口僅三千多萬）全國性的政治性組織，我們甚至連像蘇聯的「民主與人道主義」（該團體的主張是廢除一黨專政、實現政治多元化）一類非官方團體都沒有。北京大學兩位學生醞釀成立一個共產主義聯盟而被捕入獄，中國民聯則被打成「反動組織」而禁止在國內活動。中國的民主派始終呼籲對話，力主用和平民主的方式爭取民主，但依然被官方拒絕和壓制。另外，中國並不屬於蘇聯或其它大國的勢力範圍，我們不存在強大的外力威脅。如此等等。

不錯，今日之中國，確實存在着相當程度的混亂與脫序現象。但我們必須強調的是，那主要是由於官方的濫用權力，而不是由於人民的濫用權利。

以八六年大學生游行為例。這場游行的規模可能超過當年的「五四」運動，但比五四運動溫和得多。畢竟，五四時，學生們還火燒了趙家樓，而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還並沒有因此實行軍事管制。

軍管的本意在於限制人們已有的自由，但迄今為止，中國人民的自由權利連一項也不會被承認過。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陸一向是處於軍管之中，甚至比軍管還軍管。我們知道，在很多實行緊急狀態法或戒嚴法的地方，起碼還允許有民營的報刊；而我們即使是在政治氣候最「寬鬆」、「形勢」最「大好」的時候也是連一份民間刊物都沒有的。既然如此，實行

軍管，豈不意味着雪上加霜？它除了向世界說明政權與社會的尖銳對立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第二，波蘭軍隊之所以能出面接管政權，不僅是因為在波蘭，黨和政府已陷入半癱瘓狀態，同時還因為在波蘭，軍隊的威信一直比黨和政府的威信高。許多波蘭人把軍隊視為民族的象徵。雅魯澤爾斯基在宣佈軍管之夜的講演中就說到：「我們士兵的雙手是乾淨的。除了民族的利益，我們別無它求。」遺憾的是，中國的軍隊，自「文革」中「三支兩軍」（即變相軍管）以來，形象已經一落千丈。軍人在社會中早就不再受人尊崇。這兩年在搞活經濟的口號下，政府人員貪污腐化的蔚為大觀，而軍隊亦不甘人後。部隊內部的素質與風紀之差，



實不讓於政府部門。這時候讓軍隊出面，於事何補？

第三，請神容易送神難。周瑜要請出諸葛亮，是因為在他的破曹計劃中，「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唯有諸葛亮才有本事借來東風。但如今的中共領導人心中，實在並沒有一套進行改革的錦囊妙計。你把諸葛亮請出來了，什麼時候再把他送回去呢？昔日毛澤東也是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把軍人再送回兵營的（虧得有個林彪爆炸事件）。這種教訓，豈可忘記？

第四，一搞軍管，勢必引起軍方勢力的膨脹（想一想林彪勢力在「文革」中的膨脹）。軍隊干政，對原有的黨政部門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現在站在第一線的黨政領導人，大多數是文職出身，與部隊素少淵源。一旦軍管，必然會影響到現在的權力機構內部的某種變化。有些人、有些派別會借軍管之勢而加強自己的地位，另一些人的地位則會因此受到削弱乃至架空，從而引起高層內部矛盾的尖銳化。

第五，實行軍管，也會改變目前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格局。要麼，它會強化中央的權力，這就可能對近年來逐漸發展起來的地方權力造成打擊，挫傷地方權力從事經濟改革的積極性和自主性；要麼，它會強化地方權力。然而，假如地方上的黨政權力與軍方權力出現某種結合，則可能加劇地方割據的傾向和趨勢。

第六，實行軍管這一措施，本身就是對剛剛起步的經濟自主性的嚴重干擾。要知道，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之所以在某些方面能有所發展，那是和政治權力的某種削弱分不開的。許多企業家、個體戶和專業戶，之所以敢於從事一些大膽的開創性的工作，那並不是因為他們對領導者的改革目標和改革方案抱有多少信心，而是因為他們發現，領導者已經沒有足夠的

力量去阻止他們各自的發展。軍管一事則會粉碎他們的這一幻想，使他們再一次體會到權力的無處不在和無所不能，這必然會使他們變得保守、不敢冒險，或是轉而去倚賴權力（相應地，外資外商也會由於目睹強大的政治干預而顧慮重重）。一旦這種對權力的畏懼心理和依附心理加強，則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更難推行。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一旦實行了軍管，改革的深化幾乎便是不可能的了。

第七，實行軍管，當局必然會進一步加強對思想文化方面的限制，加強對爭取民主和法治的知識界及廣大人民的壓制，從而使得經濟改革越來越失去人民的自覺支持，並導致社會矛盾的對抗性發展。實行軍管的可能是唯一有效的一個後果就是：它也許能在一個短時期內成功地使社會上的批評反對聲音沉默下去。但是，如果目前所有的這一絲微弱的批評反對聲音被迫沉默，權力的腐化與濫用現象勢必變本加厲，那就會更迅速更徹底地使改革本身走向自己的反面。然而，由軍管引出的反面效果越嚴重，當局越是騎虎難下，一般來說，他們也就越是會採取進一步的強化手段。到頭來就會出現爲了軍管而軍管、軍管爲了維持軍管自身而進行軍管的異化局面。改革的計劃無形中已被放棄，而「全面專政」的幽靈却借屍還魂。中國人民將會發現，他們所面臨的只不過是一個毛澤東式的極權專制的翻版而已。

簡而言之，目前中國經濟改革遇到的種種困難，都不是靠引入軍管可以解決的。相反，軍管只會造成一系列新的、更棘手的困難。這是一種比疾病本身還壞的治療。

三

有些天真的經濟改革家向我們講到南朝鮮和智利的例子。這兩個國家在朴正熙政權和皮諾切政權治下曾經取得了可觀的經濟發展，而這兩個政權都是軍事政權。這種比附完全是不恰當的，因爲它混淆了不同的概念。朴正熙和皮諾切是用軍事政變的方式上台的。我們不能把由軍事政變產生的軍事政權和眼下談到的軍管制相提並論。後者是原有政權的一種補充或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前者則是對原有政權的否定和取代。兩者的基礎不同，效果也就有異，不可等量齊觀。

幾個月前，正當激進的物價改革方案預備出台時，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派人去了智利考察，回來後彙報說，智利的通貨膨脹比中國嚴重得多，但那並沒有妨礙智利堅持物價開放。據說趙紫陽當時就問，智利人民受得了那麼高的通貨膨脹，爲什麼中國人就受不了。

既然不少人提到智利，我們也來說幾句。不錯，把智利的經濟改革與中國的經濟改革作比較，確有一定的意義。因爲智利過去也搞過一段時期的「共產」。

一九七〇年九月，馬克思主義者阿連德當選爲智利總統。上位後，阿連德即大刀闊斧地推行他的「社會主義政綱」。其主要措施有：以沒收及補償的方式把大產業收歸國有；大部分土地由國家經營；銀行及其它金融業也逐步國有化；國家控制價格、工資和利息；政府管制對外貿易。在短短兩年多時間內，阿連德的「共產」方針就給智利的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惡果，招致了包括一向支持他的左派青年學生的強烈反對。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軍方發動了一場流血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政權，建立了軍政府。

軍政府上台伊始，便積極貫徹「經濟復興

計劃」。這套計劃是明確的市場經濟爲方向，具體的辦法包括：恢復價格及利率的自由浮動；將絕大部份公營事業轉爲民營；減少關稅及其它相關的限制；促成資本市場自由化並制訂新的勞工商議工資法；政府一面提高稅收，一面減少支出來平衡預算；控制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中以國民教育和就業爲主。

幾年之後，智利的經濟形勢確有明顯好轉。儘管到今天爲止，智利的經濟仍有不少困難，諸如失業率偏高、投資率偏低、貧富差距過大以及物價上漲，但總的來說，一般人都承認智利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

假如說今天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也是朝着市場經濟取向，那麼，中智兩國在起點和目標上便都十分相似。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其間的重大區別。

首先，智利畢竟只搞了三年的「共產」，而中國却足足搞了三十年！中國大陸「共產」的程度之深、廣度之大、力度之烈，除了東埔寨之外，在整個世界、包括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這就是說，在中國，舊體制所遺留下的毛病遠遠超過智利。

更重要的一點也許是，智利的軍政府從一上台就着手推行明確的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它緊緊把握住了時機。中國的經濟改革則遲遲地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直到今天，中共還沒有明確肯定私有財產，市場一直是半開半閉，價格依然是雙軌並存，等等。鄧小平最大的失誤在於，他沒有及時地和毛澤東留下的那套「共產」經濟體制一刀兩斷。

在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間，大陸流傳一則小道消息：面對着「文革」之後的經濟局面，陳雲說，無外乎有三種辦法，一是照老樣子幹下去；二是修修補補，進行局部的改革；三

是推倒重來。最後是採取了第二種辦法。我懷疑這個消息的真實性，不過爾後中共領導大體上是沿着第二種路線在做，那倒是個事實。固然，以後的改革幅度有不斷增大的趨勢，但若是說已經從根本上走上了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道路，那肯定還談不上。

假如中共領導及時抓住了「文革」結束後提供的大好機會而堅決地走上自由經濟道路，以後的經濟形勢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產權從一開始就予以明確界定，便不會發生現在這種普遍出現的殺雞取蛋式的短期行為，也不會發生原國有財產借改革之名變成無主財產而被侵蝕耗費的可悲現象。

如果從一開始就明確改革方向，定出一整套相關的法律，我們就有希望建立起正常的經濟秩序。那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理論與實踐脫節，政策法令改來改去，從而使守法精神根本無從建立，正確的規則也沒人肯去認真遵守，結果是造成了越益嚴重的混亂狀態。

如果從一開始就真正地開放市場，固然也會產生物價上漲、機會不均和貧富之間差距拉大等後果，但大多數人民會理解到那是改革的必要代價，而這筆昂貴的代價是因為前一任政權所犯錯誤留下的痛苦遺產，他們就會在接受既成事實的思想基礎上，採取向前看的積極態度。這就不像現在，政府顯然已經不能把改革中出現的各種困難再都算在前任政府帳上，民眾不能不意識到這些惡劣現象很大程度正是來自現任的政府自身，因此他們當然不願意逆來順受。更何況，在改革缺乏明確方向、從而也就缺乏嚴格法紀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官員必然以空前的速度腐化墮落，並造成一治弊則無一效，掣肘却有萬能」（梁啟超語）的局面，廣大民眾必然會採取強烈的抵制態度而決不會去

諒解合作。

簡言之，即便我們承認，爲了完成經濟制度的根本改革，某種程度的強制手段乃必不可少（？）；那麼，要使這種強制手段能達到它應達到的目標，它必須從一開始就斷然宣佈和舊體制一刀兩斷，它必須從一開始就確定自己的改革方向，它必須從一開始就嚴格保證政府的廉潔與效率，如此等等。與此同時，我們還不要忘記，智利的軍政府雖然不是民主的，但它仍然顯著地不同於共產黨式的專制。它沒有以一套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作武裝，把自己神化爲客觀歷史規律的唯一代表，從而先驗地排斥了一切當下的以及未來的被取代的可能性。皮諾切特壓制反對活動，不過，人們一般承認，他對於「個人權利還表現得有點知覺」。這對於經濟自由化的推行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它對於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也不完全是消極阻礙的。前不久，智利人民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宣告了軍政府的終結。而世界上有哪個一個掌了權的共產黨人同意過人民有權用自由投票來決定它自身執政的合法性呢？

如果有的中共領導人真的打算從智利軍政府那裡學得一點經驗的話，那麼他們至少要做到以下兩點：

(一)明確宣佈放棄四個堅持，承認公民個人權利；

(二)明確宣佈實行私有制的市場經濟。

只有在做到這兩點的前提下，中共政府才可望它的經濟改革能得到人民的理解與支持而得以深入發展。如果它始終拒絕做上述兩件事，却硬要學人家搞什麼鐵腕政策，那只能給民族帶來更巨大的災難。

四

新疆有一則關於阿凡提的笑話。有一天，阿凡提的老婆叫阿凡提去打一斤油。阿凡提端了個碗來到油舖。伙計把一斤油倒在碗裡後，發現還剩了一點油盛不下，阿凡提就把碗翻了過去，指着碗底說：「把剩下的一點倒在這裡吧」。回到家中，阿凡提的老婆驚呼：「怎麼一斤油才這麼一點點？」阿凡提不慌不忙地把碗又翻了回來，說：「這邊還有呢」。

這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困境：當初搞「共產」，無異於把盛滿了油的碗翻了過去；如今搞改革，又等於是把只剩下一點油的碗再翻了回來。結果便是：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固然是早已放棄，而社會主義那點優越性也給丟掉了。

喜作豪言的毛澤東曾經講過：「西方資產階級有的，我們要有；西方資產階級沒有的，我們也要有。」他老人家沒有想到，他這句偉大的預言竟然以一種極其荒謬的形式應驗了：今天的中國大陸，無疑有着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毛病，同時又還有着別人沒有的屬於社會主義的一切弊端。所有的人都對中國共產黨提出批評，因爲你從任何一套價值標準出發，你都很難找出其中有什麼可以誇獎之處。也許，我們可以肯定共產黨的唯一一點是，它好歹還在搞改革。但是，改革越多，麻煩越多，這却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中國的經濟改革搞了十年，現在真正是到了進也難、退也難的尷尬地步。擺脫這種困境的出路何在？很簡單，那就是放棄四個堅持的神話，好在今天的中國人、上上下下都沒有幾個人再相信它了。要是讓一套誰也不信的神話束縛住億萬人民的頭腦和手脚，同時又指望在這種束縛之下取得真正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那可是在古今中外都沒有先例的。

私有經濟一瞥：

楊天樹

堅冰下的潛流

國營的堅冰和私營的潛流

一九八六年一天，趙紫陽帶着體改所副所長王小強等人到鞍山市視察。登高遠眺，只見十里鋼城，樹林般的煙囪。千百個工廠的大門，每天吞吐着幾十萬職工，他們的生活和勞動在這十里鋼城中織成一張巨大的網。這張網是那樣周密、嚴實、牢不可破。趙紫陽把手一指道：「這就是公有制，這就是計劃經濟。誰能承包它，誰能買得起它的股份？」體改所的「精英」們全都被眼前的場面所震驚了，在這個龐然大物面前，他們覺得自己口袋裡的承包制、股份制方案是那樣的蒼白無力。

公有化的逆變問題曾經是改革中的熱門話題。有人說，共產黨化私為公只用了兩年時間，而化公為私用了十年，還八字沒有一撇。

然而，人們看到的僅僅是這個社會的一個側面——黃河表面的堅冰，這個社會還有它的另一面——堅冰層下的潛流。

這個潛流所蘊藏的能量，同樣會令人震驚，它不屈不撓地沖刷着頂上的冰層，終有一天

會為整個黃河帶來凌訊。

像片影印業的無形巨網

每天早上十點，兩輛麪包車從廣州市一幢不顯眼的房子後開出，駛向廣珠公路。下午三點，車子到達珠海市拱北關，與另外兩輛從澳門開來的車子相遇。從廣州來的車上卸下一個個裝滿了膠卷的白色塑料桶，很快地裝上了從澳門開來的車子；而從澳門開來的車子上卸下一桶桶裝滿了彩色像片的膠桶，迅速地裝上了從廣州來的車。兩邊來的車調頭各自向回駛去。晚上八點，車子從珠海回到廣州。彩色像片被卸入一個空曠的大屋子，一群人忙碌着，把像片分成東北、華北、西北、華中、華南、西南幾個大區，在每個大區又進一步被分成瀋陽、大連、北京、天津、上海、武漢、西安、重慶等城市。

第二天凌晨，滿載着好類彩色像片的車子又從這裡分別駛向飛機場、火車站、長途公共汽車站。一個個貼着標籤的膠桶分別被裝上了它們所屬的飛機、火車和汽車，被載到標籤所示的地方，那裡會有汽車和摩托車在等待



着它們，同時又會有未經沖洗的膠卷沿着同樣的渠道流回來，匯集到廣州，運向珠海、澳門。

這張網，聯接着全國各個城市和風景點的上萬個體攝影沖洗社，囊括了它們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業務。人們很難想到，他們無論在大連海灘、西安大雁塔，還是黃山天都峰、洞庭岳陽樓所照的像片，最終都會殊途同歸，匯集到廣州——珠海——澳門。這張網之大，之嚴密，壟斷性之強，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力，它的每一個環節的運轉都是靠一樣東西來潤滑——錢。其效率之高，組織之精密，遠在國營計劃體系之上。

這張網每天的交易量超過五十萬元港幣。在澳門的生產線是要用現匯支付的，可是國內各個照像點、沖洗店只能收人民幣。如何把人民幣換成港幣，是這個體系能夠持續運轉的關鍵。順着這條綫追下去，我們又會看到另外一張網，一張套匯的網。凌晨，三三兩兩的人背着一包包人民幣走出那幢房子，他們的摩托車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中，溶進了珠江三角洲的城鎮鄉間，夜幕降臨時，他們又回來了，包裡的人民幣變成了港幣、美元。這筆外匯，會被裝進一個手提袋，隨着第二天開向珠海的車子流出澳門。在這張網中，沒有銀行，沒有支票，全部都是現款交易。這張網，沒有部長，沒有董事長，可是却運轉迅速，秩序井然。國營的同事在它前面顯得自愧弗如。

書報發行業的金字塔

出版發行業一向是共產黨國家的禁區。可是在這個領域裡，堅冰下的潛流更加觸目驚心

廣州市東堤，是個出版業的中心。清早，人們常常可以看到這裡三輪車、摩托車、麪包車雲集，熙熙攘攘。出版單位承包發行的發行人正在向書攤報頭批發暢銷書和小報。在這個三百萬人的城市裡，共有二千八百多個個體書報攤販，這個零售網被大約一百多個報頭所瓜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批發領地。這個巨大的發行網效率比新華書店的發行網要高得多。新書一出印刷廠，三天就能上市，而新華書店要等一個月。

武漢市的紅山區也是出版發行的中心。這裡發行量上百萬元的大批發公司就有好幾個，每一家公司的發行人手中都有一張聯絡圖，上面有全國各大中城市數百名二級批發商名單。在這個中心指令下，一火車皮一火車皮的書從這個九省通渠的運輸中心散發到各地，然後一級級地批發到這個巨大金字塔的末梢——個體書報攤。

這個個體發行網的規模無比迅速地膨脹着。一九八七年，它終於一舉超過國營新華書店發行量。今年已佔到整個書刊發行量的百分之六十三。個體報攤的報紙銷售量也超過郵局的發行量，今年已佔到總量的百分之五十八。這個地下的發行網儘管在幾次「清污」和「禁黃」的運動中屢遭重挫，但膨脹的勢頭仍咄咄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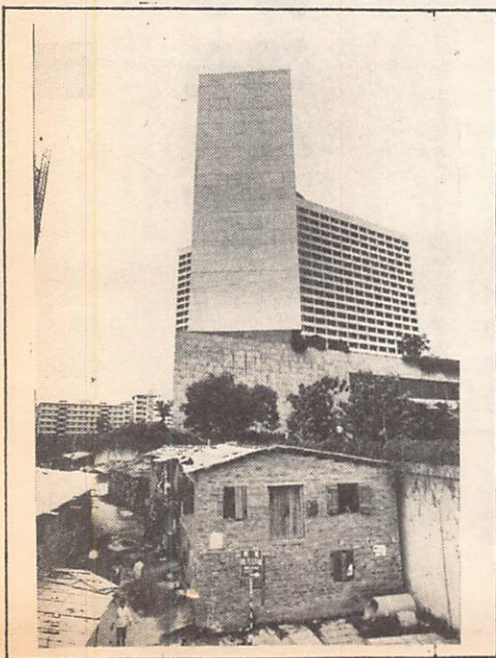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的經理們面對這支強勁的競爭對手幾乎毫無招架之功。新華書店這架官僚機器不但運轉遲緩，而且嗅覺也遲緩。當一本書在新華書店架上出現時，個體攤販和發行人早就賺得腦滿腸肥了。若是真正的暢銷書，新華書店怕見也見不到，書還未出印刷廠大門，就在後門被分光了。有的發行人更絕，暢銷書的校樣一出，就到了他的手裡。他連夜送到吃不飽

的小印刷廠，加班印出，等到正式的書上市時，他們早已在「叢中笑」了。

全國共有四萬餘家新華書店，在西方人眼裡，這已是一張不得了商業網了，可是那隻地下的巨無霸終有一天會有能力吞掉所有的新華書店。你不相信嗎？我信。

建築業大軍的游擊隊

近年來，建築業恐怕是中國最繁榮的行業了。每個城鎮都在大興土木，樓堂館所拔地而起，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是建築隊。可是誰能想到，在這只無所不在的建築業大軍中，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勞動力既非國營，又非集體所有制。他們的組織建制不是隊長、科長、處長；而是大包工頭、二包工頭、三包工頭。在每一個建築工地旁，你都會見到用竹子、草席、油毡布搭成的工棚，這些工棚裡的「居民」大多都操着與當地不同的口音。他們沒有戶口，但又不是黑人黑戶。他們就是這支建



築業大軍的最底層。在廣州，這支建築隊伍的常駐人口約十五萬，深圳市近二十萬，在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這支隊伍的總合達七十萬八萬人。在他們中間，你常可以聽到汕頭話、閩南話、粵北的客家話、湖南話、江西話，偶爾你還可以聽到四川話和河南話。

每個建築隊的勞力多是同村或鄰村的鄉親，他們的領導人是包工頭。他們向包工頭負責，聽從他指揮調遣，同時也從他那裡領工資。自一九八〇年蛇口首次試行以來，招標制已在中國普及。而國營建築企業在招標中常常不是包工頭的對手，其奧妙之一當然是他們不會拿出現款或土特產的厚禮實行賄賂。在拉關係、招生意方面，這些「建築專業戶」大多有着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可以輕易地搞到磚和瓦，雖不那麼輕易但會千方百計搞到鋼材、木材、水泥，至於勞動力更不在話下。廣東省番禺縣一家建築專業戶甚至大規模生產各種廠房預製件，然後用船運到深圳、廣州、珠海。

在建築業中，人們把國營企業稱為正規軍，集體企業稱為雜牌軍，而包工隊則是游擊隊。在廣東省，三者的比例為二：三：五。在招攬生意方面，常常是正規軍不敵雜牌軍，雜牌軍打不過游擊隊。國營企業常把手裡的工程轉給鄉鎮集體企業，後者常常又轉包給包工隊。每一次轉包的差額就成了企業的利潤，而承包額與工資額之間的差額就是包工頭的利潤。既然轉手一包就有利潤，何必要親自幹。因此，最終幹活的還是那些離土的農民，是他們，真正支撐着整個建築業的繁榮。

在中國，國營企業的工人已經貴族化了。他們一方面被大鍋飯慣壞了，另一方面又被通貨膨脹挫傷了積極性。企業的領導平時就指揮

不靈，碰到髒活、累活就更不用說了，沒有三倍獎金，別想調動人。一般企業都寧願用比獎金還低的工資請臨時工。於是這類髒活、累活就成了包工隊的專利。不但建築業，其它如城市修路，運輸裝卸，船廠的油漆除銹等行業，幾乎都被包工頭壟斷。

這支龐大的「農村游擊隊」在城市裡東游西蕩，把計劃經濟網衝得七零八碎。大興土木的樓堂館所之風為什麼利不住？鋼材、水泥的價格為什麼越倒越高？只要研究一下「包工頭的經濟學」，不難從中得到答案。

為了這支游擊隊的生存，有很多附屬的行業也應運而生。在票證市場上流通的很大一部分糧票最終被這支隊伍吸收。廣州街頭那些白天修鞋晚上賣淫的湖南姑娘們大概也主要從這支隊伍中找到她們的客戶。

這支隊伍，是一個地下的王國，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行為規則，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可是唯獨沒有黨的領導。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們，請不要把眼睛只盯在國營經濟上，研究一下這個地下的王國吧！我相信，你們會從中為很多無法解釋的社會現象找到答案。

凌訊就要來了！

正如「河殤」中所說：比知識分子更有現實力量的，或許是那些相貌平平，談吐也不驚人的新型企業家們。在那些小商店的老闆中間，在急急忙趕路的生意人中間，在那些離開土地四處攬活的農民中間，正在積聚着新的社會能量與衝動。

他們的能量，匯集成巨大的潛流。堅冰會被沖破的，中國經濟的凌訊就要來了。

全美創辦最早，
最具規模的移民律師事務所

傑史格(Jay Segal)美羅省移民局前任首席法官
馬丁譚士澤(Martin Danziger)前美司法部移民局副局長
亨利杜根(Henry S. Dogin)美司法部移民局紐約總局

畢斯特·慕嘉模 法律事務所

BARST & MUKAMAL

移民·大赦·不動產買賣·商業登記·酒牌申請等等

紐約總公司
2 Park Ave.
19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Tel:(212)686-3838
Fax:(212)481-9362

加州羅省
Tel:(213)623-4592
Fax:(213)623-3720
加州三藩市
Tel:(415)398-8887
Fax:(415)398-6757

佛州邁阿密
Tel:(305)371-3838
Fax:(305)374-3381
佛州棕櫚灘
Tel:(305)832-2369
Fax:(305)832-7370

華盛頓首府
Tel:(202)659-0712
Fax:(202)659-0194
香港辦事處
代理廣州、台灣
Tel:5-200818

紐約法拉盛：
39-01 Main St.
Suite 402
Flushing, N.Y. 11354
(718)463-8500

紐約華埠
8 Chatham Sq 8F
New York N.Y. 10038
永發大廈八樓
Tel:(212)513-7800

官商——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

李玉

從一九八五年中國大陸黨政軍機關、公檢法機關捲入經商狂潮起，就遭到中共中央和海外輿論界的猛烈抨擊，當年的中顧委常務副主任薄一波，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在新形勢下出現的不正之風，最突出的破壞性最大的歪風第一條就是「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或者不以幹部本人名義而以某家屬親朋名義經商辦企業）」；當年「爭鳴」四月號發表許行文章「全官皆商與整黨」，把官商抨擊得一無是處。全民皆商或全官皆商的確可怕，助長了投機倒把、買空賣空、貪污受賄、巧取豪奪的歪風，而黨政軍經商就更可怕，他們握有雄厚的國家資金和物資，握有公家的一切生財工具。例如，福州軍區竟可動用軍用飛機去海南運輸進口彩電；南海艦隊則用軍艦運送進口汽車和家用電器；陸軍也不服輸，用軍用車輛輸送走私物資；甚至海豐公安局的輯私船也進行走私販私。

最近數月，官商又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首先是香港知名人士、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在七屆全國政協會議上指責中共在港的官商，不按香港遊戲規則，擾亂香港市場，且揮霍無度，其生活享受超過香港富商。接着香港

報刊便有一系列揭批官商的文章出現，連光大集團董事長王光英，雖然他本人也是官商，但也忍不住要揭批官商了。八月五日，王光英在接受中國通訊社記者訪問時，指出香港中資機構結構重疊臃腫，冗員過多，不善經營，貪污舞弊……在大陸，近期也加強了對官商的攻勢，趙紫陽、李鵬幾次表態要整頓官商，報刊輿論也相應配合，如八月二十四日「工人日報」揭露：一九八五年，全國各類公司大約有二十二萬家，其中大多數是皮包公司，無人、無資金、無設備，甚至無地點，買空賣空。以後用了一年時間清理整頓，到八六年，各類公司還有十七萬家。但至今年六月為止，各類公司又增加至四十萬家，其中大量是官辦公司，僅國務院各部委開辦的公司就有七百多家。「工人日報」並指出：官倒公司的手伸向流通領域，能夠使價格隨意升降。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一個電話、一張批條，就能讓緊俏商品在空中飛來飛去。「官倒」致使社會腐敗，國務院部委可以把行政司、局、處、室換塊公司牌子去「倒」，省、市、地、縣便進行仿效。不經商但有權有職者，同樣可以「倒權」、「倒業」，要批護照，拿一萬元；要開營業執照，先

拿一千元，以後每年在利潤上提取十分之一。

九月三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一封揭露「官倒」盤剝內幕的來信。該信指出：今年各省、市許多掛着「公司」、「中心」招牌的官商，利用手中物資大權，轉手倒賣，從中漁利，使有色金屬原料價格扶搖直上，上海許多有色金屬企業因之被迫停產。而這些「公司」、「中心」的操縱者有政協、老幹部局、軍隊、離休所、僑聯等機關，甚至還有公安局、工商局、稅務局。一些受「官倒」盤剝的單位和職工，對「官倒」又恨又罵又怕，不敢得罪。黨的喉舌如此揭批「官倒」，說明「官倒」對社會的破壞、對改革的破壞何等嚴重！

官商是中共異化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歷史上有悠久的官商傳統，這是托傳統的政治文化和經濟文化所賜。

中國古代商業，由官家壟斷或由皇帝欽定。直到公元前八一年，西漢昭帝以「問民間所疾苦，教化之要」，下令郡國推舉賢良文學之士到京舉行政經會議，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由官方組織的「鹽鐵論」大辯論。賢良文學

之士反對鹽鐵官營，對政府政經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批評，提出「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但由於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反對，認為「以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顯也。」結果，只罷了酒酷一項歸民間經營。

此後歷代統治者，都把經營工商業看作是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物質基礎。

還由於儒教傳統的重義輕利，如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因此中國讀書人向來輕視經商，把「商」列為最末等。荀子也提出「禁末」，即禁止老百姓經商。

中國傳統的「本末」思想幾乎支配了中國兩千餘年，至近代史上的嚴復——這位曾經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等極力傳播西方經濟思想的啓蒙思想家，但對中國從戰國時代就出現的「本末論」，仍持肯定態度，認為農業和工商業「現實有本末之分」——即農業為本，工商為末。

中國清末出現的近代工業，也首先是由官家引進或創辦的。但有人又過分強調了官營企業的作用，如「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訪問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姜洪而寫成文章的「官商——一種值得深入研究的現象」，姜洪就強調：「先是李鴻章、左宗棠和張之洞的官辦；後演變為張謇、盛宣懷的官督商辦；再後來才有純粹的民族資本家榮毅仁等等，正像逐級推動的火箭，沒有前兩級，第三級不會出現。」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李鴻章最早創辦的軍事工廠「江南製造總局」是在一八六五年，第二年就有純粹的私營機器製造業「發昌機器廠」的出現，這年同時出現的有左宗棠在福建創辦的「馬尾船政局」。發昌機器廠由手工鍛鐵作坊開始至能夠生產小火輪和車床，是當時上海最

大規模的私營機器製造企業。此外還有衆多的民營企業出現。因此姜洪的「逐級推動」說是不妥當的。但如果說當年在帝國主義經濟包圍之下，純粹的民營企業不易立足，官辦企業較易立足，倒還說得過去。如發昌機器製造廠後來為外商所排擠，趨於沒落，一九〇〇年被英資耶松船廠所吞併。但官營企業對民營企業發展的不利是顯而易見的。如一八九〇年李鴻章創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張謇在一八九五年在南通創辦的「大生紗廠」，都有十年或二十年的專利，不許民間再設同類的企業，而且有減免稅厘的優惠。

國民黨時代，利用孫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口號，大量地發展官辦企業（即國營企業），以致造成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也同樣對發展私營企業不利。

至於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後，更是走回歷史的老路，不准民間經商。西漢尚且允許民間經營酒酷，中共連酒也不許民間經營，一切對內對外買賣全由官家壟斷。

中共之全數壟斷大大小小內外的商業，政治上在於消滅他們認為對生產力發展毫無用處的「中間剝削」者的商人；在經濟上，實現「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合理分配境界。但實踐的結果，商人是消滅了，經濟却發展不起來，保障供給也成為空話，人民長期物質匱乏，甚至在飢餓邊緣上掙扎。物質匱乏使官風不正，黨政領導機關搜盡民脂民膏以供養大批官僚、幹部欺壓百姓，徹底撕下了「人民公僕」、「人民幹部」的外衣，這是中共及中共官員第一次普遍異化。自改革開放之後，有了一個允許人民群眾經商的機會，中共官員又再一次異化，不僅繼續與民爭利，而且直指向國家財產了——這就是「化公為私」。

商官、官商、官倒

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前，雖然壟斷了一切大小小內外外的商業，但其經營者基本上是黨政幹部的一種分工，如財貿幹部、商業幹部、外貿幹部、農貿幹部、工貿幹部、糧食幹部以及一切國營企業的幹部等，雖然他們都在經營買賣，但這些幹部不叫商人，而叫「商業幹部」、「財貿幹部」或「企業幹部」等，也就是「商官」。他們的經濟活動主要是為完成「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政治任務，而且這些經營工商業的幹部所得的工資福利，同同級的黨、政、軍幹部基本相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有商業，但沒有商人，只有官。

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也仍有分工的意義，但工作性質已起了變化，是以為國家賺取利潤為目的。特別是承包之後，其工資福利同黨政幹部的工資福利已大不相同，有盈利的企業，其工資福利可以大大超過過去同級的黨政軍幹部，企業的盈虧也要由自己負責。因此這時應該叫作「官商」。這是名符其實的正牌官商。

正牌官商尚有：經組織人事部門批准「掛職停薪」的幹部而經商者，和「棄官從商」者：如北京四通公司董事長萬潤南（萬里之子），原是國家幹部、工程師，後來辭去公職專門經商；又如錦州工貿實業公司董事長馬佔一，原是國家幹部、工程師、錦州市電子工業局長，後來辭去公職專門經商。

除正牌官商外，尚有一種未經國家授權經商的機關或幹部。他們僅是利用既有的政治權力經商，如(1)黨政軍機關或公檢法機關，利用機關權力在他們管轄下的工商局或工商所取得營業執照或沒有執照自發經營商業、為本機關

或為個人謀利者；(2)身為黨政軍幹部，領取着國家固定工資，做着本職工作又兼經商者；或由本機關分工專職經商者；(3)已離休或退休的幹部，享受着離休或退休幹部的政治榮譽和物質待遇而又用剩餘權力自行經商者；(4)高幹家屬或高幹子女，因有丈夫或父母的權力可利用，進行倒買倒賣者；(5)雖然沒有直接經商的機關或個人，但却掌握着批條子的權力，利用條子作交易而使本機關或個人得到額外的收入或者坐地分贓，這是屬於貪污受賄的行為。但因這種行為是「官倒」和「倒爺」的組成部分，甚至是關鍵部分，因此也應列入官商。筆者認為用條子交換金錢或物資，也是一種交易形式。「要開營業執照先交一千元，以後每年在利潤上提取十分之一」，這實際是「權力股」的變種。上述五類，可稱作是「邪牌官商」或者「官倒」。

但「正牌官商」和「官倒」有時也很難劃分清楚，如正牌官商也常常不按牌規遊戲，或巧取豪奪，或倒買倒賣，或偷稅漏稅。總之，一切不按已有規則、不守規則經商者、走私者，全都可以稱作「官倒」。

商官、官商、官倒，其共同點是運用政治權力經商，其不同點是經商的目的和經商手段罷了。

「官倒」的形成研究

八八年九月六日，香港電台電視部「五稜鏡」節目，舉辦一個題為「中國「官倒」問題嚴重」的電視訪問，被訪者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文鴻博士。陳文鴻是這樣回答「官倒」形成的：「早幾年的通脹政策，使社會經濟過熱，導致需求過大，因此出現物質短

缺，於是投機倒把、抬價炒賣相繼產生。最初只是一些個別人士，如個體戶等，情況發展到現在，當需求短缺嚴重時，政府部門不但不嚴加限制，反而也參與這個投機倒把活動。」即便說，是由於「需求過大」和供給「短缺嚴重」造成的。但中國過去幾十年來都是求過於供，而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更是空前絕後的物質「短缺嚴重」，但却不發生政府參加投機倒把或者「官倒」的問題。因此陳文鴻的回答不能令人滿意。

那麼，「官倒」是怎樣形成或曰怎樣產生的呢？

筆者的回答是：是中共官員在新時期下權力運用的反映。理由如下：

第一，中共各級官員長時期以來的經濟生活，都顯出一種不論在封建制度或者資本主義制度下都沒有過的特殊景象：

官位越大，其工資福利也越高，其幣值也就越高。住房最大、最好也最便宜；主、副食的供應最多最好也最便宜；日用工業品的供應也最多最好最便宜——其便宜的程度，不僅低於國家牌價，低於批發價，甚至低於成本價（白拿白用及各生產單位相送的不計算在內）。官職相應低微，其工資福利也就相應減少，其幣值也就相應降低。對於最底層的幹部，能夠買到國家牌價的商品（俗稱公價）就已很幸運了，也許還要費些力氣去走後門。

對於無收入的居民或者低收入的職工，其幣值就更低，許多副食品或日用工業品都得買「議價」（即市場價）。高官一元人民幣，往往可頂上普通老百姓四元人民幣以上。如在改革開放前的七十年代，廣東潮州市一間服裝工藝廠，生產的高級呢絨制服其衣料成本就要八十元，加工製成衣服的成本要一百多元，推到

百貨商店零售每套制服要一百三十多元。但賣給主管局的局長們和市領導們，一套只「賣」三十元。而普通居民去商店買則要一百三十多元，也即官老爺的一元人民幣可頂上老百姓四元多人民幣。又某縣藤椅業發達，有一間藤織廠生產一種可坐可躺的活動藤椅，當時牌價是三十五元人民幣一張。外貿部數位官員偕着省、地、縣官員來「參觀」，共七十多人，人人都想買，該廠便以「五元」一張作價，被「買」走一百數十張。也即官老爺一元人民幣頂上普通居民六元多人民幣。這的確是社會主義獨有的現象。

第二，當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物資極端缺乏時，中共對各級官員又採取「特殊照顧」的政策，中央對十四級以上的幹部都發給「特殊供應券」，地方上又對二十一級以上的幹部發給「特殊供應券」，官越大所供應的大米、麩粉、生油、豬肉、鮮魚、雞蛋、白糖、糖菓、香煙、肥皂、火柴、草紙、鷄鴨就越多。有的官大人少的家庭簡直就吃不完用不完。而老百姓却在死亡綫上掙扎。那幾年全國餓死一千五百萬（或者三千萬）人口中，沒有一個是中共官員。

第三，中共由於宣稱是信仰「共產主義」，因此不能拿「資本」來顯示自己的地位，但却可以用「權力」來顯示自己的地位。中共黨主席可以享受二十多萬平方米的住房（如毛澤東、華國鋒），並且到處都有自己專用的別墅；中共高官們又可享受無數的為他們生活服務的從國庫支薪的服務人員，也可享受全家「一人一輛」的公家汽車，並且直至現在都是如此。最近方勵之揭露：「有的首長，他一家可以擁有六輛汽車，老頭子上班是一輛，太太專用的一輛，孩子上學的是一輛，保姆上街買菜

的是一輛。這是他家司機說的。」「釣魚台一桌燕翅酒席要好幾千元，這夠老百姓幾年伙食？」「某大首長去一趟佳木斯，就花費二十萬元，為期不過一週。」（見八八年七月號「明報」月刊）

第四，中共一切政策的變動，首先得利的也總是中共高官及其家屬子女親朋。八十年代初提出「改革開放」口號，允許出國留學，首先、二批官費出國留學生，幾乎全數是高幹子女或與高幹有關係的，而鄧小平的兒子鄧質芳跑得最快；在「對內搞活」聲中，活躍在外貿和廣州交易會的也是高幹子女，派出海外商業

機構的也是高幹子女，轉職經商的也首先是高幹子女，隨後才有黨政軍機關經商。

上述這些奇景，全都是權力運用的反映。中共高官及其家屬親朋，一向都享受着特權所帶來的豐厚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他們總不能只讓老百姓經常致富而使自己吃虧。大量官商或「官倒」的出現，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從中國歷史或者現實來看，官商的出現是中國改革的必經之路，是無法避過這一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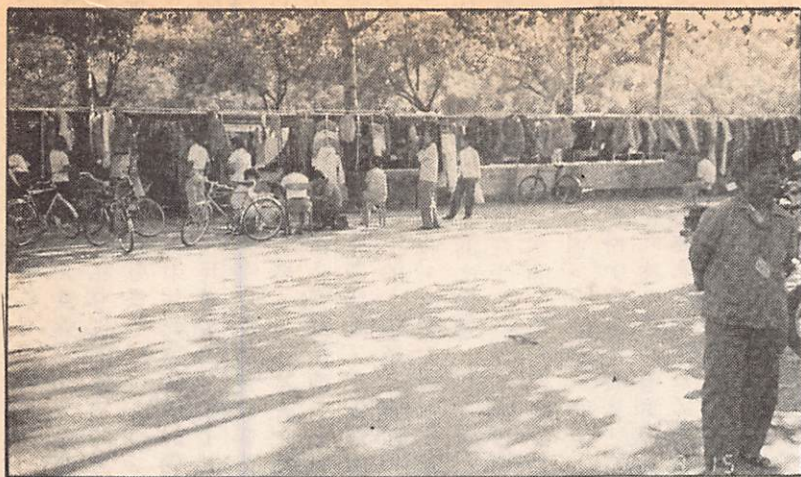
官商是破壞社會主義的急先鋒

鄧小平的改革，不可能改變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會通過某些改革和調整來鞏固這一制度；青年學生的民主吶喊，也不可能動搖現存制度的一根毫毛。但屢禁不止的中共內部出現的官商，則有可能是推倒現存制度的重要力量。官商們的種種以權謀私、化公為私的行徑，可能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私人資本原始積累的唯一方式。

(一)官商或者官倒的經濟活動目標首先指向社會主義公有制財產。他們利用掌管物資的大權，或者純粹用政治特權，任意壓低物價或抬高物價，從中轉手圖利，或者利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雙軌價格制」，把國家的管制價格變為自由價格拋到自由市場去以漁利。對於專職供銷幹部，為求取回佣，寧可買假貨、劣貨、貴貨，使國營企業生產的正牌產品賣不出。對於與外商有交易的官商，只要滿足他們的一己要求——或去香港或外國「參觀」，或獲得外幣和高檔家用電器的「送禮」，或滿足他們的子女「自費」出國留學等的要求，什麼都可以做得出，把自己掌管得到的國家物資賤價賣出，或貴價進口低劣的外國貨。常州市一家地方

國營紡織廠，購買香港一家織布廠的一批淘汰的舊機器，原議定八十萬美元成交，但該廠五十多歲的黨書記，突然提出他們四人要來港「考察」。香港老闆答應了，全盤負責他們來港「考察」的費用，給他們住好、吃好、玩好，又送他們一些港幣和每人一部彩電，待正式簽訂買賣合約時，黨書記等竟主動為賣方提價一百三十萬美元成交。也即官老爺們獲得了一己私利，國家就要多付出五十萬美金的外匯去。有的掌經濟大權的官商，竟出賣商業情報也決不是少數。至於各省、市、縣派出來港開辦「公司」的官商，普遍的是來談生意，先講享受，數萬港元月租的住宅樓宇，一人一套，一切現代化傢俱電器齊全，全由公家報銷；一旦做起生意來，則虧本歸公家，賺錢歸自己。許多內地官商或海外官商，都在香港或外國存有私人大量外幣。為了取得外地長住的條件，竟用金錢和高檔電器、摩托車或小汽車，買通公安局。如八八年六月為止的半年時間，佔用港澳家屬單程通行證的幹部竟達八百九十名，使香港同胞家屬的申請遙遙無期。這些幹部有了單程通行證，就可以申請為香港居民，中共再要調回他們就成爲不可能。某縣一位副局長被派出香港做官商開設公司，兩年之中一個「仙」也沒有賺到，但他家却在城東建起四層高的美侖美奐的洋房來。當地群眾反映意見，縣書記老爺們說：不要眼紅。實則他們都得到好處。國家的外匯，就是通過這樣的形式流進了官老爺們的腰包。至於逃匯、套匯、炒匯的就更公開化了。

官商或「官倒」的種種行爲，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甚至是令人憤慨的。但唯有他們，才最有條件和最大規模地、最直接地、最有效地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使他們的私人資本



急劇積聚。這雖然是實現私有化過程的一種畸形的形式，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和共產黨集權專制統治下，却是發展私有化的極快的方式。而且捨此不可能有其他方式。

(二)官商或官倒造成中共幹部空前的腐化，致使「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成了老古董們的獨唱或者是只掛在嘴皮上的裝飾音符。「上下勾結」、「內外勾結」，在過去是鮮見的也是極大的罪惡，但在今天却遍地皆是。其原因是，官商或官倒的經濟活動，不能單獨完成，他們必須勾結社會上的「倒爺」（即投機倒把分子）或海外的奸商，才能完成自己獲利的目的。而且，一個官商的發達，往往可以造就數個或十數個倒爺或奸商的發達；或者反過來，一個倒爺或一個奸商的發達，也可以造就數個或十數個官商的發達。如香港一位女士，言談表現親左，因此頗得中方官員賞識。有次中方宴會中，居然能夠同葉劍英之弟葉道英在餐桌後面合照一張相。她身無分文，又居然能夠當上什麼「董事長」，但只一年，廣東出口香港的蔬菜便虧蝕三千萬元，這位女士頓成千萬富翁，同時也造就了內地十多名幹部的發達。官倒、倒爺和奸商，是學生兄弟，他們雖然爾虞我詐，但更多的却是互相依存，共同榨取國家財富和盤剝老百姓。官商或官倒着重挖社會主義牆角，幹「化公為私」的勾當；倒爺則着重面對消費者，剝削老百姓。

(三)官商或官倒，又是社會主義法制最有力 and 最大的破壞集團。中共從來只提倡「法制」，而不敢提倡「法治」，其原因是「法治」和「黨的領導」有內在的矛盾。法治權威的確立，就意味着黨治——實質的人治的削弱。所以中共向來只能提倡自己能控制之下的某些法律制度，憲法條文也證明這一點。如第一百二十

六條：「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又如第一百三十一條：「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查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兩條所謂「獨立」行使審判權或檢查權，却偏偏漏掉了「黨委」干涉的問題。而「社會團體」，顯然並不包括共產黨中央機關或地方各級黨委機關。共產黨辭典中的「社會團體」是指工會、婦女聯合會以及各種協會等。中共有意保留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干涉司法的權利。國家大法如此，其餘各種單行法規就更如此了。這一切都證明，中共只能提倡在自己能夠控制下的法律制度，既可使自己無法無天，又可以束縛老百姓及一切被統治的階級。但中共的官商或官倒，把中共高層這如意美夢打亂了，致使中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何以故？因為官商或官倒本身，就是中共各級黨委的掌權人，或者就是黨委書記。官商或官倒也同時是各級政權機關的掌權人。中共一切文件、指示及政權機關頒佈的法律、法令、法例、法規等，都得通過他們的手和頭腦來執行。牽涉到廣大民衆切身利益的事件往往容易暴露，但也不打緊，他們會官官相護，得到好處的上級和下屬，或者是他們的後台，也會維護着他們，使「上頭」派來的調查組難以調查瞭解，甚至費了幾年功夫也「調查」不清。即使調查清楚了，也難以定案處理。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八日香港「明報」報導：一位國內政協委員較早前向全國政協會議提交了一份個人提案，促請當局公佈重大案件。該提案列舉三宗涉及前高幹和高幹子弟的大案為例，如前民航總局局長沈圖收取外國回佣案；著名鋼琴家、葉帥女兒前夫劉詩昆貪污和走私文物案；胡喬木之子胡世英假「函授大學」之名收取數百萬學費的貪污教育經費案。就胡世英案，胡耀邦當權時，已把他逮捕入獄。但胡耀邦倒台之後，陳雲一句話：給胡喬木留條根子。公安局便只好假「誤解」之名釋放了。胡世英出獄後還在北京一間「最高級的宴會場所宴客」，以示自己「無事」。這就說明司法機關面對着這些官商（辦學店也是商業行爲）毫無辦法。沈圖、劉詩昆之難於定案判罪，又有誰知道圍繞在他們身邊的上下下得了多少好處？或有多少政治關係？

中國憲法第十二條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官商或官倒們就偏偏首先侵犯「神聖不可侵犯」的公共財產。對國家大法作出最徹底的蔑視。至於黨員守則、懲治貪污浪費的條例、禁止哄抬物價的行政法規等等，他們就更不放在眼裡了。

官商和官倒也極大地削弱了中央集權制。官商或官倒的無法無天，也帶動了農民、工人、學生和社會上的一切活躍分子的無法無天。共產黨都帶頭貪污、盜竊、走私、倒買倒賣、行賄受賄，老百姓也就自然有樣學樣。致使各種犯罪分子空前增多。據公安部部長王芳於八月三十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說：今年上半年，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比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三十四點八，而絕對數增加最多的依然是盜竊財產案件。

官商或官倒，最有力地破壞社會主義法制。

(四)官商或官倒，又極大地削弱了中共威信和政府威信。大家知道，中共過去和現在，對手無寸鐵的小民百姓或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大學生，只要露出一句對共產黨不利的話，中共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給他們戴上「右派」、「反

革命」的帽子而鎮壓下去。但對官商或官倒們在實際行為上對中共和政府威信的破壞，中共却束手無策，既無法鎮壓，也不敢鎮壓。一是如前所述，這一大批的官商或官倒本身，就是共產黨各級領導機關的掌權人，也是各級政府的掌權人；二是他們往往上下聯繫密切，關係網非常廣；三是又往往同中共最上層的各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或是他們的子女，或是他們的戰友或者下屬，或是過去的同学等等，即使一派高官要打，另一派高官則可能要保。這種關係網也使他們互相依存，不然就只好「一鍋熟」了。

由於官商或官倒帶頭對中共和政府威信的破壞，不僅使中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是一切建設社會主義的號召，一切預告的雄偉美好的遠景，也沒有人再願意聽或聽了也不相信。因為中共官員本身已作出「走資」榜樣。

(五)大量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官商或官倒，勾結社會上的倒爺的瘋狂活動，使整個社會經濟造成亂局，亂局又造成人們「混水摸魚」的機會。一切老老實實的老百姓和書呆子，都感到受到了莫大的威脅，生活沒有保障。但他們不可能長期忍受下去，必然要奮起掙扎求生存，或參與「混水摸魚」的遊戲。這無疑又將極大地推動着人們思想意識的覺醒。幾十年來被訓練成「依靠黨」、「依靠組織」的意識觀念，徹底完蛋了。「各走各的路」將是覺醒了的人們的意識。這樣，又無疑推動了個體化的發展趨勢和獨立思考的趨勢。這對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有莫大的意義，為以後的私有化、自由化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對於忠厚老實的或者對共產黨愚忠的人們來說，再也沒有比官商、官倒、倒爺們的「反面教員」所起的作用大。

官商將改變現行社會制度

官商或官倒的非法非理的活動，惹得天怒人怨，同時也阻礙了中共的改革，使改革增加無比困難。中共最近大造輿論要「治一治官倒」。但是第一，本人懷疑中共的誠意。因為官商或官倒們處處牽涉到高官的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第二，即使真有誠意打擊官倒，但至多也只敢拍幾個無關宏旨的小蒼蠅，而不敢招惹大老虎。即便地方上的大倒爺，也不一定敢招惹。如廣東某縣一位大倒爺，原是龍虎武帥兼懂氣功，許多官老爺都曾拜他學藝，他也收了社會上許多門徒。他一旦要開「公司」，許多官老爺和門徒都支持。於是投機倒把、買空賣空、走私賭博什麼都幹，不少官老爺都得到好處，他原村的群眾也受惠。有一位不識泰山的公安幹部，竟帶了幾個小兵要去捉他，還未到達門口，他的手下就警告他們：你們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快快返回去，即使你們能逃脫，你們家屬的腦袋也要搬家。公安人員只好悻悻離去。這等公安小子何曾知道，許多官老爺（多數是縣委領導幹部和各局局長們，當然也包括公安局長、法院院長），需要進口的彩電或錄相機，找他說一聲就行，價錢還不大貴；要看性愛錄影帶，也得找他。係諸如此類的大倒爺，地方政府敢去招惹他們嗎？第三，只要中共繼續允許老百姓經商，中共各級官員就決不會做傻瓜。總會想出適合方式繼續做生意。誰人會放過賺錢機會？

中共無法禁止官商或官倒。最後的可能是：承認現實。允許這部分幹部先富裕起來，並使他們經商合法化和職業化，也即重新界定產

權分配。「首先產權分配後，以後的再分配就要由市場決定了。」（張五常語）

只有在這時，官商或官倒的歷史才能真正終結。而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就名存實亡了。

附帶一說，會不會變成舊中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統治時期的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以為：在今天的條件下，不可能。而蛻化成瑞典模式或台灣模式的資本主義可能性則較大。不管人們對官商怎樣憤怒（包括我自己之內），但在客觀上，官商是事實上的轉變現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鋒和領導力量——確切的語言是榜樣的力量。

中共在建國初期消滅了商人，是爲了全國有較合理的流通和分配。以後爲了搞活已經死氣沉沉的社會主義經濟，又把「商官」的職能轉化爲「官商」。官商滋生了官倒，成了直接破壞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異己力量。從馬克思、毛澤東的矛盾學說來看，也是符合矛盾運動的。毛說：「事物無一不是在一定條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現在，中共正在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轉化。老古董們除了嘆息或怒罵而外，不可能再有作爲了。

選必須指出：早在解放戰爭年代的一九四七年，擔任財經主任的董必武就曾指出：「黨政軍機關經營商業，必然使黨組織脫離群眾，黨也有亡的危險。」中共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利害關係。但有什麼辦法呢？要麼就回復到斯大林、毛澤東的模式中去；要麼就等待着黨的變質好了——這對十億人民是有利的。



敲山震虎，捉貓嚇虎

——中共打虎新傳

李遠

中國人說：三十年風水輪流轉。這話在國民黨和共產黨身上倒是靈了驗。不過這一輪不是三十年，而是四十年。馬克思說，歷史往往會重演，第一次是悲劇，而第二次則常常以喜劇的面目出現。

割盲腸：財政幣制改革方案

四十年前，一九四八年，中國經濟處於惡性通貨膨脹之中，社會經濟秩序一片混亂。法幣信譽崩潰，奸商囤積居奇，物物交換成風，百姓怨聲沸騰。

面臨共產黨轉守為攻，大兵壓境，國民黨政府必須設法穩定後方。八月中旬，經與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商議，蔣介石和翁文灝推出了「經濟緊急處理方案」，成立了經濟管制委員會，一場歷時七十天的財政幣制改革開張了。其主要的措施是發行金元券，收兌市面上的舊法幣和金銀、外匯。

八月二十日，中央日報和社論為這次經濟改革大聲疾呼：「社會改革，就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壓抑少數人的特權。我們急切地盼望政府以堅毅的努力，制止少數人借國庫發行和囤積居奇來擄取暴利的手段。要知道，改革幣制如割發炎的盲腸，成功則身體康復，失敗則

同歸於盡。」

這個割盲腸的重任交給了出任「上海經濟督導」大員蔣經國。他意識到，要想使幣制改革成功，必須首先整頓經濟秩序，清理經濟環境。首當其衝的兩大戰役是：平抑物價，打擊奸商污吏。

平抑物價：八·一九防錢保衛戰

上任伊始，蔣經國宣佈，按政府物價管制法，所有市面商品價格必須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水平線上。於是這一天的物價被稱為「八一九」防錢。

蔣經國一方面調來了自己的親信「勘建大隊」，另一方面調動了上海市六個軍警部門：金管局、警察局、警備區、稽查處、憲兵、江灣及兩路（寧滬、滬杭）警察局，於二十三日和二十七日兩天實行物價大檢查。檢查範圍包括全市的市場、倉庫、交通場所。凡囤積物資，抬高物價者，吊銷執照，貨品沒收，送法院審判。

蔣經國不愧是留蘇的高足，把共產黨發動群眾搞運動一套學得爐火純青。經濟管制法公佈第十天，上海成立了十一個人民服務站，接受消費者檢舉。九月十日，蔣經國的愛將王昇發表「告上海青年書」，號召上海知識青年積

極投身這場社會變革。上海青年反應熱烈，到服務總隊報名者「如潮似湧」。蔣經國從中選拔了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人，編為二十個大隊，受訓後投入市場監督。這一舉，把這場社會改革置於群眾運動的基礎之上。

九月份，「上海的革命」捷報頻傳，蔣經國的威望如日行中天，幾乎成了傳奇人物。經濟大檢查的蕃籬有力地控制住了物價，使金元券的發行及舊法幣、金銀外匯的收兌進展順利。

「八一九」防錢在九月份的上海，巍然不動。人們歡欣鼓舞，財政部長王雲五立即誇下海口：「物價自可穩定，預算即可平衡」。

可是經濟學家是清醒的，他們指出，政府凍結物價是行政命令來指揮經濟，無視商品經濟規律。流通滯呆會壓抑生產，只要生產不發展，捨本治標的物價防錢是守不住的。

果然不出所料，十月份的第三天，上海就出現搶購風潮；「八一九」防錢全面崩潰。從此，金元券幣值一瀉千丈，不可收拾。

除奸治吏：只打老虎不拍蒼蠅

與物價大檢查同時推出的殺手鐮還有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取締囤積居奇、禁止資金外流、捕捉黃牛黨（倒爺）的活動……這些行動

必然遇到奸商和其身後的貪官污吏的反抗。

商人們實行「堅壁清野」，消極抵抗，把七百萬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來。物價雖穩，但有市無貨。經管會對此宣佈期限登記存貨。九月十三日動員五千六百人，分成一千六百二十八個小組，實行物資庫存大檢查。對隱藏不報者，一律查封，對說報漏報者、或轉移庫存者，以法論處。

亂世需用重法。爲了利住奸商、貪官污吏的氣焰，蔣經國大刀闊斧地處置了一批違法分子。

一家鞋帽店的老闆因標價超過「八一九」防綫，被罰一千元。當事者不服，托人說情上訴，又被加罰兩千元。

上海灘的權勢人物，蔣總統的世交杜月笙之子杜維屏因投機倒把被起訴法辦。

財政部秘書陶啓明，利用職權，洩露機密，串通奸商拋售永紗股票獲利，被捕服刑。

上海警備部科長張亞尼、第六稽查大隊隊長戚再玉因擅權勒索被槍斃處決。

不法奸商王春哲因囤積居奇，違抗政令而被殺一警百。

「勒建隊」個個磨拳擦掌，氣勢如虹。其口號是「只打老虎，不拍蒼蠅」。在「有錢就有理」的上海灘，蔣經國的這三板斧確實大得人心，給人鐵腕包公的印象。外國人稱他爲「經濟沙皇」，中國人稱之爲「雍正大帝」。

可是萬沒想到，過五關斬六將的蔣太子在揚子公司孔令侃一案走了麥城，敗在蔣夫人手下。家族干政，豪門無道，令群情嘩然。蔣經國的聲譽一落到底，被人奚落爲：只拍蒼蠅，不打老虎。

揚子案在報界披露的第二天，民心就全面崩潰，市場搶購開始，八一九防綫蕩然無存。

一個月後，國府宣佈解除經管令，改革失敗。

中共改革開放後的三次通脹高潮

四十年過去了，滄桑易手，日月如梭。

共產黨曾經不可一世。令蔣經國碰得頭破血流的上海灘，被中共大員輕而易舉地擺平。不過共產黨萬萬沒有想到，今天它也會落到四十年前國民黨的地步，倍受通貨膨脹的煎熬。自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北京政府就被通貨膨脹的頑症纏上身了。自一九七九年至今，共有三次物價上漲的高潮：



百分之十左右，一九八二年，政府採用了一些行政手段，有效地壓住了物價，一九八三年物價略有回跌。

第二次高潮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其原因主要是全民經商、基建膨脹和農副產品價格大幅度開放，這次漲價面所涉及的不僅有農產品，而且波及到大部份工業品，全國平均價格指數上漲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一九八六年，中共強令實行金融收縮，凍結信貸，實行財政物價大檢查，此舉雖並未利住物價上漲趨勢，但上漲幅度大大緩和。

第三次高潮自一九八七年至今，尤其是今年五月之後，不但漲價涉及面廣而且幅度大，漲價產品不僅遍及消費品領域，而且涉及工業原材料及交通郵電等基本收費，通貨膨脹率再上一層，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物價闖關不成，反而闖下大禍

近年來，黨風腐敗，官倒猖狂，令鄧小平坐立不安。他問下屬，原因何在。答曰：「價格雙軌制」。於是鄧大人把心一橫，一聲令下：「併軌闖關」。本來今年年初通貨膨脹勢頭就咄咄逼人，而自五月鄧小平露出要硬闖物價關的風聲之後，更是爲物價上漲火上澆油。整個六月份全國上下一片人心惶惶，各大城市出現搶購風潮，鄧小平關沒闖成，却闖下大禍。

八月到十月，中共中央連開幾次會議，「闖關」調子越來越低。姚依林拿出一份一百五十頁的調查報告，聲稱物價不控制會出現大亂。惡性通脹的原因被歸結爲兩點：一是經濟過熱，非生產基建投資控制不住，二是官倒作怪，轉手哄抬物價。

於是，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清理經

第一次是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二年，其原因主要是一九七九年政府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沿海地區的僑匯沖擊，這次漲價主要在農副產品，但就整個物價水平而言，上漲幅度在

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實際上任務有兩條：一是控制物價，二是清查官倒。

鬧關的鬧劇轉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從消滅「官倒」始，物價漲了一輪以後，又到「清查官倒」終。

歷史的腳步轉了一大圈似乎也回到原地：蔣經國四十年前所面臨的兩大敵人——通脹和奸（官）商，今天又擺到了共產黨人面前。悲劇乎，喜劇？

物價大檢查·合夥騙國家

中共官員搞市場經濟不在行，但不可否認，靠行政命令指揮經濟倒是輕車熟路。

十月十五日，財政部長王炳乾在中南海檢閱了中央派出地方「清查大員」們。這支隊伍由一百四十位部、局、處級幹部組成，分為二十七個組，分別派往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進行為期四個月財稅物價大檢查。同時，王炳乾還抽調了三百名幹部進駐北京市的一百家中央大企業、大公司，實行清查。

為控制物價，國務院還成立了「全國控制集團購買領導小組」，由王炳乾掛帥任組長。各省、市、縣也紛紛成立相應的「控購組」，對集團購買力進行監督。凡被查出突破購買力指標的，處以超額部分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罰款。用行政手段控制物價各國均不罕見，四十年前蔣經國也曾用此招。可是一般用政令控制物價的對象均在賣方，而從消費方開刀的，中共是獨此一家。

在前段時間的物價暴漲中，各地物價局已聲名狼藉，有的物價局已被收買。這次清查，很多城市不得不出動公、檢、法。例如深圳市的公安系統就全體動員巡市，氣勢恰如四十年

前上海的一幕。

中央工作組一下到地方，喜訊立即傳來，各地物價上漲立即被控制住了。幾個重災區，倒爺菌集地區，如深圳、廣州、溫州、廈門等地回報：工業原材料價格穩住，電器產品和日用消費品略有回跌，農副產品漲幅趨緩。

可是，真實情況大家心裡都明白。老百姓心裡明白，口袋裡的錢包會告訴他們物價大檢查的效果；企業的經理心裡明白，檢查到的那些商品是絕對不會漲價的。廣州、深圳一些深謀遠慮的經理已經開始囤積了，等四個月「大檢查」風頭過後再拋出。檢查大員們心裡也明白，他們一到地方就被「供」起來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吃了別人的嘴軟，哪有不報喜的？難道總報憂給東道主難堪不成？

蒙在鼓裡的大概只有李鵬和王炳乾了。有人開玩笑說：現在代表國家利益的只有兩個人，一是李鵬二是王炳乾。這也就是說，無論大檢查也好，控制集團消費也好，都是在做戲，大家合夥騙國家。

不過國務院的國家代表們還是信心十足的，他們已誇下海口，在年底前把通脹率壓低至百分之十三以下，而財政收入增加三十億元。沒有人不相信，他們的任務一定會完成。

官倒大清查·不打虎只嚇虎

「清查官倒」的戰綫更是耐人尋味，有人稱這次「清倒」運動的特點是：聲音大，動作輕。與其說打虎，不如說嚇虎。

這次嚇虎，手段無非兩種：

一是敲山震虎。這次「清查官倒」一開始，鄧小平就發話：「整頓官辦公司，先從康華查起。」這一聲大吼果然有戲劇性效果。誰不

知道康華姓鄧？於是所有的官倒爺統把頭縮進壳子。過去清查「經濟犯罪」總是自下而上，先從小貓抓起，有些「大老虎」自恃有勢，並不收斂，於是當事情牽連到自己，已無路可退了。可這一次就不同了，從鄧記康華開刀，無人敢不收斂。當然敲山並不會敲到虎頭上，鄧樸方不是宣佈早已與康華脫離關係了嗎？至於其它「老虎」，等到工作組派下來至少一兩個月，他們早就把退路和對策想好了。君不見，查康華令下一個月後，趙公子、張（勁夫）公子、王（震）公子等主動送上門要求清查，主動送上要查的，當然是清白的。

敲山震虎不光敲「太子黨山頭」，各個山頭都敲得震天響，軍隊、海外等地也不例外。十月初鄧小平又發話：「軍隊也要查」，「香港要查一下，內地的公司砍掉三分之二」。於是乎，軍隊、海外忙作一團，獨不見打着老虎

二是捉貓嚇虎。清查的大網拉開，似乎是鋪天蓋地。可是把網一收，只有小貓三、四隻，實在令眼巴巴等着看虎的老百姓大為掃興。溫州市查獲官倒企業十五家，總共非法收入不足五十萬元。

湖南省查獲「官倒」、「軍倒」十家，總共非法收入不過百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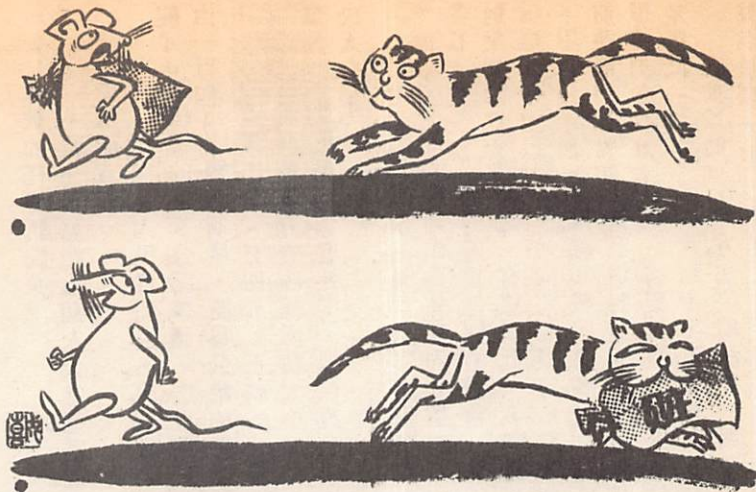
青海省查獲官倒十三家，非法獲利不過十餘萬元。

太原查獲一家「大」鋼材官倒，非法盈利不過十七萬元。

最激動人心的莫過於內蒙赤峰市查獲的三家官倒，總共非法獲利也不過三百五十萬元。

想當初，一九八一、八三、八六年幾次大的「反經濟犯罪」運動，查出上千萬元的大案就有十數樁以上。當時「官倒」規模尚處「初

級階段」，遠不能望今日之項背，況且當時幣值又遠比現在高，八一年一元能當今日十元用，一張大網竟抓住這麼幾隻貓，比起從前戰績，實在令人哭笑不得？而且衆所周知，今日大官倒的買賣動輒上億，甚至幾十億元的軍火出口了，還讓外交部蒙在鼓裡；抓這幾隻貓，除



並非童話

王成喜

至於那各路倒爺對這場運動怎麼想？我不想也可以猜到。他們肯定在盤算：先躲過風頭再說，不是說「大檢查」搞四個月嗎？四個月後等着瞧。那時候要有機會，大撈一筆就洗手不幹，省得三年兩頭查一次，搞得心驚肉跳。今後不幹了，不過最後要撈筆大的。

他們真會洗手不幹嗎？我不信。既然錢一上了手，手就有了癮，「最後」永遠也不會完。既然每個人都等着四個月後「最後賺筆大的」，那麼明年的亂子准小不了。

開始對此現象我百思不解，後在香港遇到一位朋友，此公恰作爲清查大員進駐香港某中資公司。酒過三巡，對方一語點破，我才頓開茅塞。原因是全民經商，倒爺遍地，人人屁股後面都有屎，你揭發別人，別人就會報復，不如相互包庇，相安無事。攻守同盟結成了網，上面來的清查大員根本咬不進，當地清查大員早已入夥或被買通。那幾隻揪出示衆的小貓，多是犯了衆怒才被拋出去替死的。中國今天的局面，可真成了法不責衆了。

法不責衆：四個月後等着瞧

了嚇虎，還能幹什麼？更有意思的是，這些貓大多出於中小城市，而巨倒雲集的重鎮，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儘管嫌疑遍地，却未聞斬獲。豈不咄咄怪事！

平心而論，這次清查整頓規模，聲勢之大在這十年中都可爲最。可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儘管打擊面很大，可是查獲的案子和追究法律的具體人却出奇地少，似乎有點對事不對人。如康華的處理，香港、深圳各官倒公司的處理，基本上是只砍不殺，只動機構，不動人頭。難怪人說：聲音大，動作輕。

自由的訣竅在於勇敢

—「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啓事」

準備尋求、正在尋求或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組織起來！我們要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要幫助自己和一切苦難中的同胞獲得自由；我們要爭取世界民主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就只有組織起來！

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將：

- 交流有關政治庇護的經驗；
- 提供政治庇護必要的資料和知識；
- 爭取各界同情人士的聲援；
- 加強與專業律師的接觸和聯繫；
- 動員新聞界的支持和輿論的力量。 翻譯中英文件。

一年來，本會曾幫助某些人士獲得了政治庇護，我們具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打算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為你提供諮詢服務。追求自由的大陸人士，請加入我們的組織，團結就是力量，未來將屬於勇敢而自由的靈魂！（首次來信請付諮詢費\$20元）

通訊處：Chinese Political Refugee Association 聯繫人：王恩蜀（會長） 葉常華（理事）
Box 99 Private Mailbox Center 80-50 Baxter Ave. Elmhurst, N.Y. 11373 TEL: (718) 507-4739
朱永祥（理事） 李達維（理事）
劉翔（理事） 閻仙清 理事

廢除內部發證，保障公開審判

林峯

致最高法院任建新院長的建議書

尊敬的任建新院長：

首先對您在七屆人大當選為最高法院院長表示祝賀！

我從「人民日報」（海外版）上讀到了您就任後的首次公開講話。您重點談到要切實完善公開審判制度，認為公衆的旁聽能起到潛在的監督作用，有助於公正執法。您還特別指出目前很多地方的法庭面積太小，今後要抓緊建一批正規的法庭建築，以保證公開審判制度得以切實施行。

您以相當的篇幅談了公開審判問題，要把完善公開審判作為您任內的重點工作。看來您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深有體會，並下了很大的決心要解決之。有感於此，我特地提筆談談我的一點觀察，並向您和最高法院提兩條建議。

我完全擁護和贊同您關於「法庭規格化」的計劃。不過我這封信想提請您注意的是，法庭容量不足這一客觀困難只是第二位的原因。在我們的司法實踐中，阻礙公開審判的最大障礙在於，各地方法院對法律的明確規定作出歪曲的解釋，擅自採用所謂「內部發旁聽證」的辦法，人為地限制公民參加法庭旁聽。

本來，審判公開這一原則早在一九七九年

頒佈的「刑事訴訟法」中就已經得到了確認。

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這一條款的含義是十分清楚的，「公開進行」就是對所有的人公開，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參加法庭旁聽。然而全國很多地方法院在審理案件（主要是政治性案件）時，却無視法律的明確規定，在法律之外自行制訂了內部發旁聽證的「土規定」。他們通過「內部的組織系統」，事先在一些單位中挑選人員，發給旁聽證，不管其本人是否有興趣，都要當作完成政治任务，去法院旁聽。而另一方面，很多真正想參加旁聽的人，甚至是當事人的同學或親友，卻無法領到旁聽證，反而被拒之門外。

按照這些地方法院的解釋，「公開審判並不是對所有的公民公開，而是對經過挑選的一部分人公開。必須是有單位的、政治表現好的人才才能旁聽，或者是經過法院系統挑選的、可靠的人才才能旁聽，所以要通過單位內部發旁聽證。」

這種解釋實在是對法律的嚴重歪曲，也說明很多地方法院的負責人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

法律是對所有人都適用的普遍準則。法律的規範對象是公民。只要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適用與否不能因為經濟、政治、性別、民族、職業、宗教信仰等任何其它的因素而有所不同。這不僅體現在犯罪量刑要對所有人一致，也同時體現在每一個公民權利平等。譬如，在犯罪量刑方面，若兩個人犯了同樣的罪，不能因為其中一個是黨員而少判兩年，因為開除黨籍和執行法律是互不相關的兩回事。在公民權利方面，在選舉中每個公民一人一票，即使是「政治表現特別好」的人也同樣只有一票的權利。

這就是法律。在法律的詞典中，只有公民這一個概念，不承認其它任何附加的身份，也不以每個人的政治表現為轉移。如果法律規定審理案件不公開，那麼任何人都不能進入旁聽；如果法律規定要公開審理，那麼每一個人都享有權利參加旁聽。公開就是對所有的人公開，對每一個公民一視同仁。那種「只有政治表現好的人才參加旁聽」的解釋，破壞了法律對全體公民的一致性。

那種所謂「內部發旁聽證」的作法，也是十分荒謬的。什麼叫做「內部」？公民在法律

面前是一律平等的，怎麼能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呢？如果是某個單位放電影，可以說本單位內部的人才能看；如果是某個政黨開大會，可以說本黨內部的人才能參加。然而法律却是超脫於一切之上，對所有人普遍適用的準則。在法律的事情上，不能有「內部」和「外部」之分。每一個公民都有一份平等的權利，每一個公民參加法庭旁聽的權利都是不可剝奪的。

任建新院長，在您面前談法律，我可謂班門弄斧了。不過在我們國家的各級法院中，確實有一大批法院負責人連這一點基本的法理常識都不懂。在七九—八〇年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判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等政治犯時，不事先張貼布告，不讓公眾得知開庭的時間和地點，並且採用內部發旁聽證的辦法，使得很多想參加旁聽的人不能進入旁聽。時至去年十二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又以內部發旁聽證的同樣辦法，使得一些準備旁聽楊巍案件審判的人被拒之門外。北京市和上海市中級

法院的這種作法，是對法律規定的嚴重歪曲，是對公民權利的粗暴踐踏！

當然，這些事情都是您的前任們治下之所為，不能記在您的頭上。我這裡只是向您和最高法院建議，那種內部發旁聽證的「土規定」，既於法無據，又於理不通，應當儘快廢止。要真正做到審判公開，至少應採取以下兩條措施：

(一)規定各中級法院必須設置公告專欄。所有公開審理的案件，必須將開庭的時間、地點於開庭三日以前在公告欄中張貼公佈。

(二)明令禁止那種內部發旁聽證的作法，保證每一個公民都有旁聽的權利。旁聽者按照到達的先後順序入場，旁聽席坐滿後就停止入場。

這兩條建議應當說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完全符合法律精神的。其中的第二條是爲了保障每一個公民有平等的機會。因爲法庭不論建多大，容量總歸是一個有限數，如果遇到審理公眾特別關注的案件，旁聽者太多時，總會發生

容量不足的情況。但只要做到機會平等，特別想旁聽的人可以半夜就起來排隊等候，而來了進不去的人也沒什麼可埋怨的。

再有一點，如果認爲公眾在法庭外面排隊等候不利於法庭秩序的話，也可以提前發入場券，但應當比照發售電影票的方式，規定固定的時間和固定的地點，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發放入場券。總之不論採取何種方式，重要的是要保證每一個公民有平等的機會參加旁聽。

任建新院長，現有法庭面積不足再加上各地法院歪曲法律，嚴重地妨礙着公開審理的切實施行。解決前者需要新建大量法庭建築，這不是法院系統自身可以辦到的。所以即使三、兩年之內解決不了，民衆也不會苛責你們。然而後一個問題則純粹是人爲的，是法院系統內部執法失誤。這是最高法院職責權限之內的事情，只要有誠意，完全可以立刻解決。我祈盼您能夠對此有所作爲。

最後，衷心祝願在您的內能使我國的司法公正得到大的改進！

李憲

共產黨的江山哭不倒

與丁楚先生商榷

中春六十七期刊出了楚先生大作「哭黨」，竊以爲是一篇瑕瑜互見的文章。一方面，丁先生鞭辟入裡地分析了內容與形式這一中國政治中難纏的死結；而另一方面，該文貫穿着「共產黨必垮」這一觀點，委實令筆者無法苟同。鑒於中春許多文章裡都瀰漫着這種樂觀主義

而，在事實上，共產主義未上天堂也未入地獄，它將在人世間萬古長存。

吉拉斯說得好：「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有本質的不同。法西斯主義者謀求改變政治關係，保持社會條件。共產主義，不管它是在哪個國家實行，其實質都在於權力。法西斯主義

，筆者願提出管見以求教於諸君。

假如我們醉心於共產主義理論的精華部分，那麼我們很容易便會在紙面上繪出美侖美奐的瓊樓玉宇；同樣，如果我們糾纏於共產主義在其實施過程中的累累罪行，那麼也會很容易地在紙面上將其打入萬劫不復的阿鼻地獄。然

是惡夢，是瘋狂；共產主義是暴力，是禁忌。法西斯主義是暫時的；而共產主義則是一種持久的生活方式。」（見其所著「鐵托：內幕故事」一書）

政治——不論是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是冷酷而現實的。在這裡，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實力，而意識形態則居於次要位置。特別是在一些落後國度裡，暴政往往是統治民衆的最有效的方式，至於掛出怎樣一個羊頭，却是不重要的。

試看利比亞的卡扎非政權、伊朗的霍梅尼政權，堪稱二十世紀末葉的政治奇觀。然前者頂住了美國軟硬兼施的壓力，後者熬過了對強鄰的「八年抗戰」。二者至今沒有垮台的迹象。若與中共政權相比，它們的統治能力只是小巫見大巫。

丁楚先生以行雲流水一般的文筆為共產黨做了「今昔對比」，並敘述了若干精心選擇的事例，以此證明共產黨失盡人心。這並不錯。但是據此尚不能得出「共產黨必垮」的結論。衆所周知，林彪編毛澤東小紅書的首頁首則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今，共產黨已經不再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作用，然而這恰恰是增強而非削弱了其生命力。它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桎梏，不必煞費苦心地為所言所行數典論祖，轉而採取「黑貓白貓」的務實政策，一件百孔千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外衣便足以遮羞蔽體。黨的力量在這種揚棄之中得到加強。

當年，共產黨運用中世紀巫師咒語般的欺騙，令「全國的知識界集體臣服，使他們在一場倍受屈辱的焚書坑儒運動後睡面自乾」、「

讓億萬百姓俯首，使他們在一場二千萬人餓死，三千萬人失業的災荒中鴉雀無聲」；而今，共產黨也可以運用中世紀般殘酷野蠻的暴力做到這一切。從治國安邦的角度而言，重要的是效果而非手段。

「載舟覆舟」這一導致王朝換代的原則不適用於共產王朝。面對武裝到牙齒的共產黨政權，手無寸鐵的人民只是一群聽憑宰殺的…… CHICKEN !

如果說，處於劣勢的共產黨是以李大釗、瞿秋白、方志敏、鄒代英等等仁人志士的熱血澆灌勝利花朵的話，那麼身為執政黨的它則是以輪番犧牲其精華和糟粕——劉少奇（組織天才）、林彪（軍事天才）、四人幫（妖婦佞臣）——以延年益壽。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共產黨比文革之前更為強大，使更多的人懼服。在國際事務中，理財家趙紫陽、半吊子工程師李鵬比巨人毛澤東、周恩來有更大的發言權。

許多會與共產黨結下血仇的反共人士，因之放棄反共立場。在香港，如果有誰提出共產黨將於「九七大限」或五十年後垮台的話，他必將被左中右各派一致視為瘋人。

在共產黨統治下，甚至連持不同政見者也按照黨的意志發揮着「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的特定作用。身陷囹圄的魏京生以其無盡的苦難顯示黨的強暴和不畏輿情；而出入國界的方勵之則以其欽准的自由宣揚黨的開明和寬宏大量。專制制度需要他們的存在界定出庶民百姓的行為禁區。這真是「人盡其才，各有所用。」

一九八六年尾，當中國大陸風起雲湧之際，鄧、趙二位在情急之下曾吐露「真言」——鄧小平：必要時要讓學生流點血。趙紫陽：大不了實行軍管。

誠願中國人民永遠牢記兩位大人的上述警告，以避免無謂的流血犧牲，以避免喪失手中業已獲得的一點點可憐兮兮的「寬鬆」。要知道，兩位大人並非虛言恫嚇，他們完全有能力付諸行動，且不必顧忌其後果。

毛澤東的滔天罪行在於：他在文革奪權鬥爭中迫使劉少奇屈膝後，沒有就此止步，而是繼續進行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踐，將億萬人民推入血海淚河。

鄧小平的歷史功績在於：他在文革後的奪權鬥爭中取華國鋒而代之，沒有就此止步，關起門來做皇上，而是推行有有限度的改革。假如他重施六十年代「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之故伎，民衆亦莫奈其何。

在「人民共和國」裡，人民的意見是無足輕重的。

民聯主席胡平先生鼓吹「言論自由」有年，並指出此即是專制制度的「阿基里斯之踵」。我同意他的看法。最近，劉賓雁先生於海外預言中國大陸將於數年內出現第一份民營報紙，我同意他的判斷。然而，共產黨人比非共產黨人更懂得箝制異己言論的重要性。一旦民營報紙不再是輿論界的花瓶，而成爲專制制度的喪鐘，那麼共產黨就會架起一挺破舊的機槍，使得白面書生的「精神原子彈」無法發揮其威力。這裡有個現成的例子：蘇聯坦克粉碎了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克作家協會成爲首批攻占目標之一。鼓吹離經叛道的文化人就此噤若寒蟬。

譴責共產黨的專制獨裁是一回事，承認這一不可更變的現實則是另一回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共產黨的江山不可動搖。愛它也罷，恨它也罷，哭它也罷，笑它也罷，都不能改變這一客觀事實。

遲來致中春第二封公開信

中春編輯部諸位先生：

您們好！

自從上次給您們寫過公開信以來已經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了，在此期間，我除了關心國內的情況以外，也一直在注意着「中春」的活動與發展，我很高興地看到越來越多質量好的文章出現在貴刊。我還收到貴刊編輯部丁楚先生的來信，我們在通信中誠懇地交換了意見和看法。丁楚先生告訴我說，自從我上次「公開信」發表以來，貴刊已收到七十餘封反駁我、和一封支持我的信。我對此並不感到意外，我在寫這封「公開信」時就已有思想上的準備。人人皆知，貴刊是有明顯的傾向性的。我上封信的觀點和「中春」的一向觀點出入太大，當然會「惹火燒身」。在前期「中春」中，我還見到了兩篇與我觀點對立的文章；一篇是「先到」先生的「與遲來先生商榷」，且不管其文章如何，是否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他總算是直率、認真地敘述了自己的看法。僅憑這一點，我也將其文認真閱讀二遍以上，至於觀點和看法有異，這以後還會有機會共同探討，誰是誰非，終有明瞭之時。另一篇是「艾天」先生寫的「花兒爲什麼遲了開」，此文短短幾百字，充滿謾罵和攻擊，因為我在公開信中講了些對大陸改革與「中春」不同的看法，當即就被指

罵爲「奴才」。對於這種蠻不講理的文章，我根本不願費時間與之爭辯，即使爭，也絕不用這種惡意中傷任意強加罪名的方式。用這樣的方式，非但達不到雙方共同的目的——辨別是非，追求真理，還會降低文章的價值和自己的品格。當然，我不恨這位「艾天」，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況且，在七十多篇反駁我的文章中，這可能還算溫和的呢？我只是下意識地有此感覺，但願此君不是貴刊編輯部成員（至少在他罵人的時候不是）誠若是，則會給貴刊名譽帶來不便，讓一些不了解內情的人誤以爲中春非但不包容異己，還對不同觀點者進行人身攻擊和謾罵，中春本身就已成爲專制的刊物，業已經失去其自身的民主了。

我講這些，不光是爲了我自己，而是因爲引出我的下文，即我本封信中給你們指出的批評和建議。

第一點我要講的是，你們的刊物儘管出現越來越多的質量好的文章，但仍存在着一些（至於多少，你們肚裡自明）空喊、叫罵而缺乏實際內容和分析的文章。一篇文章，不管用辭多妙、多麼尖銳，都一定得有根有據，以理服人。我今年回國探親，見到許多社科院的年輕人，我曾用不在意的語調探問他們對「中春」的看法，他們當中許多人仍持以否定態度。我

要說明的是，這些持否定態度的人，沒有一人否定你們的奮鬥方向——自由與民主，而他們的否定全是因爲「質量太差」「不值得一讀」「沒什麼實際內容」等等。我想，這應該引起貴刊的思考。我並無強迫你們「改弦更張」之意如那位「先到」先生所言，更不像他說的在「圍剿」你們。我只是想見到中春的水平以更快的步伐日益提高。人人皆之，你們無法用強迫的手段去讓人讀中春吧？如果你們想要得到更多的讀者，依鄙人之愚見，唯有在質量上下功夫！這樣才能將更多的人吸引到你們的軌道上來。胡平先生在十月號「致中共寫的公開信」，我就認爲寫得很在理，很好。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爲他在講道理。試想，如果他盡用尖銳之辭，即使是不罵，來呼喊，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這樣不但使說服中共領導人變得更加不可能，還會導致愈來愈少的人站在你們一邊。我並不反對揭露大陸如今陰暗和腐敗的東西，但我絕不同意只揭、只指責其現象，却鮮以分析其問題的實質。難怪有些人對你們斜目以視。要知道，他們並不是思想頑固，不支持民主啊！原因在於你們刊物的質量應該進一步提高。當然，我絕不是在說你們的每篇文章皆如此。我本人讀中春積極性越來越高，主要原因即是貴刊中可讀的好文章越來越多了。

第二點我要講的和第一點有不少相似的東西，但牽涉到一個對中國民聯宗旨的一點看法。

近來，我拜讀了丁楚先生在「中春」八月號上「爲權利而辯護」一文，其中講到民聯的宗旨在於注重「形式」而非「內容」；是「言論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言論」。讀完包括丁氏之文在內的一些文章，我的確是受到有一定的動力來啓發我思考，我同時感到我上一封

信有些地方（不是全部）講得是有些「偏激」和欠考慮，我本人完全同意了先生所說的為「言論的自由」這一「形式」而不懈努力奮鬥，「直到任何出版物都可以在中國存在為止」。這一點，恐怕當今在中國百姓中有一點思想的人都不會持有非議了，然而，對丁先生說的不注重「內容」和「自由的言論」在下却不敢苟同。這裡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矛盾啊，而且它們二者之間還有緊密的聯繫，存在着相互促進的辨證關係。你們是因為追求「言論的自由」這一「形式」，從而隨之產生出「自由的言論」這一「內容」，我想你們一定知道，要促進「形式」的早日形成和日益之穩固，「內容」則是會起到至關重要之作用的。簡言之，則是我在第一點談到的應在刊物質量上多注意、多努力。你們不會反對在自己的刊物中除了有好文章，還有學術性強、分析性強，不是讓人讀後隨手扔掉，而是願意留下，甚至留給後人的好文章吧。我說這點並不意味着讓你們從此只注重學術，只給中共提「建設性」意見，而停止對其弊端的指責和揭露。這些我並不反對，但也不認為它們和提高「內容」的價值之間存在着任何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我的看法是，「內容」和「形式」一樣重要，輕視任何一方，皆會給辦刊帶來或多或少的不利。

第三點我想談的又和前二點有聯繫，但它是我和一些人發現的一些現象，這就是，你們的衆多文章裡，雖然許多的文章很妙，邏輯性很強，一看即知道作者非同一般，但從全體雜誌的總體而言，讓人感到這樣一種現象，即「大同小異」之處太多。換言之，包括本人在內的許多人都對貴刊的文章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具體例子我舉不出來，因為太多了。當然，這是一個任何雜誌皆難以避免的，不同的只是大小而已，我說這些，只是為了讓你們的刊物辦得更好、更生動活潑和新穎多樣化，除此別無他意。譬如說，你們給讀者出個難下定論的題目，鼓勵不同觀點的人來稿爭論，人人各敘己之高見（我可不願意見到互相污蔑和攻擊辱罵，這絕非筆者之原意）直到爭個水落石出，即得到人人皆信服的結論為止。選材可在各個方面，因為社會是廣闊而複雜的。誠如此，不但能吸引更多的讀者，還在某種意義上增加貴刊民主之氣氛，不知貴刊意下如何？我上次寫公開信在你們這種具有明顯傾向性的刊物上發表，在你們看來是「異己」之言論，本有此意，孰不知未曾達到預期之最佳效果。但我並未因此而喪失信心，並決心為之繼續不懈努力！

第四點我想談的是和我上封信相同或相似的「謬論」，我認為你們刊物的有些文章（盡管比起以前越來越少）存在着與事實有出入的地方。尤其是在揭露大陸時。今年我回國探親，在歸途上遇到一位同鄉，即談起大陸經濟現狀，他雖然牢騷滿腹，可說了句：「還不像我在回國前聽到中春說的那麼邪乎！」毋庸諱言，此話有其片面性的一面，但是，如果沒有些中春的文章使其產生「聽」與「見」之有異的「感性認識」，他怎麼會出此不遜之言呢？

我還要說明的是，我依然堅持原來上封信的觀點，即：大陸如今的社會風氣有許多多腐敗之處，經濟改革帶來不少新的和更嚴重的問題；中國需要政治改革，但是近幾年大陸在經濟改革上還是有成就和值得肯定的一面的，不管這些成就多少，反正不能因其有黑暗的一面即連其成就一齊抹掉。貴刊讓人感覺好像在設了個「禁區」（這個禁區在近二期中好像

鬆了些），即每當遇到該談到大陸某些值得稱道的地方，你們總是繞過和避開。其實說出來並不妨礙貴刊的前進目標，它和批評並不是不可以並進的。況且，就算從揭露、批判的角度來講，從不止一方面來談，才能使得對問題揭露的更客觀和更加全面。我們對歷史上的暴君都能做到這一點，更何況對中共呢？

說了這些，恐怕我又要成為指責的對象了。尤其那位自稱為「艾天」者，上次我就是因為講與此相似之觀點而被此君強扣上「為主子屁股擦粉」這一桂冠，在下對此之「莫須有」實在不敢當，並勸「艾」君且息肝火，觀點不同，乃人之常事，否則民主還有啥意義？對同一事物有多種看法，可用辯論，甚至爭辯的方法來解決，只要人人皆講理。我早做好被指責的準備了。否則我何不到與此種傾向相反的其它刊物上去批評中春，却偏來這兒管閒事呢？我何不改名換姓，而自討苦吃呢？但我不這樣做！其目的就是要和諸位關心國家命運的朋友們共同探討我們共同關心的事。

今後，我也不做人人爭先恐後做的事——寫揭露中共的稿給貴刊，並非不想，而是因為在美雲集如此多才子，各有其獨到之見，何缺我一個「遲來」者呢？我要做的是，以給中春找麻煩，即挑刺，揭其之短為樂，願成為你們之「反對黨」。當然，在貴刊讀者看來這是個不光彩的角色。我願做這些，但絕無任何歹意，而是為了我們的民族，為了民主運動，還同時為了中春。望能有更多的理解者加入到我的行列裡來。

我不敢自詡為「敢闖之士」——我至今仍無膽量暴露自己之真實姓名。但我願有幸和其它諸鬥士共同探討問題。他們當中與我觀點絕對或多少有些相反的人當然不會少。

對於駁我的人，不管觀點多麼不同，言辭多麼激烈，只要他是認真地在討論和探討而非專橫、霸道地惡語傷人，我都絕不記恨，並願與之為友，這就是「不打不成交」。我還深深

地相信，將來在春天到來時，我們這些今天揮毫相鬪的對手們會見面，並高高興興地在一起的，原因之一乃如丁楚先生來函之所言：我們大家都是講道理的人！

直人又直言，竊自恕。
即頌
安好

遲來 叩上
十一月十一日凌晨

如此「代表」

王平

七月上旬，大約二十來名中國留學生從世界各地飛回北京，向國家教委報到，隨即便開始了一串彙報、接見、參觀、座談等活動。這便是國家教委組織的留學生代表團。現在暑假即將結束，「代表」們也該各回原校了。尚不知這組「創作小品」收尾？

國內經濟改革的進展情況，被廣泛期待的而尚未實施的「政治改革」的承諾，國內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國內的教育危機，留學生歸國之後的出路，等等，都是廣大留學生迫切關心的問題。特別是自去年初開始「反自由化」以來，國家教委實施的一系列留學新政策，護照延期、博士後研究、家屬伴讀、還有被稱為「賣身契」的「出國留學協議書」制度，早就讓留學生們人心惶惶。在這種情勢下，留學生

與國家教委官員之間的對話交流，倒不失為相互瞭解情況、交流觀點、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的一個渠道。我們要求建立這樣一種對話形式。

但是這次的「代表團」活動，給我們留學生帶來的却只是更深的失望。名曰「代表團」，誰作代表，代表誰，却是一個大問號。據筆者瞭解，六月份籌備此事時，代表團的組成，就是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代表」系由使領館教育處秘密指定的，所派定的當然是使領館信任的「學生幹部」。絕大多數同學，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該代表團在國內活動之前，根本不知道有代表團這件事。「代表」諸君憑什麼代表留學生呢？誰授權他們代表自己

呢？他們的代表身份憑什麼核定呢？

「代表」諸君在登機出發前，誰作彙報發言人，發言的內容、口徑，使館教育處早作了指示。這樣看來，「代表」諸君不但不能代表我們廣大留學生，甚至連他們自己也「代表」不了。與其叫作「留學生代表團」，不如稱為「使領館代表團」。他們事實上只是「代表」着使領館教育處的觀點、意見而已。

筆者在這裡特別強調代表資格的確定與授權。不經過公開的、合法的、程序化的授權，就不能自稱為「代表」。所謂「遴選」、「指派」，是對「代表」身份的戲弄，更何況「指派」還要「保密」了。被指派者只是代表指派者的意向，稍不合意，即會被取消資格另行「

指派」。這樣的「節目」，我們幾十年來還未看夠嗎？而今遠在大洋彼岸，我們再也不想「欣賞」這種「表演」了。

所謂代表，當然是指代表某一個特別界定的人群，他們不需要代表抽象的，無明確界定的人群。只有經過正式的、由該人群的授權，代表先生（或女士）發表的意見才有價值。台灣的立法委員朱高正先生在政壇上如此活躍（這裡不涉及對朱高正先生的政治信念與表達方式的評價），就是憑藉他口口聲聲言明的

「我代表宜 地區八萬選民」。我想連最反對朱先生的人士們都無法否定他的這個代表資格——這是經過選票授權的。

回到我們的「留學生代表團」的話題上來，即然這個代表團是如此組成的，我們當然不能期望它能起什麼對話交流的作用。它甚至連替資助它的旅費的國家教委收集瞭解情況的功用都無法做到——因為它是按照使館教育處規定的口徑在講話。弄這麼個「代表團」究竟能有什麼功用，我想教委與使領館官員們自己也

心中有數——不過是走個形式而已，不過是中國官場上盛行的上下糊弄而已，連戲劇都稱不上，只能稱個「即興小品」。

這裡筆者不妨向使領館諸位大員提個建議，既然你們花了若大開銷弄了這麼一個代表團，何不讓代表們向他們所代表的人群——廣大留學生們，在公開的（指在留學生中間公開）場合作一下正式的彙報。我懷疑你們能這麼做。我倒相信這個代表團會無聲無息地收場，就象它偷偷摸摸的組成一樣。我們等着瞧！

吳芳芳致中國駐美大使的一封信

吳芳芳

尊敬的大使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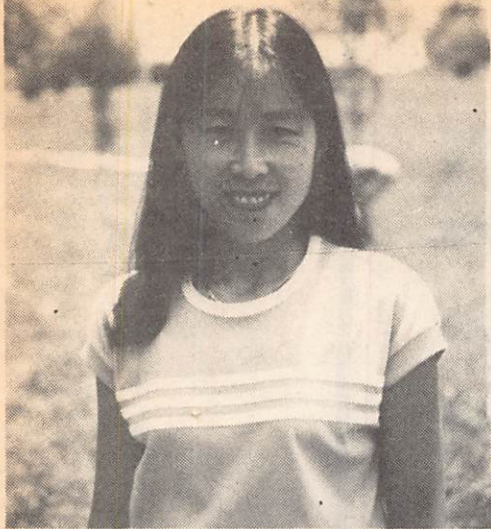
您好！

我是來自中國大陸，現在肯它基大學化學系學習的一名自費留學研究生。我在這異土他邦學習和生活已有三年之久。通過前歷屆從使館教育處派來的領導，我曾深深地體會到祖國的關懷和期望。我從心裡感謝他們使我們能夠在這兒很好地學習和生活所做出的努力。但是最近，我也遭遇到了一些極其令人痛心和氣憤的事情。為此，我憂心忡忡，百思不得一解。我感到我不得不提筆向您，尊敬的大使先生，坦露我的憂慮和不安。

今年五月二十一日，在肯它基大學就讀的

中國大陸學生及學者進行了一年一度的「中國留學生、學者聯誼會」的組織改選。在當選的三名負責人當中，由於其中一名負責人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成員，使館教育處領導夏

穎奇博士代表使館宣佈不予承認，並在六月二日親自主持了第二次改選。但又由於一名當選的負責人八月份畢業離校，至使整個的肯它基大學「聯誼活動」癱瘓。十月一日是國慶節，有二位學生和二位訪問學者「自願」組織起來成立了第三個「中國留學生、學者聯誼會」，並且發佈了有關組織綱領，會員資格及申請手續等事項的通知。同時宣佈在十月一日將舉行慶祝活動。使館教育處夏穎奇博士在十月一日



的前幾天就以「探望」受災的六位中國學生的名義來到了肯它基大學。當時我們這裡有六位中國學生由於房屋煤氣爆炸，而無家可歸。十月一日上午，當學生及學者一到達慶祝地點，每一個人就收到了一份非常正式の入會申請表格。您大概知道，在美國學習的學生加入聯誼會需要填寫如此正式申請表格的事情大概還是第一次吧！在慶祝活動開始之前，該聯誼會主席代表聯誼會其他負責人做了就職講話。他大約講了三點：第一點，他宣佈該組織是幾個同學「自願」組織起來為大家服務的，與任何政治組織及社團無關。第二點，根據學校的有關規定，聯誼會的負責人必需由五個 FULL TIME 學生組成，方可在校註冊。隨即他當場介紹了其他三位負責人。奇怪的是，其中二位是訪問學者，而且一共只有四人。第三點，會員資格一定要由他們的常委會 (STANDING COMMITTEE) 審批，才能成為正式會員。

對於這個未經過選舉而產生的聯誼會是否有權接受使館的錢，是否有權拿着這份屬於大家的錢去審批會員資格，以及五月份以來的另外兩次選舉，我都不願意妄加任何評論，因為這些事情、這些道理，自會由經受過幾十年的政治「教育」，具有最豐富、最廣泛的政治「常識」的中國人自己作出評判。我作為一名普通的留學生，對這個聯誼會並無反感。它接受使館的支持，拿使館的錢，試圖排除「中國之春」的成員或影響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事事都會有「風險」的國家，這畢竟考慮到了大部份學生、學者回國後的前途和安全。但是，如果我決定申請加入這個組織，並在如此正式的表格內簽上我的名字的話，我是否應該先把我要做的事情搞清楚呢？這是不是一個申請入會者的最基本的權力呢？雖

然他們在通知中解釋了一些事項，但是仍然有許多問題，我並不清楚。其中有三點是我最想搞清楚的：第一點，如果有人因為某些種種原因不喜歡或不願意加入這個聯誼會，是否仍然有權享受他們曾經一直享受的那一份錢，既使只有二塊錢、三塊錢。因為很大一部份學生認為聯誼會所得到的這筆錢，既不屬於使館，也不屬於某個個人，而屬於每一個在肯它基大學學習和工作的學生和學者。中國的公有制制度決定了這一點。第二點，常委會審核會員資格的標準是什麼？既然要審核、批准，就必然有其標準。第三點，這五個聯誼會的負責人是誰？因為學生總不能連「頭兒」都不清楚就入會吧？我想這三個問題對於任何一個要申請加入

某一個組織的人來說，都不算過份吧！並且據我所知，這三個問題也是許多其他學生希望搞清楚。當聯誼會主席在宣佈第一點時，我確實很不愉快。使我難以相信的是，他怎麼可以在二百多人面前撒謊而宣稱這個聯誼會與任何其他政治組織和社團無關呢？要知道，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清楚這個聯誼會至少是與使館有關的，是受使館支持的。如果他正大光明地宣佈這一點或迴避這個問題，我相信在場的所有中國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順其自然」的。我也許一時忘了自己的身份或忘了中國人歷來遵守紀律，不亂說不亂動的傳統，竟然不由己地當場提了一個問題：「如果該組織與任何政治組織、社團無關，請問你們組織這麼大的活動，錢是從哪兒來的？」這個問題只是出於提問的邏輯性，我以為主席會毫不隱諱、迅速地回答我，從而使我有機會或順理成章的問題。我對最關心的，也就是有關錢在分配和使用上的問題，而不是錢從哪兒來的問題。出於「安定、團結」的需要，這個問題也許是「過份

」了一點，也許是早就應該意識到中國人永遠不能奢望在公開場合有提問的權力，哪怕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毫無攻擊性的問題。也許中國人從一出世就該認命，一個愚民的命。在我提出問題之後，許多學生也相繼提出了一些問題。該會主席不但拒絕回答一切提問，而且態度極為不禮貌，並宣稱「這個聯誼會是我們幾個人組織起來的，我們喜歡誰就要誰。」甚至有一個學生竟出手打提問的人。同時也由於夏穎奇博士自五月份聯誼會選舉以來，在學生中一系列威脅、恐嚇的做法，造成積怨甚多，至使部份學生實在忍無可忍，公開站出來保護提問的學生，從而發生了一場長達二個小時之久的「爭吵」。

學生之間為他們自己聯誼會的事情爭吵應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在此事中，夏穎奇博士不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調解矛盾，恢復團結，而是當場質問提問學生的姓名、護照、原工作單位，並且在事情發生之後，他在部份學生的會議上公然宣佈：「這次事件是中國之春有組織、有預謀的、最嚴重、最惡劣的一次事件；」「是一些人想製造政治避難的證據……；」「吳芳芳挑起了這次事件……；」「並把「這件事講給美國人，四處擴大……；」同時，他還宣佈他已經在請校方有關負責人吃飯的時候，同他們正式宣佈了這些「鬧事」人是為要求政治避難而製造證據的事情。我一萬次也沒有想到，還沒容我問第二個問題，就這麼小小的一個問題，竟犯下如此「滔天大罪」，釀成了我這麼大的不幸。我也一萬次沒有想到就這麼小小的一個問題，竟已經有「難」在等了，竟可以使我「榮幸」尋求政治避難了。如果我一個人背這個「罪名」，也許良心上還有一點安慰，但是，

我竟使其他十幾個學生也不明不白地 SHARE 這個「罪名」。我很想知道，當夏穎奇博士以一個官員身份在會上講這種話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他在拿十幾個學生、十幾個中國人的前途「開玩笑」。面對如此嚴肅的政治結論，何去何從當然由我們自己選擇，但是我請教尊敬的大使先生您，我該怎麼辦？這十幾個學生該怎麼辦？我對不起這些學生，我可以永遠愧對他們，但是這又有何用呢？！

經過這件事，我悟出了許多的道理。什麼民主、自由，對中國人來說簡直是一種奢望。正如夏穎奇博士所講的「大家心裡都明白，為什麼還要問呢？」。中國人幾十年來，在政治生活中只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心裡明白」，永遠是「心裡明白」，永遠不能堂堂正正地講自己想講的話，永遠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永遠不能爭取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包括大使您本人在內，許多事情也許只能「心裡明白」吧！經過這件事，我也再一次親身體驗了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忍受的那種政治上的無形「災難」。我的生父當年也就是因為提了一個問題，被打成了右派，妻離子散、孤苦伶仃。二十幾年的生命就斷送於一個小小的問題。自我成年懂事以後，我就開始為我的養父、祖父寫檢查，悔過一些無窮無盡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錯誤」。我所寫過的檢查，堆起來也許比我還要高。當然，這還不是最悲慘的一幕，與其它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相比，幸運的是，我的兩位父親都還活着。儘管如此，我仍然一直對共產黨、對國家抱有極大的希望。我很少同朋友們談起這些心酸的家事，因為我以為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們不是終於迎來了改革、開放嗎？！這次事件發生之後，我感到震驚、感到恐懼。我不但為我家人的命運擔心，我也為我自己的命

運擔心。我希望我父親的命運不要在他的女兒身上，在年輕的一代身上再次重演！經過這件事情，我還有二點不明白：第一點，為什麼學生中一有「風吹草動」，就一定是中國之春的功勞呢？！中國留學生受過這麼多的高等教育，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頭腦嗎？！現在是「信仰危機」，「無法無天」的時代，難道是可以由什麼「中國之春」、「中國之秋」把他們「集合」起來的嗎？！「中國之春」無外乎是各把個學生「聚眾鬧事」，怎麼就可以把一些共產黨人嚇得如此驚慌失措呢？夏穎奇博士所講的此「事件」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證據在哪兒？他也是一位洋博士，他有沒有一點點法制觀念呢？退一萬步講，學生即使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聯誼會競選，進行一些討論、爭論，不是合法的事情呢？我記得我們中國的憲法總還規定了有言論、結社的自由吧！當然這允許的一點點「自由」還是在不危害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下的自由。請問大使先生您，學生如果為自己聯誼會的事情，所謂「組織」了一次小小的爭吵，是不是就一定危害了社會主義制度，就一定危害了四項基本原則呢？如果社會主義制度，四項基本原則真是到了如此「脆弱」的地步，我甘願認罪受罰！第二點，最近一些使館的領導，也包括一些留學生，喜歡用「政治避難」這類詞語去攻擊、中傷一些學生，並且還大肆在美國人中製造這種輿論。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恐嚇住學生，就可以打中「要害」，就可以使你無法在中國人中間抬起頭來。孰不知，如果一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因為說「錯」了一句話，發表了一篇「錯」文章，或做「錯」了一件事，就不得不申請政治避難的話，這是這個國家、這個政府的恥辱，而不是這些避難者的恥辱。一個真正

民主、自由的國家、政府，請問有何「難」可避呢？如果在一個會上僅僅提了一個問題，發生了一點點的爭吵，就足以構成一個政治避難的證據，那能說明什麼呢？那不能說明我們卑鄙，我們有失「人格」、「國格」，而只能說明我們國家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沒有希望！當我的印度朋友自豪地告訴我，他們國家儘管貧窮、不發達，但是他們卻不需要因為說「錯」一句話去尋求政治避難的時候，我為我的國家、政府感到羞愧。我倒是認為夏穎奇博士在美國人面前對此事應該採取「心裡明白」的態度，不要有失「國格」。

還有一事，我也想向尊敬的大使先生講一下。夏穎奇博士同校方有關負責人講，他此次到肯它基大學來，是為探望六個受災於煤氣爆炸的中國學生。但是，在他停留一星期之久的時間內，他並沒有探望這些學生，給予任何幫助。就我所知，其中三位學生甚至連慰問的電話都沒有接到一個，而他們的所有善後、安置工作全部是由美國紅十字會和當地教會幫助解決的。煤氣爆炸，六人無家可歸，在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中並不多見吧！他在這裡這麼長時間，不用說憑良心，就是以一個政府官員的身份，做一例行公事，也應該關心一下吧？！抓「階級鬥爭」固然重要，但是為了壯大本「階級」的力量，象徵性地問候也是必要吧！此事在學生中、美國朋友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此類的「疏忽」以後應儘可能地避免。

聯誼會本是一件區區小事，無人問津。即使有再大的爭吵、怨恨，也值不得寫這麼一封信去煩您，也煩我自己。但是，由於夏穎奇博士對此事的處理不妥當，把事態搞得如此升級、嚴重，使我和另外十幾個人頂着要「政治避難」的罪名，在這裡學習和生活，我確實背負

着很大的精神負擔和壓力。當然，我也得到了許多的安慰。事情發生之後，我得到了許多中國學生、美國朋友的支持和鼓勵。尤其是來自我指導教師的鼓勵。他對我講：「你並沒有做什麼對你國家不利的事，你只做了你應該做的事。」使我心裡獲得了平衡。過去的，畢竟過去了，我曾一再地想過是否應該給您寫這封信。因為這種申辯信，請原諒，從來是得不到好「結果」的。但是我還是提筆寫了，我總覺得大使先生會比常人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

中國歷史上總還有過一個「包青天」吧！也許我這次又忘了自己的身份，又忘了「遵守紀律」，但是有一點，我不能說服我自己，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真誠地希望我們的國家一天天地走向文明進步；我真誠地希望我能成爲一個自豪的中國人！儘管這個國家對我的父輩不仁不義，但是我畢竟在那兒出生，在那兒長大。我永遠不會否認我是一個中國人！做爲一個中國人，我覺得我有義務寫這封信請尊敬的大使先生您對外出人員所做所爲給予關注。他們是代

表國家、代表政府講話、做事，更多的應該是愛和關懷，而不是這種無情的打擊和迫害。衷心地希望這類事件不再發生，從而保證其他尚未牽連的學生能在更大的空間呼吸、吞吐更新鮮的空氣。

我真誠地期待您在百忙當中能給我一個回音。信中難免使用一些不「當」的詞語，懇請大使先生能體諒一個普通留學生的心情。

順致崇高的敬意！

肯塔基大學化學系研究生 吳芳芳

吳芳芳給人民日報編輯部

中國之春編輯部的公開信

人民日報編輯部：
中國之春編輯部：

我是肯塔基大學化學系的一名自費留學生。今年十月一日，我因在慶祝活動的 PARTY 上，向本大學新成立的「中國留學生、學者聯誼會」提了一個問題，而被使館教育處領導夏穎奇博士在學生會議上宣佈爲「是爲政治避難製造證據」之後，在日後的學習和生活中，一直感到沉重的精神負擔，以致使我不得不提筆向我們政府駐美國的大使寫了一封申訴信，以求公正。該信於十一月九日以掛號信發出，時至今日仍無任何音訊。我是一個從大陸來的中國人，事情也是發生在大陸中國人之間，貴報、貴刊又是在美僅有的大陸中國人自己的報刊

、雜誌，所以在萬般無耐的情況下，我只好求助於貴報、貴刊將此信公諸於衆，以求全體大陸中國人的公論。一個人在極度無望的時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哭」，就是「喊」！所有我做過的事情，就是在慶祝會上作爲一名普通留學生提了一個問題。它竟然可以成爲一個政治避難的證據，這不是很費解嗎？我的朋友曾經告訴過我一個笑話：一個有權有勢的人總不穿褲子，但是不知爲什麼凡是見到他的人都誇他的褲子漂亮。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個孩子，這孩子告訴他沒有穿褲子。結果所有誇獎他的人都安然無事，只有這個孩子遭到了處罰。爲什麼我和這個孩子就會遭到厄運呢？就是因爲我們都講了一句真話。我真不知道我和這個孩子爲什麼這麼「傻」。但是我也想不通

，這個有權有勢的人不是總有一天會站在鏡子前面嗎？！這個「笑話」不是一個笑話，而是一個悲哀的故事。因爲它告訴人們只有永遠說假話才能幸存。我記得曾經讀過貴報刊登的一篇留學生寫的文章，談到有關留學生的使命就是學成之後，回到祖國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體制。我佩服這些留學生有理想、有報負，但是我不知道在一個人爲說一句真話都要遭到如此厄運，連一個小小聯誼會的 OFFICER 學生們都沒有權力決定的狀況下，留學生們怎樣在中國實現他們的使命。這不才是一個真正的笑話嗎？！我之所以決定把這封信借貴報、貴刊公諸於衆，就是希望使大陸留學生意識到我們大陸中國人的命運是多麼的不幸。不要說我們不享有民主、自由，就是連說句真話的權力都沒有。如果說我們大陸留學生對中國負有很大的歷史使命，即就讓我們每一個人從說一句真話開始吧！

敬禮！

此致

吳芳芳

肯塔基大學化學系研究生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李鵬總理受到「熱烈歡迎」

十一月十七日凌晨九時，李鵬乘坐的專機由悉尼到達堪培拉，機場內除澳方歡迎人員外，還有中國使館組織好了的中國駐澳留學生歡迎隊伍。隨後，當霍克總理及李鵬總理一行車隊馳出機場時，一群被中國使館拒絕在機場外

的中國留學生，手持巨幅標語，上寫有「中國人民要人權，給我們言論自由、集社自由、信仰自由，釋放魏京生、楊巍等民主鬥士、西藏流血事件不許重演」，列隊機場外迎接李鵬總理，我們的總理受到了一次「意外的熱烈歡迎」。

當日中午十二時，堪培拉的新聞俱樂部前記者出入頻繁，一場對李鵬總理的記者招待會將在十二點三十分召開，當李鵬車隊到達時，又遇到了高舉標語、高呼「人權」的中國留學生及部分西藏在澳的居民。夜間，澳洲的主要電視台分別轉播了這項新聞及實況錄像，次日清晨，澳洲主要報紙「堪培拉時報」登載了大幅學生示威的照片及手舉的巨幅標語。

事件的由來

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及種種政策，不僅是這幾個舉行示威的中國駐澳留學生對此持有看法，廣大中國留學生也有相同的觀點。對於如何表達這些看法，方式方法可以討論，本來，這幾位同學把這些意見寫在一封致李鵬總理的信中，準備在機場歡迎時有機會可以親手交給李鵬總理。沒想到，當他們報名參加去機場歡迎李鵬總理時，被中國使館教育處張×一口拒絕，理由是名額已滿，共需三十名學生，多一名也不行。張×在電話中說得還頗誠懇，解釋確是因為名額滿了，沒有其他原因。有位學生向張×提出，如果在那天早上名額沒滿三十名，能否讓他也去參加歡迎，張×在電話中同意了。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八時，當這位同學及另一位同學到達使館前時，教育參贊謝其綱立即出來，責問：你們要去幹什麼的？是歡迎？

還是幹什麼別的事？當同學責問他為什麼用這種態度時？他回答說：「你們給中春寫過信，那是反革命組織。你們是和反革命組織掛了鉤，你們不能去機場歡迎李鵬總理。」另一位參贊說：「你們是拿中國護照的，就屬我管，我讓你們去，你們就去；不讓你們去，就別去。告訴你們，今天就是名額沒滿，也不讓你們去。」既然使館官員是這種態度，這幾位學生還有什麼辦法呢？這是其後在機場外抗議及在新聞俱樂部前示威發生的導火綫。這真是名符其實的「官逼民反」。

還要把多少組織打成「反革命」

打開窗戶說亮話，使館不讓這幾個同學進機場內歡迎李鵬總理，是因為他們是「民主中國」——一個在堪培拉的學生組織的成員。「民主中國」的成立旨在討論中國的留學生政策及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問題，「民主中國」同意「中國民聯」的很多觀點，並認為把「中國民聯」打成反革命組織是錯誤的，沒想到「民主中國」僅僅成立了幾個月，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組織」。否則，使館官員有什麼權利拒絕他們去機場歡迎李鵬總理呢？和「反革命組織掛鉤」，是「反革命」的同意詞，在中國，為什麼這麼容易把人打成反革命？那些現在還在監獄內的政治犯、思想犯，只不過是有不同的信仰，而年輕的魏京生，竟然被判十五年！公道在哪裡？我們不應當為他們大聲疾呼嗎？西藏的流血事件，如果我們保持沉默，下面不就輪到我們這些對現政權提出批判意見的人了嗎？中共如果繼續把國內、國外持不同政見者打成「反革命」，到頭來只會成爲「孤家寡人」。

如此資助一個J—— 留學生的經歷

大安

本人是搞自然科學的，對政治一向不感興趣，更無高見。但是正如中共所云：「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却要來關心你」。本人自一九八一年初申請自費來美讀學位，竟花費了長達三年以上的時間，克服了中共無數次的關卡才來到美國。在我提出申請之初，某大學領導表面上說漂亮話，什麼自費留學不花國家一分錢，何樂不為。表面上同意，暗地裡已把我載入另冊。一連串的孤立和歧視突然而來，工作再努力，評獎也無份，更有甚者，不久校方就將我列入編外人員（其他數位申請自費留學教師亦同）。我感到巨大的壓力，好像做了什麼對不起國家的事一樣，突然在學校裡抬不起頭來。我意識到如果出國不成，後果將不堪設想。但是出國談何容易，困難接踵而來，教授拒絕替我寫推薦信，因為校方無理規定，無領導批准不得隨意寫推薦信。在克服了重重困難獲美方學校入學許可I—二〇後，校方突然勒令我退回，換取IAP—六六，否則不予考慮，更無爭辯餘地。

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能換為IAP—六六，但校方刁難說要直接讀PH·D·才可以，我爭辯說自費留學何必作此限制，當然無

任何效果，我只好按此規定換成了讀PH·D·的IAP—六六。誰知中共又節外生枝叫我等待政治審查，自同意我出國申請以來，兩年已過去，為何一直不政審，這不是白白浪費我的時間嗎？誰知一等就是四個月無政審結果，原因是我北京的原單位遲遲未將我文化大革命中的結論寄來。後來要不是我主動打電話到北京催促，恐怕再等八個月也無結果。政審通過以後，校方對自費留學生採取突然襲擊，要通過英文測驗，不及格者立即取消資格，不准重考。這一關也未難倒我，而以高分通過。校方見硬壓無效就採取軟攻。一位系黨總支委員找我談話，當面表揚我的教學及科研成績，系裡準備提升我為副教授，條件是放棄自費出國申請。我感到費解，出國留學與升遷有何矛盾，過去公費出國未歸者都有提升的先例，為何何人尚在國內，非要放棄出國申請才能提升。這裡一定有陰謀詭計，我婉言謝絕了系總支的建議，堅持自費出國留學。

但自費留學生的關卡接踵而來，在我的申請最後被國家教委批准後，拒絕按規定由單位兌換美元給我以購買中國民航出國機票（J—IVISA由單位兌換美元購買機票），矢

口抵賴過去曾對我的允諾，後來甚至打官司至校長處，也無法解決。事實上校方是採取統一戰綫的，我何嘗能打赢這必敗的官司。由於我早已允諾國外親戚，機票自行解決。我一來不能失信，二來國外親戚也不能理解這裡發生的情況，眼看這出國迷夢又將破滅了。真是上帝保佑，未想到在香港的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願意提供出國機票，我最終取道香港、東京，轉輾至紐約。旅途極為辛苦。這時我手持的是第四張IAP—六六，因為我已過期了兩次。美方學校見我居然能來報到，又驚又喜，紛紛向我祝賀，使我哭笑不得。

來美數月後，事情發生了意外，我的親戚患癌症去世，花費頗多，我不宜繼續要求親戚資助。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竟意想天開地寫信給××總領事館，試探可否暫時給我一點援助（借貸），結果碰得頭破血流，遭到拒絕，並叫我打工籌款購買機票立即回國。這使我猛醒，中共對自費留學生根本完全否定，什麼一視同仁完全是欺人之談。

縱觀我來美之艱難道路，中共不但不資助分文，而且連普通中國老百姓獲准出國時應有的權利（由中國銀行兌換美元，購買中國民航出國機票）也被剝奪了，真是欺人過甚。最近中共又要了一個新花招，把我列入首批受中共資助的名單中送交美國新聞總署。我無法理解究竟拿了什麼資助。為了核實事實，我寫信給××總領事館，指出國家教委在我的出國批文中寫道「一切費用自理」，我出國時未拿國家一分錢（包括機票、製裝費等），為何將我列入名單，並要求核實及更正錯誤，結果石沉大海，成為我心中的謎。

最近通過朋友的側面瞭解，對「資助」之謎終於解開了。原來在我出國時，國家有新規

定，大學教師之類級別的出國者暫借給本人工資一至二年按月由其家屬領取，將來用美元歸還。我的工資折合現在美金才二十六元，由我家屬領取了兩年。中共竟挖空心思把這種強迫借貸的工資，說成是對我留學的「資助」，以欺騙美方，真是可恥之極。真正的政府資助是每月四百元美金在美國領取，並享有國家給的機票、製裝費以及回國探親的旅差費等。中共現在魚目混珠，把所有 J-1 簽證的留學生及訪問學者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列入國家資助，粗暴地將莫須有的事強加於人，是中共踐踏人權的又一表現。請問炮製「黑名單」的大人們，國內工資是按月領取的人民幣，與本人出國求學的 PROGRAM 毫無關係，如何資助留學。I A P-1 六表格上明確指出，要與 PROGRAM 有關的款項，才構成政府資助。我出國時國家教委的批文上寫着「一切費用自理，發二年薪水，計入工齡」。薪水僅是作工齡計算而發，某些 F-1 簽證的大陸留學生也有保留薪水的情況。請問「一切費用自理」作何解釋？作為中共政府官員，如果這點概念都不清楚，那不是水準太低了嗎？中共一向要兩面派手法，明裡是高喊「一視同仁」，暗裡却把自費留學生看為「庶出」。你如不信，本人的出國歷史記就是證明。記得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名言：無產階級專政搞不好就成了法西斯專政。此人一生中說過的錯話，不計其數，但是他的這句話看來倒是應驗了。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訂費 (每年)	
地址： _____	_____	寄遞地區	
_____	_____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_____	_____	機關：60 美元	200 港元
		普通訂戶：24 美元	96 港元
		學生訂戶：20 美元	84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另加郵費	
北美地區：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航空： 加拿大 U.S.\$15	
Flushing, NY 11370-9998		中美洲 U.S.\$25	
香港：香港九龍旺角郵箱 79047 號		歐洲 南美洲 U.S.\$35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亞洲 澳洲 U.S.\$45	

有獎徵集大陸留學生新通訊錄

新的學期開始了，各校迎來了新出國的同学，並將編料新的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通訊錄。本刊特將徵集這些新通訊錄，以利於與各校留學生們的交流。如有可能，本刊將會試編全美、全日、全歐、全澳中國大陸同學通訊錄。

▲凡寄本校全套的新通訊錄者，本刊將贈閱中春兩年；

▲提供不了全套通訊錄也無妨，凡提供十名以上大陸留學生通訊處者（寫出姓名和院系），復贈閱中春一年；

五名以上者，獲贈中春半年。

感謝您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援！

中國之春編輯部



河

殤

(下)



蘇曉康

王魯湘

河殤

第五集 憂患

大自然在人類面前忽然變得陌生起來！

從加利福尼亞的暴風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從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溫熱流到持續多年不肯緩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積乾旱，地球彷彿在發瘧疾似地顫抖，人類竟然也像倒退了一萬年似的束手無措。

「厄爾尼諾現象」，這個挺新鮮的名詞，像幽靈一樣在世界徘徊。

人類社會在它的締造者面前，也變得光怪陸離，越來越難以駕馭了。

馬克思早已預言的資本主義喪鐘，遲遲沒有敲響。神話般發迹了二百年的西方工業文明，雖然已經顯露出種種病態，却還在困境中不斷調整和更新。本世紀初以來從帝國主義薄弱鏈條中相繼突破出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又

相繼開始大規模實行社會改革。美蘇裁軍、海灣戰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斷政變、東亞的民主風潮、蔓延在富庶的歐洲的恐怖活動、艾滋病的猖獗……這一切，把我們這個星球攪得亂麻一團。

自然和社會，這兩個人類文明借以依託的基礎，為什麼都如此充滿着憂患？這兩種憂患之間，難道也有某種聯繫嗎？

東北遼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水，當地軍民奮力抗洪搶險。

長江洪峰終於安然渡過荆江大堤，葛洲壩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整個華中地區稍稍喘了口氣。

然而，不動聲色的黃河也充滿危險。預計黃河將有大洪水，千里大堤和整個華北大平原猛然又繃緊了所有神經……

對中國人來說，哪裡的洪水也沒有黃河發

大水可怕。早在「詩經」的時代，中國人就發出這樣的嘆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在整個文明史上，黃河始終是「中國的憂患」。

而今，中國人還有一個更深沉的嘆息：為什麼我們的封建時代如此漫長，漫長得猶如那永無休止的黃河洪水。這是一個更大的惡夢。它從驪山那座大墳裡不斷彌散出來，充滿着兩千年的歷史空間。近百年來，多少次想把它徹底葬送進墳墓裡去，可它却始終死而不僵。

歷史在古老的磨道裡碾得那樣緩慢、沉重。黃河在它那淤滿泥沙的河道裡淌得也是那麼緩慢、沉重。

洪水還會再來嗎？

動亂永遠過去了嗎？

我們在問黃河，也在問歷史。

我們不知道古時候的黃河是個什麼樣子。

此刻展現在你面前的黃河，不正是濁浪滾滾，

像一條狂暴的巨龍嗎？這是黃河在內蒙古托克托河口鎮，受到呂梁山的阻擋後，突然掉頭南下，憤怒地劈開黃土高原，奪路而走，從此便在那狹窄深邃的晉陝峽谷裡，變得暴戾無常了。看它現在這副模樣，你還能想象得出，它在約古宗列盆地的那種晶瑩澄澈嗎？你還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裡那種柔順、舒展、嫵靜的一絲風韻嗎？

清水變成了濁浪，靜靜的流淌變成了怒不可遏的掙扎，孕育變成了肆虐，母親變成了暴君。

從有文字記載開始，黃河的第一次泛濫，發生在公元前六〇二年的周定王五年，從那時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國民黨扒花園口，兩千五百年間，黃河共計潰決了一千五百九十六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兩次決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黃河大概是肆虐的一條河。

幾千年的周期性泛濫，使華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淪，生靈塗炭。當年齊恒公大會諸侯的葵丘安在？「水滸」所寫的八百里蓼兒窪，也就是幾千年來古人常與洞庭湖媲美的那個巨野澤又在哪裡？而那時世界最繁華的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東京汴梁，如今也掩沒在十米黃土之下，更不用說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命財產都付之東流。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或民族，會像中國經受這樣的周期性毀滅呢？

更可怕的是，這種周期毀滅，在中國不僅僅是個自然現象，而且還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以大的時間尺度來衡量，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從建立、發展趨於鼎盛，漸漸顯露出危機，暴發動亂，直到崩潰，每隔兩三百年就會

發生一次激烈的大動盪。舊王朝覆滅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顯地是一種時間上的周期性，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黃河泛濫一樣永無休止。

周期性的大動亂，總是一次又一次把生產力的積累無情地摧毀掉。往往是經濟發達、繁榮富庶的地區，破壞得越厲害。中原本是中國最早的經濟開發地區，隋末動亂之後，那裡却是「人煙斷絕、雞犬不聞」。中古時代的靑梁之地開封，盛唐時是小城鎮，北宋時成爲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亂世又倒退爲小城鎮，似乎六百年一個大輪回。

相傳在黃帝時代就發明了的指南車，至少東漢張衡也發明過，但後來馬鈞、祖沖之這些大科學家又一次地重新發明它。古代科學發明在亂世中一再失傳，讓能工巧匠一代代耗盡精力。

利瑪竇從西方帶來十五卷本「幾何原本」，同徐光啓合譯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譯中斷了整整兩百年，可就在這兩百年間，徐光啓的譯本傳到日本，推動了那裡的科學發展。中國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這樣不斷地在周期性大動亂中夭折。

其實，可怕的社會動亂，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是並不遙遠也並不陌生的。文革動亂離今天雖然已經有十一年的歲月洗刷，它的巨創却仍然留在人們心頭。然而，善良的人們是否認真想過，那場動亂的爆發，爲什麼離解放前的動亂只隔了短短的十幾年？這是否意味着古代那種周期性的社會振盪還在延續？

中國人民希望永遠不再有動亂，這就如同希望黃河永遠不再泛濫一樣。

可是，洪水是無法預測的。自從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發大洪水之後，黃河水利委員會就發出警告：在今後的某一天，黃河可能還會發生萬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旦發生，黃河無論向北還是向南潰決，都會造成損失數百億元的毀滅性災難，都將給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帶來巨大威脅。

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我們頭上，我們却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落下來！

黃河就是這樣一條難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處就在於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謂「黃河斗水，泥居其七」，這在世界江河中是絕無僅有的。把它每年從黃土高原上沖刷下來的十六億噸泥沙，堆成一米見方的大堤，可以繞赤道二十七圈。幾千年流淌下來，黃河就把一個千溝萬壑、支離破碎的貧瘠高原拋在上面，又把一個洪水肆虐、朝不保夕的災難平原扔在下面。它把這兩個沉重的包袱留給中國人，只顧自己流到海裡去了。難怪有人形容說，黃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動脈大出血」！

（毛澤東坐在邛山頭上眺望黃河）

當這位中國當代最偉大的人物面對這條大河的時候，他會想些什麼呢？據說，他當時十分憂慮地問道：黃河漲上天怎麼辦？雄才大略的毛澤東一生說過許多氣吞山河的話，却唯獨對黃河說得很少、很謹慎。他年過七十的時候，還想徒步策馬去探黃河源頭。他說：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黃河也不死心。

多少世紀以來，把黃河變清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夙願。它像一個永不泯滅的夢。新中

國曾經把這個夢全部寄托在三門峽大堤上。一九五五年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懷仁堂向全國人大代表們宣佈：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以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在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個莊嚴時刻，中國人確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諺語的：「聖人出，黃河清」……。

然而黃河沒有變清。滾滾泥沙淤死了三門峽大堤，回水倒灌涇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夙願，又一次在混沌的黃水裡化為泡影。

三門峽的失利，常常會叫人聯想起大禹的父親的悲劇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時代，出來領導人們治水，但他却採用了堵的辦法，治水失敗。他被殺死後拋屍荒野，屍體三年不腐，人們剖開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親的教訓，改用疏導的辦法，劈山開河，終於治服了洪水，從此名垂青史。

黃河從大禹脚下流到我們這裡，仿佛只打了一個盹兒，而人世間已閱盡數千年。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同黃河泛濫進行了數不清的搏鬥。搏鬥的結果是，我們終於靠着兩條大堤，把黃河挾持起來，連洪水帶泥沙一塊送進大海。人們常常驚嘆祖先建造萬里長城和大運河的偉力，殊不知這千里長堤也是一個偉大的奇迹。長城只剩下了觀賞價值，運河也早已被截斷，唯有這黃河大堤，至今同我們休戚相關，因此有人稱它為「水上長城」。

日久天長的泥沙堆積，不斷漲高河床，不斷潰堤改道，而我們的祖先又不斷把它重新約束到大堤之中，這種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較

量，便成為中國人對付黃河的唯一手段。

今天的黃河大堤，修築於光緒初年，僅僅二十幾年就又變成了地上河。河床平均每年抬高二厘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厘米。解放以來，我們已經三次加高加寬大堤，它保證了將近四十年的安瀾無事，在近代黃河史上幾乎成為奇迹。但是，這畢竟同我們祖先一樣，沒能擺脫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看看今天的懸河兩岸，城市、鐵路、油田、鄉村，無數的設施、無數的生靈，不都處在隨時可能發生的滅頂之災的威脅之下嗎？

我們將怎樣抵禦未來的洪水？黃河的出路在哪裡？四十年的安瀾無事，給中國人鑄成了一種麻痹心理，人們仿佛快要把它那猙獰的面孔遺忘了，這種心態，也許就像大興安嶺忽然燒起大火來，人們才想起，噢，那裡原來有一片森林！

但學者專家們却忘不了可怕的黃河，哪怕黃河不動聲色，默默無言。他們有的憂慮，有的樂觀，有的懷疑，治黃大計始終眾說紛紛。的確，黃河是一門非常複雜的大學問。黃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學上最大的難題。它是我們從祖先那裡無可選擇地接收下來的歷史遺產，它又是我們必須為子孫萬代作出合理籌劃的艱難抉擇。歷史和未來在今天撕裂著我們！

哺育我們的黃河，必然同時要禍害我們。有一得必有一失。這就如同人類向大自然索取了什麼，大自然就要向人類報復些什麼。這個聽起來頗為荒誕的法則，其實也通行在中國的社會歷史之中。

那夾持着滾滾黃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們大一統的社會結構的一個絕妙象徵嗎？

如果我們再去翻一下中世紀的世界地圖，就會發現，破裂的歐洲本土，衆國林立，就像一條「雜亂拼縫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獨在東方的中國，有一塊遼闊而統一的大版圖，雖然時不時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結起來，相比之下，歐洲的查理曼帝國、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國，乃至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國，都不過是漫漫長夜中的一道閃電。是一種什麼樣的強大力量，能把這麼大的國家牢牢凝聚了兩千多年？這個「大一統」之謎，使中外學者在驚愕中絞盡腦汁。

馬克思曾經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經濟之上的社會結構，形象地比喻為「一袋馬鈴薯」，雖然裝在一個口袋裡，却是彼此分離的。在古代中國，小農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盤散沙。具有社會聯絡功能而又信仰統一的儒家知識分子，把分散的小農有效地組織成社會。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曾經在中國造就了高度繁榮。雖然，就在這大一統的奇迹裡面，在一種爛熟文明的燦爛外表之下，在一種絕對供奉皇帝、聖人、老人、祖宗牌位的繚繞紫煙之中，這個社會結構的內囊裡却悄悄地腐爛着，這種情形，非常像那黃河大堤正在被螻蟻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樣。儒家組成的官僚隊伍，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腐化傾向，權力本身成爲一種腐蝕劑。於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時期，崩潰就在眼前了。

然而，舊王朝崩潰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會結構又恢復原樣，繼續朝着下一個崩潰走去，就像黃河大堤潰決了，人們又修復它，等着下一次潰決。我們爲什麼總是陷在這樣一種周而復始的命運之中呢？

這個神秘的超穩定結構，主宰了我們兩千年。而今，紫金城裡的金鑾寶座早已成爲歷史文物。龐大的儒家官僚網也灰飛煙滅了，但是，大一統的幽靈似乎還在中國的大地上游蕩。社會振蕩的惡夢還讓人記憶猶新。更不可忽視的是，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以致局部的腐敗現象，仍然在破壞我們的四化大計，這些古老的社會頑症，頗有些像黃河每年帶來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漸漸積累着危機。也許，就象人們對不斷增高的大堤深表憂慮一樣，永遠的超穩定，不也頗令人憂慮嗎？歷史已經給了我們的啓示，難道還少嗎？

（演播室。學者談中國社會結構）

金觀濤（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歷史是過去的事實，但我更認爲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無終止的對話。在這種對話中，我們可以產生一種很深的憂患意識。歷史對中國人的啓發是：中國在社會變革中應該避免毀滅性的動盪，一定要讓進步與創造來代替動盪。當舊的東西瓦解的時候，應該讓能夠取代舊的東西的新因素成長起來。

就在那座比黃河河床還要低九米的開封城裡，歷史曾經演出過大起大落的無限繁榮和無比災難，然而，對今天來說，或許在這裡曾經發生過的兩個人物的故事，比鐵塔和相國寺還要更深地烙在中國人的心靈上。

這位黑臉包公，八百年來盛名不衰。儘管他不不過是封建社會裡苦難人民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虛幻偶像，但今天開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麗堂皇的一座包公祠來，四方游人絡繹不絕，難道僅僅是爲了旅游嗎？「青天」觀念在中國民間的久久不肯泯滅，說明了什麼呢？

人民更不會忘記，就在離包公祠不太遠的一幢舊銀行裡，發生過文革動亂中最黑暗的一幕。在這間陰森森的黑屋子裡，親自主持制定過憲法和黨章的共和國主席，被秘密囚禁，度過了 he 生命的最後二十八天。死的時候，他那滿頭白髮足足有一尺長……

一個共和國主席的命運，是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命運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法律不能保護一個普通公民的時候，它最終也保護不了一個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經把動亂的慘烈和時代的悲劇揭示得無以復加，然而動亂的根源却不是他個人的命運所能揭示的。這是一個民族的整體悲劇。如果中國的社會結構不更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至觀念不現代化，誰能保證悲劇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在邁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之後，終於也開始嘗試政治體制的改革了。今天，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終於有人勇敢地第一次舉手投了否決的一票，這是何等不容易呵。誰能說這不是一種進步呢？不管這個改革將遇到什麼樣的阻力和風險，我們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們的身後曾經洪水泛濫。我們的身後也會經動亂不已。我們必須朝前走，去衝破那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也許我們會遭受挫折，但是，這不正如那位功敗垂成的蘇，用它的失敗爲兒子大禹鋪墊了成功嗎？

讓我們這一代用雙肩把憂患的重擔挑起來

！
那是爲了我們的子孫萬代永不再憂患！

第六集 蔚藍色

人的血液是紅色的。

幾乎所有動物的血液都是紅色的。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規定爲紅。原始人在死者的遺體上用鐵礦石塗上紅色，以此召喚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藍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們曾經堅信，這神秘的蔚藍色描繪着整個宇宙，它是宇宙的顏色。

僅僅在二十多年前，當人類第一次離開地球，在太空中遙望自己的家鄉時，他們才驚訝地發現，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體中，唯有我們人類的家園——地球，才是一顆蔚藍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藍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氣和水，使地球成爲蔚藍色的星體。

覆蓋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藍色的。

大海本來就是人的故鄉。在地球的突變中，大海曾經庇佑和延續了人類祖先的生命。後來，當人類重新回到大陸的時候，他反而不適應了。爲了戰勝陌生的環境與內心的恐懼，人類被迫極力發展自己的後天適應性，從而創造了文明，同時也完成了人本身的進化過程。

復活節島上的這些謎一樣的石像，告訴我們一萬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躍着一個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這些今天看起來簡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類從陸地上又重新載回海中。是什麼信念支持着這些原始人去橫渡至今

使人視為畏途的大海的呢？在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動同哥倫布和麥哲倫那創立人類新紀元的偉大航行之間，我們能不能聽見人類命運的宏偉旋律呢？

正是由於這種持續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類的文明才分成了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兩大單元。

這是一個瀕臨西太平洋的國家，同時，它又雄踞在歐亞大陸的東部。它的軀體是黃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樣拱起的大河，也是黃色的。我們看到這條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遙遠的中華文明的源頭蕩漾着蔚藍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話時代，來自黃河中游黃土區的內陸文明，已經在不斷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區了。今天，我們還能從黃帝大戰炎帝和蚩尤的故事裡，聽到這歷史深處的朦朧聲音。

後來，周朝對殷商的征服，證明這股來自內陸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戰國晚期發生的楚敗於秦的史詩般的戰爭，可以說是以小麥作食糧、用戰車作戰、並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響的黃色文明，最終戰勝了以大米作糧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戰、並且是受到東南亞和太平洋文化影響的蔚藍色文明。

這個內陸文明的歷史性勝利，是無論屈原那種搶天哭地的悲歌，還是西楚霸王那種地動山搖的反抗，都無法遏止的。

蔚藍色的隱退，埋伏下一個民族和一種文明日後衰的命運。

太平洋那千古不息的藍色波濤，一直在默

默地召喚這個躺在大陸上的古老民族，偶爾也引起過它的激動，把它的航船一直牽到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然而，蔚藍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黃色的土地來，畢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黃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奧秘，就在於儒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逐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達了內陸文明的生括規範和理想，它在東方封建社會的盛期，顯然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單一的思想統一，削弱了多元的發展，古代生活中豐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幾縷細細的清泉，淌到內陸文明的黃土板塊上，立刻就無影無踪了……

當內陸文明在華夏大地蒸蒸日上時候，蔚藍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

早在古希臘時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隨着雅典的海上權力一同興起的。海權導致了民主革命。

近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前提，也正是歐洲海外航綫的開闢。從十五世紀開始航行於海天之間的那些帆船，既揭開了世界貿易和殖民活動的帷幕，同時也運載着科學和民主的希望。蔚藍色就像這小帆船，獲得了現代世界命運的象徵意義。

於是，廣大的東方市場和美洲新大陸，使小小的歐洲幾乎一夜之間成爲暴發戶。

橫渡大洋需要又堅固、又龐大、又精巧的船艙，造出這樣的船艙需要數學和物理學，需要技術與科學。於是，一六三六年，伽利略發表了「新科學對話」，這場對話，就是在造船

廠舉行的。

英國首先由海外貿易獲得巨大的利益，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也促進了自由思想的普及，於是首先在英國發生了克倫威爾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六五一年，克倫威爾頒布航海條例。一六九〇年，洛克發表「政府論」。自由貿易論成爲資產階級的口號和原則。

資本主義轉動着工業革命和自由貿易這兩個輪子，開始了偉大的飛躍，開始了科學與民主的雙重歷史大合唱。

這一切，都與海洋息息相關。

中國這時候在幹什麼呢？

當麥哲倫正航行在他的環球航綫上時，明朝嘉靖皇帝因爲日本貢使打架，開始正式「閉關」。

公元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發表了著名的「國富論」。就在這本書中，他宣佈中國的歷史和文明停滯了。他說：停滯是由於不重視海外貿易，閉關必趨於自殺。

可惜，這些話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及時聽到。

終於，當虎門碼頭燒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開了耻辱的中國近代史的時候，中國同西方之間，已經隔着一條巨大的精神文化鴻溝了。一個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蔚藍色文明，同一個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黃色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無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堅船利炮馬上就讓中國的官員和士大夫們領教了蔚藍色的強大。於是有了「洋務運動」，有了「中體西用」。

洋務派大臣們買回來了威力強大的鐵甲軍艦，辦起了一座座兵工廠。位於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廠，在掌握西方技能方面遠遠超出日本。一八七〇年左右，俄國人參觀遠在中國西北的蘭州兵工廠時，為那裡製造的槍枝質量之精良感到震驚。甲午戰爭開始時，中國的軍艦數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阻止清王朝先敗於法國，再敗於日本。甲午海戰失敗的最直接的原因，竟是由於一個腐敗的承包商在許多炮彈裡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開的中國艦隊，臨戰了還不知到底應該聽從誰的指揮。這一事實清楚地說明了，腐敗的制度所導致的必然失敗，並不能靠技術來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國學習海軍的留學生嚴復，日後並沒有去當一名戰艦指揮官，而是成了思想啟蒙家。

嚴復從對西方的大量觀察中發現，歐洲文化的偉大功績，就在於發揮個人的潛力，提供一種社會契約，這種契約能使競爭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於促進社會改革。同樣，通過利用個人的「意志力」——一種人類的「浮士德」和「普羅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創造出一種生機勃勃的文化。

然而，當嚴復參與其事的百日維新慘敗之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却成功了。當這位中國近代的偉大啟蒙者在封建勢力的打擊下，一步步放棄改良思想，最終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懷抱裡

去的時候，他在英國海軍大學的同學伊籐博文，却連任日本首相，率領這個島國迅速跨進世界強國之林。

嚴復乃至近代許多偉大思想先驅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劇命運，似乎都證明了，即使最優秀的中國人在革命和激進了一陣子之後，到頭來都擺脫不了退回儒家的歸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國文化熱」的大討論中，人們依然在繼續着中西文化優劣的百年未決的爭辯。無論是「全盤西化」的一派幻想，還是「儒家文明第三繁榮期」的一廂情願，一切都彷彿還在原地踏步。難怪有的青年學者這樣感嘆道：巨大的文化財產變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優越感變成了巨大的文化負罪感，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巨大的心理障礙。

變法之艱難，或許就難在我們總在擔心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嗎？我們似乎並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百年裡，不論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還是啟蒙運動，西歐人至少從未擔心過，在改革之後是否會變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了，不是法蘭西人了。唯獨在中國，這是最大的忌諱。

這或許正是那黃色文明的沉重之處和淺薄之處！

兩千多年前的哲學家莊子，給我們講過一個寓言：

黃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漲大水的時候發現自己很偉大，居然兩岸之間分辨不清牛馬。他盡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見了大海，竟茫然若

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訴他，不能和井蛙談論大海。因為他只知道自己那點小小的地盤，無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現在，我的河伯，你終於走出了壅塞的河道，看見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境界。

這是一個象徵。它說的並不是古代中國，它好像是在預言今天。

古老的黃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認識大海的博大與力量，不過一個世紀，它面向大海發出的那一聲長長的嘆息，穿過一百多年的歷史，一直回響到今天。

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

肆虐的黃河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意識。

單靠這片黃土和這條黃河，已經養育不起日益膨脹的人口，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過去的營養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許有種種古老完美的「法寶」，但它幾千年來偏偏造就不出一個民族的進取精神、一個國家的法治秩序、一種文化的更新機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斷摧殘自己的精華，殺死自己內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這個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

歷史證明：按照一種內陸文化的統治模式來進行現代化建設，雖然也能容納現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衛星可以上天，原子彈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賦與整個民族以一種強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當蔚藍色的海風終於化為雨水，重新滋潤這片乾旱的黃土地時，這些只在春節喜慶

日子裡才迸發出來的令人驚異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黃土高原重新獲得生機。

在黃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處都可以看到來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們開設的服裝店、理髮店。沿海地區湧來的商品散布在大街小巷。神聖的、土灰色的寶塔山，在這紅紅綠綠、熙熙攘攘的市場後面，漸漸淡化為一個朦朧的背景。

這些老漢和小伙子，他們的祖先曾經從這內陸腹地出發，征服了全中國，如今却隨着這片萎縮了的土地，一起萎縮了他們曾經那麼旺盛的精力。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幾個小伙子，竟然是這支氣勢磅礴的千人腰鼓隊的成員。難道他們的生命力，永遠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洩之中嗎？

一九八〇年，深圳特區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告，幾千年的內陸文明，終於走到了大海的邊上，把它面對着土地的臉，轉過來遠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個沿海城市全面開放。中國正式擺出了向大海挑戰的態勢。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佈成立。它的短期目標是向「亞洲四小龍」挑戰。古老的亞洲大陸終於放下了泱泱大國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將與十四個沿海城市連成一體，成為太平洋西岸的一條經濟巨龍。這一歷史壯舉，必將刷新中國文化的顏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進的時代裡，有多少中國人是自覺參與其中的呢？

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研組的系列報告指出，中國公民中較為普遍地存在着「一種過於謹慎

的政治參與心理：

百分之六二點四一的公民表示「對談論政治問題，我很謹慎」；

百分之七三點七九的公民對「政治上的事情還是少介入為妙」的觀點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對」；

他們仍然擔心參與政治會引起麻煩，他們仍然缺乏政治參與的安全感。幾十年政治運動的反復無常，政治迫害的極端慘烈，使人們仍然心有餘悸。這勢必嚴重阻礙民主化的進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第一次以徹底的不妥協精神，亮出了「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但是，這種激進的文化潮流，並沒有沖洗掉政治上、經濟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義積淀。幾十年來，時而沉渣泛起，時而一片冰封。

中國的許多事情，似乎都必須從「五四」重新開始。

中國歷史沒有給中國人造就出一個中產階級來推動科學與民主的勝利。中國文化也沒有培養出公民意識，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產生逆來順受的順民和鋌而走險的狂徒。不過，歷史却給中國人造就了一個十分獨特的群體——知識分子。

他們很難有統一的經濟利益和獨立的政治主張，他們幾千年來都是一種附庸；

他們也不可能成爲一個結實的社會實體，用鋼鐵一般的經濟實力對舊的社會進行武器的批判；

他們的才華可能被利用，他們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們的脊梁可能會彎曲，他們的肉體

可能被消滅。

然而，摧毀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們手裡；

把科學與民主的蔚藍色甘泉澆洒在黃土地上的的是他們！

（演播室。學者談當代知識分子問題）

遠志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這種現實和理想的矛盾，或者傳統與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覺到的恐怕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他們往往首先發現傳統的弊端，但是又沒有能力去改變它。他們總是滿懷希望尋求衝破傳統的出路，但是他們往往又缺乏這種勇氣，所以說他們總是最先感覺到心靈的痛苦。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於環境的壓力強迫人們去接受新生活，也忍着痛苦去創造新生活。爲此，我用這樣三句話加以歸結：中國的希望在於世界，實現這希望要靠被世界喚醒的中國人，我們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靈的痛苦，或許能因此而變得偉大。

比知識分子更有現實力量的，或許是這些相貌平平、談吐也不驚人的新型企業家們。甚至在這些小商店的老板們中間，在這些急急忙趕路的生意人中間，在這些離開土地四處攬活的農民中間，正在積聚的新的社會能量與衝動，都不可低估。

我們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極爲森嚴、莊重的高級政治場合，也終於泛起了蔚藍色的透明度。中國的大眾傳播，第一次處在較爲中立的立場，擔當了決策上層與人民群眾之間相互對話的媒介。

然而，要使專制主義傳統深厚的東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麼一回事，並不容易。歷史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〇年底，羅斯福第三次當選為美國總統。蔣介石先生為此在日記中寫道：「美國之民主，令人羨慕不置，特電羅斯福總統，祝其成功。」三年後的一個晚上，蔣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齡，在白宮同羅斯福夫婦共進晚餐時，談起美國工人罷工的事情。羅斯福問宋美齡，假如中國政府在戰爭時期遇到這樣的事情，該如何處理？宋美齡安詳地用一個塗色的長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劃了一道，做了一個優美的殺頭手勢，使席間所有美國人驚訝不止。羅斯福夫人事後說：「宋美齡對民主制度能夠

講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樣實行民主制度。」

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隨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學性。

我們正在從混濁走向透明。
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

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

黃河最終要滙入蔚藍色的大海。

黃河的痛苦，黃河的希望，造就了黃河的偉大。

黃河的偉大，也許在於它在海洋與高原之間創造了一片大陸。

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滾滾千里泥沙，將在這裡沉積為新大陸。洶湧澎湃的海浪，將在這裡同黃河相碰撞。

黃河必須消除它對大海的恐懼。

黃河必須保持來自高原的百折不撓的意志與衝動。

生命之水來自大海，流歸大海。

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

(完)

不怪黃河，不怪共產黨，

只怪自己

在銀川河套，在綏遠河下，
黃河都是極有利與胡平商榷
危的，在河為河說平學上才
危險。這怪誰呢？
如果讓我回答，我將說：「怪我們自己。」

丁楚

一個記者採訪了波蘭工人領袖瓦文薩。他問道：「你認為波蘭團結工會的最大敵人是什麼？是波蘭共產黨呢？還是蘇聯人？」

瓦文薩回答：「是我們自己！」

回答太精彩了。不是嗎？如果波蘭全體工人能夠緊密團結，萬眾一心，別說波蘭共產黨，就是蘇聯人也一點辦法沒有。

言歸正傳，我們回到「河殤」。

「河殤」指出了一個不容置否的事實：華夏文明衰落了，中華民族面臨着被開除球籍的

「我相信，「河殤」的許多讀者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怎麼能怪黃河呢？「黃河能夠給予我們的

，早就給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祖先已經創造的文明，黃河無疑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們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裡流

流出來。」我們的千年帝國夢早就在康熙大帝那會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緊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騙自己了。」

「讓我們這一代用雙肩把

憂患的重擔挑起來吧！」顯然，河殤並沒有「怪」黃河，它鞭撻的是我們這些自欺欺人的不肖子孫，恨其不爭，鞭其猛醒。

那麼怪共產黨嗎？怪共產黨有什麼用呢？記得胡平在北大競選時有一句名言：「屋子漏雨，你不能怪老天爺，只能怪屋子沒修好！」

對於共產黨，道理也是一樣的。天要下雨，黨要專政，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況且共產黨人「從不隱瞞他們的觀點」，那麼是誰把它捧上台，又把它慣壞的呢？

德國人說，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的劫數，因為是他們選擇了他。那麼中國人也應該說，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劫數，不也是他們慣壞了它嗎？

所有統治者的權威都是建立在被統治者承認的基礎之上的。胡平不是常說：「只要全體人民齊聲說一聲「不」，共產黨的專制傾刻就會瓦解」嗎？但是中國人在這四十年中就是無法「齊聲」，非但如此，他們還相互鬭爭，助

助

紂爲虐，而共產黨就是利用對人民的分化瓦解來維持專制的。那麼這種局面能怪誰呢？

本期中國之春刊登了李憲寫的一篇文章「共產黨的江山是哭不倒的」。不可否認，持有和李憲同樣看法的人在中國不佔少數，他們對共產黨又恨又怕，一方面他們罵共產黨作惡多端，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共產黨的專制制度可以改變。可不是嗎，共產黨的江山之所以萬年長，正是由於千千萬萬個李憲相信它能長萬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之所以成爲事實，是因大家都相信它是事實，一旦所有人不再相信這一點，那麼這個事實就不存在了。民主也好，專制也好，正如胡平常說：信則靈，不信則不靈。

人們常常抱怨，中國人的民主權利太少了。其實照我看，中國人現在享有的民主權利不多也不少，剛好。我相信，他們需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他們之所以至今沒有得到，是因爲還沒有覺得有必要。

「民主少了」的呼聲，大多來自那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當然，他們的呼喊是很必要的，但是與其花費口舌去和共產黨論理，還不如用這個精力去說給人民聽。老天爺下不下雨我們控制不了，我們能辦到的是修好房子。

「河殤」自命爲反思文化。反思實際上也是某種程度的反省。反省的對象當然是自身的原因，至於其它因素造成的後果，那是另一回事。民族反思的主體是人民。共產黨犯的錯誤讓共產黨去反省好了，而中國人民應該反省的是爲什麼他們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共產黨犯錯誤。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拿破崙說：國家的偉大是因爲人民的偉大。丘吉爾曾帶領英國人民戰勝了法西斯，他滿以爲英國人民在戰後會連選他任首相。可是英國人拋

棄了他，選擇了他的敵手艾登。丘吉爾感慨地說：「一個忘恩負義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

我們的祖先無論有多少劣根，但他們無愧於是偉大的人民。因爲他們創造出來的文化、他們所建立的國家都曾經是世界上最屈指可數的；可引以爲豪的。中華民族被開除球籍將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因爲我們選擇了一批敗家子來管家。現在的情況是，這批敗家子把家敗空了還不告訴人民，讓他們還做着「千年帝國夢」，河殤的使命是把這個危機的現實告訴大家。中國古語說：置於死地而後生。「河殤」所要說的正是：中華民族處於死地。

今天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民已不能再被稱爲勤勞勇敢。他們的懶惰，出於對獎勵勤制度的容忍。而他們的容忍，則出於懦弱。可是很難把我們身上的懦弱歸於我們祖先的劣根性。中國歷史上造反、抗暴的農民起義無論從規模還是從次數上都是世界罕見的。這足以證明，我們的祖先並不總是忍氣吞聲、甘受壓迫的。

我們的祖先所犯的錯誤在於，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建立社會內部和政府內部的制衡機制。而每一次反抗的目標都是企圖用一個好的皇帝（或政府）去代替一個壞的，用一個好的主張去代替一個壞的。他們從沒有想到許多個權力，許多種思想可以共存，可以制衡，可以互補，可以競爭。文化體系的一元性和封閉性，是我們這個民族最大的劣根。這一點，正是「河殤」想說的。

可是怎麼能怪我們的祖先呢？是地理的環境限制了他們和其它文化的交流。中國這塊土地，北有大漠，西有高山，東南有大洋，在科技的發展還沒有達到能突破空間隔閡的時候

，怎麼能怪罪我們文化的封閉性呢？當華夏文明在周圍的民族中所遇到都是比它落後的文化時，當它還不可能遇到能與它匹敵的文明時，怎麼能夠怪罪它的一元性呢？

可是今天就不同了。今天的技術水平使空間的隔閡不再成爲障礙。如果說今天我們還拒絕與別的文化，尤其是更先進、更強大的文化的碰撞，那就只能怪我們自己了。如果說秦漢時期，中國文化中還不可能誕生也不能從其它文化那裡吸收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的話，那麼今天，西方已經有了，已經實踐過了，我們仍不接受、仍選擇了專制主義，那應該怪誰呢？

日本人的祖先比我們的祖先落後，日本人襲傳的劣根性應比中國人要多。可是日本吸收了外來的文化，接受了現代民主政治理論，於是成爲世界上強大的民族。這是日本近代人值得自豪的地方。歷史證明，越是文化多元化的地方，越是文化交流頻繁的地方，越有生氣、越會發達。我來到美國後，美國老師對我說：「什麼是美國？美國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壞的總合。」美國之所以能成爲世界第一強國，正是因爲它有最博大的胸懷、最寬闊的氣量來兼收併蓄。

「河殤」並沒有怪黃河。它只不過說了黃河文化（即大陸文化）的局限性和必然沒落的原因，它的中心立意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多元，開放。

看了「河殤」也不必怪共產黨，如果每一位讀者都能對自己的民族的職責作一番深刻的反省，「用自己的雙肩把民族的憂患挑起來」，這個電視劇就功德無量了。

既不怪黃河，也不怪共產黨，只怪自己，王震副主席還有什麼理由發脾氣？總不能干涉人們責怪自己吧！

東 南 西 北

為材料工程系博士研究生趙京，通訊地址：

DEPT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WESTERN UNIV.
EVANSTON IL 60208

中春記者赴領館參加記者招待會

十一月廿七日，中國之春記者赴紐約總領館參加僑辦主任廖暉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會上，廖暉主任對中春記者提出的問題給予坦率而得體的回答。會議結束時，民聯代表鄭為民對廖主任的氣量和風度表示贊賞，並希望能由他轉達被紐約總領館無理退回的「民聯致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一封信」，廖欣然答應。

民聯成員會見李先念

中國民聯成員楊雨亭不久前隨胡秋原訪問大陸，並參與了與中共政協主席李先念的會談。楊在離美前公開向中共領事館聲稱自己是中國民聯成員，對方答曰：「沒關係，可以回國看看嘛！」

魏京生被轉至北京關押

據一名消息靈通人士透露，魏京生已從青海勞改場轉押至北京第一監獄，單獨關押在單身牢房。魏每天可以到獄室外兩次放風，做做運動，但他健康情況仍很壞，牙齒已全部掉光。

匈牙利開放黨禁

匈牙利司法部長宣佈，匈牙利將允許公民

合法組成政黨，並可以自由組織工會和其它形式的團體。這個法案下個月將要送交議會通過。布達佩斯的共產黨自一九四八年鎮壓了其它政治團體之後，至今仍實行一黨專制。這一法案若被議會通過，意味着匈牙利開放黨禁。

民運人士任曉町打破沉默

北京民主牆運動的重要人物任曉町最近打破沉默，譴責中共壓制人權。四十四歲的任曉町是一名電工。一九七八年他創立「人權聯盟」，很快就成爲一個著名的民主運動活動分子。一九七九年三月他因要求民主自由，批判毛澤東思想而被捕入獄，未受任何正式判決被監禁四年。任出獄後仍擔任電工。他在最近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用武力奪取政權，現在它應當讓人民通過投票箱決定事情」，他說：「中國人民要求直接民主是公平合理的」。

民聯英國小組活動

中國民聯英國聯絡站成立並開始活動，他們自籌經費，出版了油印刊物「海德之角」，在留學生中散發。他們計劃定期出版「海德之角」，並準備把發行量擴大到一千份。

貴州民運人士黃翔被捕

貴州青年詩人、早期民運人士黃翔，不久前被控「擾亂社會治安」罪，並被判刑入獄三年。所謂「擾亂社會治安」，是指他去年在北京逗留期間，曾在北大參與了一次文藝活動。由於消息封閉，大陸知識界對此並不知情。

中國民聯一批聯絡站公開活動

中國民聯加拿大阿爾伯特省支部成立，公開聯絡處：

P.O. BOX 2487
DRUMBELLER ALBERTA
CANADA T0J 0Y0

中國民聯美東波士頓聯絡站決定公開活動。聯絡人爲蔡茅、中國大陸留學生，在布蘭迪斯 (BRANDEIS) 大學化學系做博士後研究。通訊處和電話如下：

CENTRAL ST APT #5
WALTHAM MA 02154
(617) 736 2567(O)
(617) 893 6952(H)

芝加哥西北大學聯絡站公開活動，聯絡人

中國民聯主席胡平致波蘭團結工會駐英 聯絡站負責人馬爾克、加茨特奇的信

親愛的馬爾克·加茨特奇先生：

我十分愉快地收到了您的來信。我們也非常願意和你們建立聯繫與合作。我們相信這對於我們雙方的事業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中國民聯成立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它是一九七八年「北京之春」運動的繼續。目前我們活動的中心在美國。五年多來，我們已在美洲、歐洲、大洋洲和香港、日本等地建立了許多支部和聯絡站，並在大陸內也建立了一些聯絡處，經常與國內保持密切的聯繫。我們已經出版了近七十期「中國之春」雜誌（中文版）和曾經出版了四期英文版中國之春文摘。我們還舉行過多次講演、討論和游行等活動，我們的事業得到了中國國內及海外的廣泛支持。我們的目標是從根本上改變極權專制制度，把中國建成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我們的這個目標，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民，尤其青年一代的同情與支持。

附上一些有關材料，希望我們今後加強聯繫與合作。

此致

敬禮

中國民聯主席胡平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於紐約

中國民聯主席胡平致台灣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的信

台灣民主進步黨主席黃信介先生：

欣聞貴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先生當選為貴黨主席，我謹向您致以熱誠的祝賀。

近些年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其中，貴黨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我們祝願貴黨今後進一步加強團結，推動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積極關心大陸，促進島內的安定與繁榮。你們的事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我衷心地希望你們取得更大的成功。

此致

敬禮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胡平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於紐約



黃信介不贊成談「台灣獨立」。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紐約總部、編輯部信箱改爲：

P.O. 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港澳聯絡站：

香港九龍旺角
郵政信箱 79047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 號信箱

澳洲墨爾本聯絡站：

G.P.O. BOX 376 F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歐洲巴黎聯絡站：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EE
CEDEX 2 FRANCE

歐洲西德聯絡站：

POSTFACH 1725
8050 FREISING
WEST GERMANY

歐洲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加拿大蒙特利爾聯絡站：

P.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P.O. BOX 146446
SAN FRANCISCO,
CA 94114-6446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 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P.O. BOX 4558
ARLINGTON, VA 22204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 BOX 710784
HOUSTON, TX 77271

美國夏威夷聯絡站：

P.O. 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OTTER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聯絡站：

P.O. BOX 80082
LINCOLN, NE 68501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 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P.O. BOX 16061
CHICAGO, IL 60616-0061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O. BOX 7122
PITTSBURGH,
PA 15213

■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NY 11370-9998

■ 通訊處：(美洲) 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香港) 香港九龍深水埔基隆街 236 號閣樓後座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 46 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E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P.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香港』 3-872506

■ 零售價：(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0.00 港幣

SECOND CLAS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ISSN 0735-8237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